

不被遗忘

景青与珍珠的信心宣教之旅



作者: 罗月媚

译者: 陈文龙, 方健宁

不被遗忘

景青与珍珠的信心宣教之旅

作者：罗月媚
译者：陈文龙、方健宁

SIM
Serving In Mission
国际事工差会

献给所有福音工作的忠实伙伴

感谢你在过去四十年与景青和珍珠同行，
并以祷告、鼓励和奉献的方式支持他们。

献给所有带着喜乐和顺服回应主耶稣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使命的门徒，
愿你忠心事奉主，
并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祝福管道。

不被遗忘

景青与珍珠的信心宣教之旅

作者：罗月湄

译者：陈文龙、方健宁

编辑：陈雪莉

封面设计：蔡文发

文字排版：余玉琦

出版日期：2023年3月中文初版（新加坡）

国际书号 ISBN：978-981-18-6591-6

非卖品，仅供在线阅读。

出版者

SIM 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

地址：116 Lavender Street, #04-09 Pek Chuan Building, Singapore
338730.

电话：(65) 6298 3611

电邮：eastasia.info@sim.org

网站：www.simeast.org

赞助者

新加坡巴特礼基督教会 Bartley Christian Church (Singapor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非经出版人书面许可，本书无论全部或部分均不得以任何电子或机械形式或手段，包括影印、录音或利用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予以使用、复制或传送。

Copyright © SIM East Asia Ltd, 2023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Name(s) : Wong, Mae.

Title : Not forsaken : Dr Andrew & Belinda Ng's faith journey to Africa and beyond / Mae Wong.

Description : Singapore : SIM East Asia, [2020]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dentifier(s) : OCN 1130716591 | ISBN 978-981-14-4541-5 (paperback)

Subject(s) : LCSH: Missionaries--Africa--Biography. | Missionaries--Singapore--Biography. | Married people in missionary work--Africa. | Missions, Asian--Africa. | Ng, Andrew, Dr. | Ng, Belinda.

Classification : DDC 266.00922--dc23

目录

推荐	i
鸣谢	viii
陈序	ix
林序	xi
前言	xiii

黄景青早年时光

1 出生与父母从中国下南洋	2
2 漂泊的岁月	4
3 成长的岁月与早年的回应	7
4 巴特礼基督教会早年事迹	11
5 初次与 SIM 接触	16

林珍珠早年时光

6 童年和一次濒死经历	23
7 早年的上学生涯和属灵觉醒	27
8 到非洲的呼召	33

灵魂伴侣

9 两颗心的相遇	38
10 迈步前进	42

11	信心之旅的开始	53
12	沉浸在法语学习中	62

在非洲之事奉

13	终于抵达尼日尔	73
14	高尔美，我们来了！	77
15	医疗事工	88
16	珍珠的服事与光荣的出世	101
17	扩大的医疗事工	107
18	建立与扩展神的教会	116
19	孩子的教育	121

东亚区及更远的地方

20	重返家乡的挑战	128
21	从差会基地到国际领导	133
22	尼日尔，我们回来了！	138
23	永远是上帝的仆人	143

	后记	147
--	--------------------	-----

	参考文献	150
--	----------------------	-----

	黄景青医生普世宣教纪念基金	151
--	-------------------------------	-----



推荐

这是黄景青夫妇的感人故事。他们的一生见证了神如何大大使用完全委身于祂的人。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录，也必启发新一代的跨文化宣教士。

苏诺铭牧师博士 (*Bishop Emeritus Robert Solomon*)

新加坡卫理公会荣誉会督

无论你是忠心的一般信徒或是投身于全球宣教的门徒，黄景青夫妇的故事必激励和指点你。黄景青来自西马来西亚，出身贫寒，在三岁时逃离家园来到新加坡。虽然在起跑线上看似平凡，但景青后来成为SIM在东亚区域发展的推手，并与珍珠一起成为了动员亚洲宣教士的先行者。我强烈推荐《不被遗忘》！

博约书亚博士 (*Dr Joshua Bogunjoko*)

SIM 国际总主任 (2013年至今)

尼日尔高尔美医院前医疗宣教士

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传记！他相信并谦卑顺服神，接受了来自神的呼召做医生，树立了信心的榜样。自197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医学生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生命就一直激励着我。我为他的生命感谢神！

彭聪敏医生 (*Dr Peng Chung Mien*)

斐瑞公司和斐瑞医院总裁

基督徒医疗和牙科协会前主席

这本书讲述了神如何呼召、装备和授权祂的门徒来完成大使命的动人故事。这是景青和珍珠持续顺服和坚持不懈的有力见证。人人必读，尤其是想当宣教士的人。

李仕发牧师 (*Pastor Emeritus William Lee*)

巴特礼基督教会荣誉牧师

黄景青和林珍珠夫妇为基督的国度所发挥的影响力，只有到永恒才会有完整的答案。作为宣教士开拓者，他们在非洲西部的尼日尔通过行医有效地服事当地人。作为宣教管理部的同事，我们十分了解他们，他们在新加坡 SIM 东亚区办事处服事时，珍珠在人事方面的恩赐和景青对整个东亚区域的异象，都成为SIM内外许多人的祝福。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任务是太难的，他们总是怀着喜悦和谦卑去服事。

普迪曼博士 (*Dr James Plueddumann*) 和太太卡罗尔 (*Carol*)
作家兼 SIM 国际总主任 (1993 - 2003年)

他们谦卑忍受了所有你我能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环境，为尼日尔做出最大的努力，并把最好的献于神！因为他们相信“那些不认识基督的盼望而活在危难中的人们，他们灵魂的得救胜过世上的财富！”他们的故事会鼓励读者举起祷告的手，并接过他们传下的接力棒，在圣灵的带领下宣扬耶稣。

沈立德牧师博士 (*Rev Dr Michael Shen*)
新加坡神学院荣誉院长

每一个蒙召去宣教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黄景青夫妇是首批前往非洲的新加坡宣教士，在那个全球化和科技还没有盛行的年代，跨文化宣教充满着无穷的神秘感。这本书以轻松、易读的风格讲述他们的信仰之旅，见证了可畏的神如何为信徒开道路并供应一切。景青现在已不在我们身边，但通过这本书，他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 and 遗留下的仆人风范将继续激励人心。

王翠兰姐妹 (*Catherine Ong*)
通讯顾问及前记者

我们有幸在巴特礼基督教会认识景青和珍珠，亲眼见证了他们这对忠心宣教的夫妇，并树立了谦卑热心服事的好榜样。然而，在阅读这本《不被遗忘》回忆录时，仍然深深地吸引我。这本书的作者罗月媚姐妹透过他们夫妇的分享，为我们记录下他们在宣教中精彩的旅程。对于那些期待人生旅途不要留白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

邢诒年长老 (*Elder Heng Ee Lean*)
巴特礼基督教会宣教委员会主席

《不被遗忘》见证了神的真实和信实，没有什么是神不能成就的！对于所有希望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重新认识神的安静同在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袁国栋博士 (Dr William Wan)
新加坡行善运动秘书长

我对景青认识甚深，在他身上看到一位杰出的医生，也见到属耶稣基督热情的仆人。任何想要描绘他生命意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只有到了永恒才能显示出他一生带来的冲击，以及他对神的国在非洲和整个亚洲的扩张所产生的影响。我要对景青和珍珠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哪，你作得好！（太25：21）”

霍华德·布兰特博士 (Dr Howard Brant)
SIM 国际副主任 (1972 - 2006 年)

身为他们的朋友，我常关心他们在非洲的宣教并为他们祷告。我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信主过程、信念以及前往海外服事和促进宣教的呼召知之甚少。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罗月媚姐妹根据对他们和好友的采访，以及收集到的资料来撰写他们的传记。2019年1月，景青勇敢地与癌症搏斗后被接回天家，我的弟弟周雅各（他认识景青，也经历相似病情的折磨，10月也被接回天家）称景青为“宣教士英雄”。他们都属于一群重视大使命的新加坡朋友和家人。他们回应了基督在世上的遗言，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祂的见证（徒1：8）。我大力推荐这本传记，并祈盼它会激励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直到君王再来！

周振忠博士 (Dr Ernest Chew)
福兰克福音堂谘询长老/历史学家
新加坡福音团契/圣路加医院副主席
新加坡圣经公会副主席

《不被遗忘》是一个令人惊叹、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神如何使用两个完全将生命摆上给祂的人，以及神的教会在支持和维护他们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是对先锋宣教士的持续呼召，也是牧者和宣教领袖必读之作。

陈启恩博士 (Dr Tony Chan)

新加坡恩典浸信教会长老
门徒训练中心董事（前主席）
威克理夫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行政主任

这是令人振奋的故事！讲述的是超过40年的牺牲、忠心服事和顺服，不念世俗的财富、名誉和荣誉，在人们认为“被神遗忘的土地，黑暗的大陆”宣扬耶稣。为什么？景青的回答是：“一个灵魂得救胜过世上的财富！”景青的信念催动他事奉神至死不渝。愿荣耀归与神。

张来华长老 (Timothy Teo)

圣路加乐龄关怀护理有限公司主席
巴特礼基督教会前主席

景青和珍珠是宣教的先锋，启发了在医学院的我们思考和投身于医疗宣教。有一次景青从尼日尔回来时，我问他若要在宣教领域发挥最大的果效，应该专注哪些事项。他以一贯清晰坦率的口吻问我：“你愿意当副手吗？”现在，将近35年过去了，我感谢神通过景青来对我说话，几乎是先知性的话语，因为我发现自己在神的工作中帮助和支持别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做一名副手。景青本人谦卑和不爱张扬的性格就是成为别人的支柱的最好榜样。这本书让我想起他的内涵深度、真诚态度和对神的忠诚度。

陈来荣医生 (Dr Tan Lai Yong)

宣教士/讲师/医生

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黄景青夫妇在一次宣教大会上的演讲激励我探索宣教工作。他是一名不以安逸生活为目标的外科医生，他把神放在生命首位，顺服神呼召他作跨文化宣教。景青和珍珠所经历的宣教旅程将激励你为祂的荣耀而被使用。

万曙寅总干事 (Simon Wan)

威克理夫国际联会亚太区总干事（新加坡）

我们一起在中学和青年团契（巴特礼基督教会）成长。景青在青年时就立志要到非洲当一名宣教医生。当他遇上珍珠这位“好帮手”时，他们都委身忠心跟随神，成为最早到尼日尔服事的亚洲人。景青最吸引人的品性是什么？就是他总是从容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他把家庭和个人的安全、供应都交托给神。他这一生意义非凡，他把这一生都交托给了主耶稣基督。

吴国安博士 (Dr Andrew Goh)

IMPACT 杂志主编

生命泉源教会长老

景青和珍珠是普世宣教的亚洲先锋。出版《不被遗忘》是在亚洲推展普世宣教的一个里程碑。罗月媚姐妹撰写的故事捕捉了这一对夫妇独特的生命和激情，他们的故事体现出了勇气、牺牲、毅力、努力工作以及最关键的委身。无论神带他们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神的带领。这本书与一些伟大的宣教士传记如出一辙。

麦贵高 (Malcolm McGregor)

SIM 国际总主任 (2003 - 2013年)

景青和珍珠启发了新加坡和其他区域的一代基督徒。这本传记讲述了他们美丽且充满力量的故事，关于爱、完全的顺服和面对死亡仍然持有盼望。最重要的是，故事关乎伟大的神，是景青和珍珠一生都忠心事奉的神。

蓝住国牧师 (Rev Vincent Lun)

国度家庭教会主任牧师

坚决、坚韧、坚强，这些品性可以在景青和珍珠关爱人们以及服事耶稣时看到。同时，也在他们身处尼日尔和在新加坡培训从亚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时的每一个细节中看到。他们一起活出了仆人式的领导。他们的故事将继续鼓励和激励新一代人肩负全球宣教的使命！

马狄安博士 (Dr Diane Marshall)

SIM 国际副总主任（亚太地区）及区域发展全球总监（1995 - 2020 年）

这本传记记载了景青和珍珠的生活所带来的启发，他们放弃了美好的事业，顺服主的呼召。书中详细地解释一个完全委身于神的生命，如何能成为宣教的榜样，并继续激励、动员和感动更多人到宣教禾场。我相信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变成一名宣教士，或拥有一颗宣教心！

华生·拉惹勒南 (Watson Rajaratnam)

SIM 马拉维宣教士/前记者

SIM 东亚区总主任（2021年4月至今）

书中捕捉到了黄景青医生非凡的生命，鼓舞人心。这个故事必使我们屈膝赞美神！

吴伟良医生 (Dr Goh Wei Leong)

国际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东南亚区域秘书

在1980年代，我有幸拜访了高尔美医院。最难忘的是在一个酷热、漫天尘土飞扬的下午，在一个相当破旧的病房里见到景青和珍珠。当时我想：“这位称职的外科医生和他才华横溢的妻子，为何会出现在地球上环境极其恶劣的宣教禾场里？”我与景青一起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中国西藏探索之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当我和妻子在菲律宾服事时，景青是我的第一个非西方人上司。言语不足以表达我对这对谦卑、敬虔、亲切的基督的仆人的尊敬和爱。他们在属灵里充实了我的生命。

帕菲力博士 (Phil Parshall)

SIM 孟加拉和菲律宾宣教士

《不被遗忘》有力地见证了神恩慈的呼召，以及黄景青夫妇的回应，跟随神的带领到任何地方。他们与神同行，且享受整个旅程！我衷心地推荐这本传记，它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耶稣所爱的门徒见证神的爱和奇异的恩典。

叶立忠博士 (David LT Yap)

杨厝港福音堂谘询牧师

SIM 东亚区理事会主席 (2006 - 2018年)

鸣谢

我们为这本传记的出版感谢神。

这项计划可追溯到大约三年前，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愿意使用写作恩赐来撰写黄景青夫妇的故事的作家。我们很高兴认识了罗月媚姐妹。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分享了对写作的热忱，并祈望神能使用她来激励和鼓励其他信徒参与传福音和宣教的工作。在我们见面的两年前，月媚姐妹就已经读了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感人的传记而被启发，神感动她也可以从宣教士的传记开始写作。我们为月媚姐妹感谢主，我们衷心感谢她的爱心，在写作过程中与景青和珍珠同行。

在这本书的筹备过程中，因着景青的病情和治疗过程，采访和收集资料的速度放慢了。但是景青很积极地讲述神的爱和恩典，并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和珍珠一起继续协助提供材料，完整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向景青和珍珠献上最深的谢意。他们确实是主忠实的仆人，从日记、相册和回忆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的确，这些都是神在他们信心之旅中恩典和指引的记号。

我们也感谢陈伟风牧师和巴特礼基督教会的长老们。陈牧师写了前言，谈到巴特礼和他们深爱的这一对宣教士夫妇的亲密关系。教会多年来一直为他们祷告和给予鼓励。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支持，教会也慷慨地赞助了这本书的出版费用。

我们非常感谢封面设计的蔡文发弟兄和文字排版的余玉琦姐妹，感谢他们爱心奉献了自己的艺术恩赐，完成了这个动人故事的出版。

我们还要感谢负责英文版和中文版传记的编辑小组，他们共同的努力成就了这本书。英文版编委会主席为叶立忠博士，项目经理为黄富民长老，编辑部组员包括孙丽亚姐妹、黎树强博士和吴来莉姐妹。中文版编委会主席为林厚彰博士，项目经理为黄富民长老及编辑为陈雪莉姐妹。因着他们谦卑地各司其职，才使这本传记得以成功出版。

愿荣耀归与神。

陈序

景青和珍珠的人生故事，让我想起景青经常说的一句话：“生命只有一次，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基督所做的才会持久。”景青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相信祂的人提供了救赎的道路，而景青和珍珠的宣教故事也为许多同样回应宣教呼召的人开启了道路。透过他们在非洲禾场多年的经验，神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回到新加坡之后，策略性地进一步发展和扩大SIM在亚太地区的动员和宣教事工。他们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先锋。

跟许多人一样，景青和珍珠对神使命的委身影响了我早年的基督徒生命。我在1976年的一个青年营第一次遇见他们，当时他们分享神如何呼召他们到非洲尼日尔高尔美的医疗站服事。在领袖的鼓励下，我开始从学生生涯每周的零用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支持他们。多年来，通过祷告和阅读他们的代祷信，我对宣教的热情逐渐提升，最终他们帮助我和太太（姚洁仪）降服于神的呼召到宣教禾场事奉。

巴特礼基督教会的牧师们将永远记得景青，因为在每个主日的讲道后，景青都会来到我们身边，告诉我们他是多么感激我们的讲道并鼓励我们忠于神的话语。即使在我们觉得自己讲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仍然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或给予一个鼓励的拥抱。他不厌其烦地上前来鼓励我们，这是我们的福分。珍珠则通过作为宣教士妻子和两个男孩的母亲的经验，开始为亚洲宣教士孩子和第三文化世界儿童拟定整体性的关怀策略。通过不断地发展对亚洲宣教士孩子和第三文化世界儿童的关怀，珍珠身为亚洲宣教家庭的捍卫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普世宣教领袖中享有盛名和尊重。

在景青病重的最后一年，他教会我们如何凭着得胜的信心面对死亡。他祷告，而神也应允了祷告，延长了他的生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与珍珠、两个儿子和他心爱的孙儿们在一起。他经常说，作为基督徒，惧怕死亡违背了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景青用使徒保罗的话作见证时说：“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6-8）。愿景青和珍珠的故事继续鼓励并激励更多人加入宣教的行列。

陈伟风牧师 (Pastor Alvin Tan)
新加坡巴特礼基督教会主任牧师 (2022年卸任)

林序

我们为景青和珍珠夫妇感谢神。他们两人在青少年时期，甚至在他们相遇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和恩典。耶和華陶造并预备他们，他们就遵循神的话，到祂指示他们去的地方。结果这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一岁半的儿子光正前往西非的尼日尔服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光荣在尼日尔出生。神悦纳并使用他们成为祝福的器皿来完成祂荣耀的目的。

景青和珍珠是第一对由SIM东亚区办事处差派到海外的亚裔宣道士。正当他们寻求神的指引时，神奇妙地带领他们认识SIM，并肯定和确认了他们去非洲的异象。他们顺服神，这也推进了SIM东亚区随后在亚洲地区开展宣教工作。在景青和珍珠回应主的呼召之后，SIM收到了来自亚洲各方人士的询问，当中有许多位得到教会的支持，成功被差派到宣教禾场事奉神。因此，景青和珍珠的故事有很多值得讲述的理由。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也是一个生命降服的故事！景青和珍珠愿意凭着单纯的信心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谦卑地顺服主。他们在一个刚起步但充满活力的教会中受训的同时，也积极地门训年轻的信徒。他们获得了属灵的灌溉，也得到专业装备的机会，景青的专业是一名外科医生，珍珠则在新加坡财政部当公务员。主建立并装备他们，也赐予他们许多属灵恩赐，在宣教的旅程中被主所用。

这是个充满喜乐的故事！讲述着一段因福音而开始的伙伴关系。在景青和珍珠早年的装备中，他们从母会的牧师和领袖那里得到了敬虔的忠告。景青是巴特礼基督教会植堂元老之一，教会推荐他们做主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宣教旅程中，以祷告、鼓励和实际的支持与他们紧密同行。另外还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神的子民，特别是医学领域的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新加坡和澳州各教会热衷于宣教的信徒们，都称得上是

支持他们的福音伙伴。景青和珍珠经常对所有陪伴在他们身边并慷慨帮助他们的人们深表感激。他们见证说，每当面对事工的挑战时，常常在最适当的时刻，从祷告伙伴那里得到鼓励和支持，包括承诺为他们代祷的小字条、爱心包裹、家讯和贺卡等。他们深深地感谢教会的大家庭，以及许多与他们一同为福音同行的伙伴。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主在祂仆人的生命中动工，也借由祂的仆人作工。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壤上，神使之生长、结果。因他们的顺服并蒙主扶持，就有丰硕的收成。我们很高兴看到门徒们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站出来参与主的宣教工作，有些在前方第一线，有些则是后方重要的支持伙伴。这些连锁反应不断持续发展。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神的爱和祂奇异恩典的奇妙故事，也是一个神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揭示祂对世人的爱的故事！景青和珍珠经历过后，也带领许多人认识了我们的主的救恩。这本传记讲述了神慈爱的引导，并给祂行在信心中的亲爱的孩子们及时的供应。的确，这个故事见证了我们有一位多么信实的神！难怪景青在临终前说，他在天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谦卑地敬拜说：“主耶稣，谢谢祢如此爱我！”

本书原著是英文版，出版后广受欢迎并得到许多读者的美好回馈，因此我们决定翻译成中文出版，相信也会一样祝福中文版的读者。

最后，我很高兴能藉着这本传记向你呈现神奇妙的恩典、神对世人奇妙的爱、神的信实，以及向所有门徒发出参与祂荣耀使命的邀约！

林厚彰博士 (Dr Stanley Ling)
SIM 东亚区顾问
SIM 东亚区总主任 (2006 - 2021年)

前言

“你在这块被神遗忘的土地做什么呢？”一位穿越沙漠来到尼日尔的欧洲人，在高尔美医院看到景青时惊呼问道。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竟然能找到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让他既惊讶又欣慰。那天晚上，他把阑尾穿孔的同伴送到了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高尔美医院，由景青给他做了紧急手术救了他一命，最后还由SIM AIR的轻型飞机安全护送他们到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对景青和珍珠来说，非洲在神的心上，并没有被祂遗忘。神清楚呼召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只是凭着信心踏上他们的宣教之旅。神最终把他们带到尼日尔的高尔美医院，一家已经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宣教士在服事的医院。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的孩子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在这个偏远的丛林医院服事有需要的人。景青和珍珠像他们一样，在尼日尔留下自己的足迹，不留遗憾。

“神爱世人”这个真理和真实，充分体现在景青和珍珠对神呼召他们到非洲的回应里。“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就是这对夫妇倾其一生所做的事。

黄景青

早年时光



1

出生与父母从中国下南洋

景青生于1947年5月5日，出生地是马来西亚半岛柔佛州的奥斐山脚下的东甲县（奥斐山现名为金山）。他的父母是黄永昌和叶凤珠。景青排行老幺，在他之上已有四个兄长和一个姐姐；所以这个大家庭对于他的来到已没有太大的惊喜或庆祝。不过，他出世当天的早晨，天空一片晴朗，于是他的父亲给他起名“景青”。

景青的父母出生于中国福建省莆田，皆是兴化人。当父亲得知有一趟开往马来亚的船班时，他和几位兴化县的乡民抓紧机会登船踏上征途。那时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景青的父亲带着丁点的积蓄就背井离乡，来到异地寻求生机。那时候许多人从中国下南洋来到东南亚以便寻找更好的生活，景青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人。载满过番客的船抵达了霹雳州，那时的霹雳州已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城镇，当中还住了许多兴化人。父亲适应得不错，而且很快就找到工作。霹雳州正在发展，需要大量人手清除森林树木。之后，这份工作把他带到永平县和毗邻昔加末的峇都安南镇。这时他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他认为是时候把还在中国等他的凤珠接过来。很快地，凤珠收到消息后就在第一时间乘船抵达昔加末。之后他们在当地的教会办婚礼，并在峇都安南镇附近组织起自己的家庭。

上世纪40年代，当景青的父母都在马来亚时，知名布道家宋尚节博士也在当地展开宣教活动。通过宋博士的巡回布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来自东南亚及东北亚的华人都信了基督教。景青的父母听了宋博士的布道信息也信主了，成为基督徒。

景青的父母最终再南下到新加坡落户。他们离开马来亚的起因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时，马来亚联合邦是由九个马来亚州和两个英属海峡殖民地（檳城和马六甲）组成；而后1963年独立后改名马来西亚，领土也扩大涵盖三个直辖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

在此之前，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入侵马来亚，并在之后的三年零六个月在这块土地上实行统治。为抵御日军，许多华人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在柔佛州组织武装游击队抵抗日军。日治时期结束后，他们改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潜伏在森林营地采取游击战术，并在铁路和公路上进行埋伏，偶尔也会向居民勒索以筹募活动资金，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为景青的父母在组建家庭与维持生计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他们在柔佛赖以为生的杂货店很快便引起了这群不速之客的注意。游击队的活动将改变他们未来的生活以及去向。

2 漂泊的岁月

煤油灯在房间里发出温暖的橘黄色光芒，房间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已经睡着了，此时就是这对父母唯一可以不受干扰的谈话时间。最终他们做出了痛苦的决定，逃往新加坡！

游击战加剧了政治动乱，每个人都陷在此困境中，景青的父亲也成了受害者之一。游击活动需要资金，因此游击队员不断向他们这家货源充足的杂货店索取物资。父亲根本无法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他们常常会在无法想象的时间到来。于是，父亲学会了每当听到远处的脚步声时，就立即把门关上，然后一家人紧紧靠在一起，心跳因恐惧加速，迫切祈祷伤害不会临到他们身上！一天，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终究发生了。马共游击队把父亲掳走扣为人质。

他们要求赎金，于是家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倾尽所有挤出钱来。父亲最终被释放，但这家人的积蓄也被刮得清光，什么都没有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松了一口气，毕竟父亲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心理和情感上的压力对整个家庭造成了阴影。1951年，他们一家大小以及其他亲戚，在黑夜的掩护下，乘坐一辆卡车逃往新加坡。景青当时只有三岁。他的父母逃到新加坡时，口袋里只有相当于1.5美元的“财产”。

父亲很快在樟宜八条石（Changi Eighth Mile）的一块土地上安家，他在亲戚们的帮助下盖了一间房子。由于有那么多张嘴要喂养，他尝试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不久后，他们的后院就出现了蔬菜和鸡蛋，这都是可供出售来填补家用。后来，他们的临时农场也开始养猪了。

他们在那里住了6年，之后一家人搬到了巴耶利峇，母亲在那里经营一家杂货店，父亲则在一所慈善机构卫理公会福利服务社当文员。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家庭搬迁了几次，从巴耶利峇搬到广东民路的三房式组屋，再搬到陶纳路一间租赁的两层楼政府房屋，最后才搬到了杨厝港路的一间拥有四个房间的半独立式住宅，那是成长后的长子景祺买下的。那时，景青也已经成家了，是一名新加坡大学的讲师。

如此不断地搬迁，难道神在为景青即将到来的一次大搬迁做预备吗？

景青的父亲辞去了在卫理公会福利服务社的工作，转而在卫理公会天道堂当文员，这也是他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教会。夫妇俩学会了靠微薄的工资俭省地生活，但尽管如此，钱总是不够用。他们的家庭开销增长了不少。贫困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景青，我们只能从他在学校和宣教禾场的生活中推断出来。总之，景青非常节俭，也善于富创意地使用有限的资源，而且也是一个囤积狂！

尽管积蓄有限，父亲坚持让每个孩子接受基本教育。他对教育的看法很明确，“没有教育，我的孩子能有怎样的未来呢？我的

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会读书写字，不论男的女的，我的孩子不能变成文盲！”教育，就是这名父亲给孩子们的未来保障。他的这个信念为景青将来要受的教育铺平了道路，这也是神在景青往后的日子里要大大使用他的。

3

成长的岁月与早年的回应

景青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凝视他手上那一双洁白发亮的鞋子，心想：“这绝不是二手货！”这事发生在1954年1月，景青已经七岁了，次日就要到勿洛小学（Bedok Boys' School）读小学一年级了。

景青将鞋子紧紧抓在胸前，他深知父母为他做的牺牲。因为再把一个孩子送入学校，只会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预算更吃紧。于是景青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这双鞋子，让它尽可能可以穿久一点！

他回想当年：“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赤着脚走路上学，到了学校门口才穿上鞋子。我估算这样做会大大减低鞋子受到磨损的程度，这样一来，我就能满足母亲的心愿，把鞋子用上至少两到三年。赤脚走路对我来说问题不大，但是，若在短期内把鞋子穿坏了，那可麻烦大了！”

赤着脚沿着乡间的小路以及粗糙的路面行走需要勇气和毅力，因为这极具挑战性。往往景青要花上一小时才能走到学校。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学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零用

钱。对于这漫长艰苦的路程，景青从未怀疑或抱怨过。在他后来的生命中，我们会再度看见他坚韧的信念和处事的专注力。

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困境始终没有好转，景青求学的过程亦是如此。他的父母为了家庭生计没有多少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孩子们大多的时间都是没有大人看管的。庆幸的是，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常争吵或打架。对于那些年的往事，景青是这么说的：“我和兄姐们都很独立。其他人的父亲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交上‘坏朋友’，我们却从来没有让父母担忧过，我们结交的都是品行端正的朋友，因此也没有惹上什么麻烦。”

1956年，他们一家搬迁到巴耶利峇路，景青也转校到附近的巴耶利峇学校（Paya Lebar School）。在学期的中途转校没有给景青带来多大的影响，适应新环境对他来说就像如鱼得水一般。他在这里完成了小学教育，毕业那年是1959年。

景青在小学期间和其他上学的孩子没两样。但，在他小六那年发生了一件事，这让他将来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景青的父母固定参加卫理公会天道堂（Hinghwa Methodist Church）的兴化语崇拜。参与教会崇拜对景青的父母来说是常态而非例外，因为他们都想给孩子们传承信仰。景青小的时候曾受婴儿幼洗，虽然他喜爱上教堂，但对于信仰，他还未充分理解。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听道。父母教导他信靠神全然的供应，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神通过他父母的教诲以及牧者的讲道，在平凡的事件中将要塑造出不平凡的生命！

在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中，一位宣教士在证道中引用了马太福音9章37节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宣教士感叹在宣教禾场上严重缺乏做工的人。证道结束时，他发出一个呼吁：“神要工人到祂的禾场。若祂决定拣选你并预备你成为祂的其中一个工人，你是否愿意对祂说‘是’？”年纪轻轻的景青对这个问题很纠结。“起初我挣扎了一会儿。但，我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意识到，若神真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怎能拒绝祂呢？”当天，他的回应是肯定的，而那年他只有十一岁。

这场证道的信息竟然能够引起他的注意，说来也太神奇了，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个年幼的基督徒，或者说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这事之后，景青表示他真正接受主为他个人的救主是在1961年年末。既然如此，什么原因促使他在当年说“是”？只是理性上的赞同吗？我们只能把这事解释于神那双无形的手，祂总在背后工作。之后，景青立刻将这起事件理性化：“神怎么会使用我这个小男生呢？祂肯定不会对我抱有任何期望。”但结果将让景青感到惊讶。因为神一直注视着景青，而景青也无法越过神的圣手。

景青很快就遗忘了自己的承诺，尽管这承诺还潜伏在他脑海的深处。在1961年期间，他会刻意从潜意识中剔除这个想法，而全神贯注于其他问题上。神并不着急，这位伟大的纺织师正在一针一线编织着景青的生命，只是还未向景青揭示祂宏伟的计划。回想此事的景青说：“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神正在预备我参与

祂的工。” 几年后当他被采访时，他引述了约翰福音15章16节来强调呼召和差遣都来自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但现在，景青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属灵上。

在少年时期，景青开始思考人生并得出惊人的结论。“我要如何过我的生活？寻找我自己的目标，还是寻求神的旨意？寻求我自己的光荣，还是祂的荣耀？寻求我自己的志向和事业，还是祂的？无论我如何从祂的话语中查找，我只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我的生命并不属我，那是属神的，而且是为荣耀祂的！既然我要以生命荣耀神，参与宣教对我来说便是最自然的结果了。” 无需多久，他很快就会被引导来执行这一份信念了。

4

巴特礼基督教会的早年事迹

1960年景青升上巴特礼中学。1961年，巴特礼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Bartley Youth for Christ，简称 YFC）成立。YFC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目的是接触年轻人并把福音传给他们。每周五下午，YFC在巴特礼路的中文会堂（Bartley Road Chinese Chapel）定期举办聚会。虽然协会才刚成立不久，但这里的聚会充满活力的消息在学生群中传开了，景青连同几位中学同学也参加了YFC的活动和圣经班。这为他的属灵转化奠定了基础，使他从属灵沉睡中惊醒过来。景青表示：“神通过YFC找回我。我开始认识祂，信靠祂做我个人的救赎主和生命之主。”

景青归向主无疑是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单一事件。对他来说，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核心，顺从祂的旨意是必然的结果。宣教的种子在他11岁时播下，现在随着他的青少年时期开始发芽。当他迈入成年时，将是盛开的时候。

巴特礼基督教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帮助景青完成了神对他的呼召，他也是巴特礼基督教会创办人之一。教会培育他、塑造他成

为一名宣教士。当时，这是新加坡其中一所强调宣教以及专注于使命的教会。他们支持景青和珍珠在禾场上的工作，充分展现了基督肢体的荣光，也体现了服事君王的合一精神。景青的故事，因此与巴特礼基督教会的故事紧紧相扣。

1970年7月2日，来自海外基督使团（OMF）的诺盖特先生（Mr E W Norgate）对巴特礼基督教会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后，向澳洲SIM国际事工差会呈交了一份很高评价的汇报：“我曾打听关于巴特礼基督教会的信息，这是由中华传道会（CNEC）创办的一所相当优质的教会。论宣教而言，教会似乎有很好的展望。我留意到OMF偶尔会从这所教会获得帮助宣教士的奉献，而宣教士在这里接受语言训练后，便会前往亚洲的不同区域服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今天，巴特礼基督教会仍然被公认是新加坡一所具有强烈宣教负担的教会。

巴特礼基督教会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华传道会，之后此机构转变为福音自传会，今天称作国际福音协传会。教会能有今天的成就，要归功于当年中华传道会植堂的努力。

巴特礼基督教会英语崇拜的一大功臣是卢牧师（John Lu）和两任卢师母（Dorcas Lu和Jessie Lu）。他们留意到在那个地段有一大批接受英语教育的学生，随即便看见了传福音的机会。这对活力十足的双人搭档邀请了三来自新加坡圣经学院的在籍学生协助这个英语事工，他们是彭弟兄（Peck Hock Cheng）、温弟兄（Herbert Woon）和陈国明弟兄（Tan Kok Beng）。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且对神的工作充满热忱。

为了得到学生们的认可，这三位神学生通过户外游戏与活动来接触他们。那时候的男生多半喜欢放风筝和踢足球。通过足球，三人成功进入这群青年的生活圈子。他们明白虽然足球提供了建立关系的平台，但这并不能使灵魂得救。每当机会之门敞开时，他们都会邀请这群青年上主日学，并引导他们读圣经。与景青一起在巴特礼基督教会青年团契成长的吴国安博士 (Dr Andrew Goh) 回忆说：“你可以说教会是从足球场开始。他们会在假日与这群青年踢足球。”

1960年12月，当教会筹划假期圣经班时，彭弟兄、温弟兄和国明弟兄都会穿过泥泞小路，躲避甘榜（小村庄）的恶犬，分发传单邀请学生参加每周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的特别活动。只要让家长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孩子、和谁在一起，以及在做什么，家长们一般是很乐意让孩子参与这类活动。大约有三十名学生几乎每一天都会来到假期圣经班，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圣经故事。三位神学生讲述关于神的故事，祂如何以大爱来爱他们，并且差派祂唯一的儿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这都让学生们听得入神。那一周改变了那些青年的人生。突然间，户外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对属灵真理产生了渴望。这批青年的渴慕给三位神学生带来鼓舞，他们决定在星期天下午继续开办圣经课程。这三十名学生每星期都来上课，后来他们都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与此同时，*卢师母 (Dorcus Lu) 也在星期四晚上于教会举办圣经课程。许多人感觉圣经课程过于沉重，景青就是在那个时

**在第一任卢师母 (Dorcus Lu) 离世后，课程由第二任卢师母 (Jessie Lu) 继续带领。*

候参加了课程。如何持续保持学生对课程感兴趣是当时的一大挑战。按时出席的学生，减少到四至七人。巴特礼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在星期五的聚会人数则相当可观。为了解决不断下降的出席率，圣经班被挪到星期五晚上，他们也复制了青年归主协会的聚会模式。这个改变果然奏效！出席人数渐渐回升，圣经班逐渐变为青少年团契，人数在十五至二十人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巴特礼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的新信徒加入此团契，于是教导以及门训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较年长的基督徒青年顿时变成了主日学老师或圣经班导师。景青的哥哥景全（John）笑着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你比旁边的那个大一岁，你就会被委任为领袖，接获课程指南教导新人了！”

团契里的另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挑战。吴国安、袁国栋（William Wan）和洪弟兄（Anthony Ang）是当中几位积极参与的导师，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在这个主日学服事。他们都是巴特礼中学的学生，而且个个带着极大的热忱服事神。他们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热情，那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果不其然他们很快就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定时在休息时段祷告，也在下课后到洪弟兄或陈国明弟兄的家中祷告。他们里面内心火热，血液中是满满的热忱，那火焰从不曾熄灭！今时今日，他们仍然是忠心的中流砥柱，参与在教会和事工的不同岗位。这几位讲英语的青年领袖引起了卢师母（Jessie Lu）的注意，她深信他们有潜力带领一场完整的主日崇拜。

1962年7月1日傍晚五点，巴特礼基督教会举办了第一场英语崇拜，带领者是卢师母和一批还在念书的青年。卢师母担任了临时牧师。两年后，中华传道会聘请了澳洲出生的牧师（Andrew

Shue) 担任教会牧师。在此牧师的四年任期内，洪弟兄协助他服事教会。当牧师离任时，由洪弟兄接替，他也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本地牧师。

1966年，卢牧师邀请了刚从芝加哥邮政服务退休的魏约翰 (John Willis) 过来协助中华传道会的事工。1968年，64岁的魏约翰当上荣誉牧师。他以所谓的黑板事工而广为人知，也就是“用粉笔画图传福音”。景青则担任执事一职（等同于今日的长老），他也兼顾教会委员会和宣教委员会的主席，直到他出发到宣教禾场为止。

5

初次与SIM接触

景青的人生哲理是：“不是为了在考试中取得高人一等的成绩，也不是为了名列前茅，而是为了让神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即使我有时候会失败！”

景青要兼顾学校跟教会的事务，但他从不埋怨花在服事的时间，或许应该用在书本上。他知道他首要的身份是基督徒。所以，虽然他投入了大量时间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校际比赛，但他仍然能够腾出时间陪伴年轻的信徒到不同教会，例如位于石叻路的恩典浸信教会（Grace Baptist Church）。这所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包贺生博士（Rev Dr E N Poulson）。景青非常明白神对他的学业和属灵生命都一样重视。在平衡两者上，景青可说是游刃有余，所以上大学之前，他一直都这么做，他的委身并没有妨碍学业。吴国安博士如此说：“景青是个优秀的学生，在青年团契中，他也是最突出的一位领袖。”

1964年，景青完成高中学业后，到颜永成学校（Gan Eng School）完成了大学先修班，并取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报读医科的资格，但他更热衷于纯科学，如化学、天文学和数学。彭博士（Dr Peck Hock Cheng）鼓励他为此祷告并交托在神的手上，

景青听从了他的建议。但正当景青还在为此事反复思索时，他突然意识到神才是掌管他事业与未来的那一位。“对我来说，如果我真心相信祂是伟大、奇妙的神，那么我自当在我这一生中，尽我最大的努力与渴慕来事奉祂，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此外，服事神是向祂表达感谢的最有意义的方式，体现出祂对我有多么重要。所以，当我到了选择事业的时候，我就要按着祂给我的呼召将这事交托于祂。祂引导我修读医科和之后的外科，即便在开始时，我想从事的是其他行业。”

到头来，信靠神才是重中之重。最终景青报读了医学系。在不久的将来，他才会明白为什么神要预备他做一名医生。“随着时间的考验，神引领我学医的目的越来越清晰。显然的，神比我更了解自己。”景青即将发现自己正迈向医生的道路成长，以及之后成为外科医生。神正在为制定总体计划，一步一步带领他走向这个命定。

1966年，景青进入医学院并在那里考取医学学士学位(M.B.B.S.)。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整个大学生涯里，依然谨记着神对他的呼召。他一心一意坚守着使命，认识他的朋友无不对他充满敬佩。显然，他也得到一些同路人的帮助。

Shue牧师是其中一个关注景青坚守着异象的人，他帮助景青与SIM搭线。景青回想道：“为了让我坚守异象和使命，我的牧师在我就读医学院第一年时就向我介绍SIM。靠着这个紧密的联系，主耶稣通过SIM确认我去非洲的呼召。”

SIM成立于1893年，是一个国际性、跨宗派的基督教宣教差会。SIM的创办人是来自加拿大的高文（Walter Gowans）和宾罕（Rowland Bingham），以及来自美国的肯多马（Thomas Kent）。成立之初，SIM的英文全名是Sudan Interior Mission，中文名是苏丹内地会。经过几次的合并与变动，今日SIM的中文名称为SIM 国际事工差会，英文是Serving In Mission。

Shue牧师在圣经学院求学并兼职的时候就认识SIM。1966年，当他正想着为年度教会营会拟定主题时，他的脑海里闪过举办宣教展的想法。“正当我祷告的时候，主对我说，既然你是宣教士，为什么你没有教导如何宣教呢？”因此，在新加坡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宣教展成形了。他邀请了洪弟兄和景青的哥哥景全，与他携手举办宣教展。两人写信给各个宣教机构，索取材料供宣教展使用。

Shue牧师则写信给一位在澳洲的朋友，“我写信给在澳洲的伙伴，由他转发我的代祷事项，让那里的宣教机构提供材料让我们在宣教展展示。SIM是其中一个回复的机构，他们也提供了宣教册子与书刊。”接着，Shue牧师穿针引线让景青与澳洲SIM的昆顿（Arthur Quinton）联系上，他是澳洲维多利亚省SIM（SIM Victoria, Australia）的秘书。

Shue牧师当时并不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尽管他感觉到这次的展览为景青提供了进一步探索非洲的动力。Shue牧师说：“几年后当我再度遇见景青时，他告诉我当年是透过我的引荐，使他与澳洲SIM的主任尼尔（E J Neal）联系上的。”尼尔之后成为澳洲SIM的总主任，他在1976年12月7日写给Shue牧师的信中说：

“您会很兴奋得知黄景青医生和他太太珍珠已被SIM录取到西非服事。我相信您是第一位把黄医生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如果是，我要衷心向您表达谢意。我相信黄医生夫妇会成为当地的一大帮助！”

景青在给昆顿写信时，果敢询问SIM是否会接受亚洲人进入一个主要由西方人运作的机构。他在描绘自己的经历时这样说：

“我想进一步了解SIM是否会接受一名亚洲人参与这类宣教服事。当我10岁或11岁时，我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几年后，我求问主是否应该在本地或在外国服事，并且等待祂的指引。去年，祂清楚指示我到外国。在一个宣教大会中，我学习到我应该寻求主关于宣教的事，以及到哪一个国家去服事。通过设在新加坡的海外基督使团以及阅读一些关于宣教的自传和杂志，我认识了某些国家的宣教机构，也获知了一些宣教的机会。目前为止，我十分向往到东非埃塞俄比亚并与SIM 配搭。”

景青的中学同学托马斯·约翰（Thomas John）过后对于景青想到非洲成为宣教士的决定，表示惊讶。在那时候，大家都把宣教重点放在亚洲。

景青是在他医学院第二年时写这封信，它将成为一份载入历史的重要文件，因为在他之前，新加坡还未曾有人寻求与SIM合作。他这封信引起了回响。于是，1967年9月24日，当这第一封询问如何成为SIM宣教士的信写成后，成就了一个历史里程碑。其他亚洲人也随着景青进入宣教禾场。他可说是个开创历史的先锋！

澳洲SIM的昆顿连同尼尔联系景青。他告诉景青：“我们鼓励你迈向这个目标，尽管落实这目标还得看将来的契机。我们将会在下个周末于悉尼举办的行政会议中，将你的询问提交给澳洲的办公室。随后，我们的秘书尼尔将进一步与你洽谈。”

1967年10月31日，尼尔首次给景青回信说：“我很兴奋听见你渴慕到海外事奉主的消息，并相信祂会及时和明确的显露祂的计划。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成员巴理·希克斯医生（Dr Barry Hicks）在近期过境新加坡的时候有机会与你会面。”

于是，这开启了景青和尼尔的一系列对话，神给景青的计划即将展开。这最初的对话最终产生了强大牢固的伙伴关系。当巴理·希克斯医生探访新加坡的时候，景青和他见面了。另外，当景青前往澳洲接受宣教培训时，他们也再次见面。一路上，他结交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他们正帮助景青为将来的事工做好准备。

虽然景青明确知道他的呼召，但具体要往哪一个宣教禾场，他还不太清楚，即便他向昆顿透露“十分向往到东非埃塞俄比亚”。但随着接获尼尔的回复，“...并相信祂会及时和明确的显露祂的计划...”，于是景青寻求神犹如指南针一般。“主啊，我愿意去！求祢指引我！”

接触SIM之前，对景青来说，他所向往的宣教机构其实是海外基督使团。景青学医期间，在1969年参加短宣队到泰国南部的赛武里医院（Saiburi Hospital），那是海外基督使团创办的医院。

他从两位在当地服事的唐·哈里森医生 (Dr Don Harrison) 和大卫·辛普森医生 (Dr David Simpson) 学习如何做个称职的宣教医生。

与此同时，景青尚未知晓，神正在为他预备一个和他同去宣教禾场服事的伴侣。

林珍珠

早年时光



6

童年和一次濒死经历

“接生婆来啦！”急促的喊叫声响彻整间房子，几位热心的亲戚将接生婆领到房间去。一位母亲临盆在即。1949年3月12日，在接生婆的助产下，这位母亲顺利生下了珍珠。珍珠是林友发和李绍娥的第三个孩子，在她之前已有两个姐姐。

珍珠的父母一直希望有个儿子。对华人而言，儿子是很重要的，他们可以确保家族姓氏得以延续。两年后，母亲再次生下一个女儿，失落的情绪使这位母亲濒临崩溃...又多了一个女儿！于是，夫妻俩考虑把珍珠或她妹妹送给人。

华人有个迷信，“两只老虎”同在一个屋檐下会给家庭带来厄运，而且“幼虎会吞噬”尚未出世的男婴！珍珠的妹妹和母亲都属虎。于是，这对夫妻不愿冒着不能生儿子的风险，打算将珍珠的妹妹送人收养。珍珠曾打趣道：“出生在适当的年份（生肖），让我奇妙的避开了不幸！”然而，这段小插曲还是给年幼的珍珠带来了创伤，她花了几年时间才完全克服她的不安全感。

珍珠的母亲始终摆脱不了不能生儿子传宗接代的困扰。她曾询问过一位寺庙灵媒，灵媒指示她“蒙骗”鬼怪：“你把珍珠装扮成男孩来蒙骗鬼怪吧！”几年过后，当珍珠翻阅家庭相簿时，

发现照片中的自己竟是男生发型，这才让她确信母亲的迷信。然而，她穿的是连衣裙，不是男生的裤子。珍珠笑着回忆说：“鬼怪真的很容易骗，只需剪个男生头就可以了！”后来，她的母亲接连生下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在成长过程中，珍珠并没有遭到女扮男装的性别混淆，这是一个神迹。她相信在她年幼的时候，神已经看顾并保守她免遭心理和情感上的伤害。

珍珠成长的地方是新加坡大成巷的一个甘榜。她父亲是新加坡人，母亲则来自中国。父母两人供奉神明，母亲尤其受到华人传统迷信及道教和儒家信仰习俗的影响。

他们一家住在两层高的木屋，屋顶是用亚答叶铺盖的。同住的还有珍珠的后祖母、三位叔叔和一位收养的姑姑。屋子前延出一片露天的平台，使她们有多一块生活的空间。这家人从珍珠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房子。可喜的是，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

但，没有人爱做家务，所以只能把该做的家务分配好以避免纷争。屋子没有自来水供应，每天要从公共水龙头取水是例行公事。珍珠回想起每天都必须提着空煤油罐步行三百米取水。回程时，她需要费力平衡着肩膀上的竹竿，避免挑着的两个煤油罐里的水溢出来。后来，随着自来水供水普及，家里安装了水管，

大家都兴奋不已。以往那件从远处挑水的苦差事，没有人可以躲过。珍珠后来在困难面前展现出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态度，必定是从童年时期的繁重家务培养起来的。

珍珠的父亲在一家橡胶厂当书记，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家境不算富裕，但靠着父亲的收入日子还算过得去。珍珠非常怀念那些日子，“虽然贫困，但我们还是很快乐。我们周围有很多空地，还有大片果树和椰子园，我们喜欢在椰树下玩耍。我们家附近也有很多鱼池，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去抓鱼和玩水。当然，稍不留神就容易溺水，因为我们都没有学过游泳。”事实上，真有一次差点溺水，让家人震惊不已。

一天下午，一场雷雨即将来临，大人都忙着捡柴和收衣服。忙乱中没有人留意到一岁大的珍珠正缓缓走向屋旁的池塘，结果一头栽了进去。幸好，三岁大的姐姐告诉忙乱中的大人，她看见珍珠的衣服漂浮在池塘上。妈妈急忙冲去池塘，果然看见珍珠脸朝下趴在水面上，衣服中仅存的空气鼓了起来并“漂浮”着。母亲赶紧跳进水里把她抱出来，放在一个老铁锅上。刚从工厂回来的父亲为她急救。然后，再一路惊惶地将她送进新加坡中央医院。珍珠最终康复了，她把这事称为“濒临死亡”的体验，“我常常思考我是怎么从死亡边缘逃出的。医学报道指出溺水往往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在池塘里，我脸部朝下已经好一阵子了才获救。我能生存下来必定是个神迹！”

珍珠的童年丝毫不缺患病和对药物过敏的故事。她曾因神智不清、对药水过敏以及因恶作剧导致的意外而住院。这类事故让她的家人感到焦虑，他们常常对她说：“在你身上花了不少米饭！”意思是为了确保她健康成长，家人用了不少积蓄。从另一个开心的角度来看，生病的时候总是有好处。珍珠说：“当亲戚探望我时，他们会给我‘真’的玩具。那时，玩具是稀有的。许多时候我们玩的游戏和玩具都是自己用废料制作的。”

家里的大人对珍珠层出不穷的馊主意总是束手无策。有时，她的恶作剧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另一些时候，他们则作弄她，使她难为情。珍珠回想起一件事，直到今时今日仍会让她感到脸红。“有一次我在试验爸爸的剃须刀，结果把一边的眉毛剃掉了。妈妈觉得这样的我太丑了，就把另一边的眉毛也剃掉！结果，一家老少就不断作弄我，甚至写打油诗嘲笑我。令我好气又好笑的是，这件糗事很快就传开了。”她的祖母在她年纪大一点后开玩笑地告诉她：“在你小时候，你就是精力太充沛，住院期间护士不得不把你绑在婴儿床上！”

珍珠孩童时过度活跃的体力或许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麻烦，但在她迈入成年后，神却大大使用了她生气勃勃的活力。

7

早年的上学生涯和属灵觉醒

1957年1月2日，阳光穿透晨雾，这是个崭新的一天。珍珠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她终于可以和姐姐们一起到贝列菲小学（Playfair Primary School）上学了。原本一年前珍珠就被学校录取了，但因重病入院所以错过了开学日期。今年可以入学，令她雀跃万分。

为了做好上学准备，珍珠的姐姐教了她几句英语，譬如：“Teacher, please may I go out（老师，请问我能离开课室（上厕所）吗？）”学习以英语说出简单的紧急请求或征求许可，大大减轻了她的焦虑。不久后，珍珠就能说简单的英语了。

珍珠领导力的启蒙培训，可以追溯到她的小学时期。上小六那年，珍珠因为良好的学业成绩、行为和被认可的领导能力，被选为校纪学生长。这次的选举是对她品行的肯定。身为校纪学生长，珍珠负责管理其他校纪学生，并负责维持学校纪律。自然而然，这同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为身为校纪学生长，她的一举一动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这开始了重要的训练程序，为她日后的领导能力奠定了基础。

珍珠初次接触基督教是在小学的一个儿童聚会上。她第一次听见圣经故事，也第一次唱起了福音诗歌。有些故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譬如故事「邪恶之心 (The Heart of Pak)」，以及诗歌「唯一的一扇门 (One door and only one)」。虽然玩得尽兴，但对于基督教却是一无所知。她记得她无法“把信息应用在自己身上”。她对基督教的抗拒多少来自于家里信奉的道教，但顺从家人的信仰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出于个人的信念。

后来，一位同学向她介绍“以马忤斯圣经函授课程”(Emmaus Bible Correspondence Course)，这是她第二次接触基督教。参与者在完成课程后会获得邮寄的证书。参与此课程让珍珠感受被重视，所以不管理由有多么琐碎，珍珠总算坚持完成了课程并收到了证书。圣经课程使她对基督教有更多认识，但她的心依然紧闭。对她来说，圣经只不过是一套素材良好的故事而已。

当珍珠在预备小六会考，也就是小学毕业考试那年，她的生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小六会考一直以来都是每个小学生的梦魇，而那是升上中学的必经之路，若要进入理想中学，不仅要考试及格，还要考到优秀的成绩。因此，新加坡的小学生在念小六时都经历过无比焦虑的时期。

在这一个关键时期，年幼的珍珠开始认识神。在一个特别安静的一天，她独自一人时，首次祈祷说：“神啊，如果祢真的存在，恳求祢帮助我通过考试。”这个急迫的祈求发自一颗焦虑的心，虽然祷告的对象是神，但她还未曾真正认识祂。即便如此，神垂听了她的祷告，她通过了考试也获得了报读中学的资格，

让她松了一口气。于是，她对基督教的好感持续升温，但神的形象依旧遥远，耶稣基督也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只停留在历史课本上，因此我只把祂当做一个历史人物看待。”小六会考的经历虽然没有拉近她与神的距离，但却敲开了她的幼小心门，照进一丝亮光。

1963年，珍珠就读丹绒加东女校（Tanjong Katong Girls' School）。这是她人生中戏剧性转变的开始。一位同学曾多次邀请她参加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的聚会，聚会在课前举行。她想到这类聚会是为基督徒办的，所以就推辞了。经过几番邀请后，珍珠终于接受并第一次出席聚会。当时聚会的讲员是李先生（Lee Lau Tee），他把耶稣比喻为新郎，并邀请所有人参加祂的婚宴。他补充说这是免费的，但宾客必须回应邀请并要穿着得体。珍珠从未用过这样的角度看待耶稣。“这是第一次听到以这种方式介绍耶稣，把祂形容为我个人的新郎和救主。我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询问一位同学，我想知道接受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对她来说，现在更真实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旅程的开始。出于盛情难却最终出席聚会而有所触动，让她决定寻求更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珍珠联络了担任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主席的同学许姐妹（Rosalind Koh），她想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还有如何接受祂为个人的救主。1964年5月31日，在许姐妹的鼓励和引导下，珍珠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虽然没有听见天使们歌唱或竖琴的声音，但珍珠内心觉得非常平安和喜悦。“我终于回应了约翰福音5章24节，听从祂并信靠祂。当时，我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这节经文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 24）**

珍珠的二姐在较早前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因此她们一起上教会，认真对待信仰，但她们的母亲为此感到震惊。母亲之前准许二人上教会，因为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新玩意。但如今，她们的热忱却让她慌张起来。她开始实行禁足令而且还埋怨、指责并向她们发出警告。

母亲的威胁和警告本以为会削弱她们的决心，结果却适得其反。基督教徒往往在逼迫下更坚强，她们也不例外。姐妹俩彼此打气，从圣经中获得力量。在胁迫下，神的话语显得对生命更具有意义。圣经里的每个字和每个应许变成了力量和安慰的泉源。教会里唱的诗歌，也让她们得到安慰，其中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安慰她们把焦点转回神身上。尽管如此，珍珠还是忍不住问自己：“为了这个新信仰而造成家人的反对和不满，真的值得吗？”她得出的结论是，能与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一切都是值得的！

姐妹两人下定决心为她们的母亲祷告，她们祈求神可以改变母亲对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她们顺服了马太福音5章16节的教导，希望母亲透过她们看到神改变生命的大能。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 16）**

珍珠和姐姐怀着敬意对待母亲，做家务也不发一句怨言。过了不久，她们的祷告以及坚韧的决心果然见效了。母亲总算妥协了，也可能是想挽回面子并夺回主导权，她设定了一条底线：姐妹俩可以去教会，但绝不可接受洗礼！

尽孝是华人文化的一项重要美德，母亲相信洗礼会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对基督徒来说，洗礼仪式预示着与基督同死、埋葬和复活，接受洗礼是顺服主的表现。当然，母亲对此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她一直认为没有了洗礼仪式，孩子们的基督信仰就无关紧要了。

珍珠的母亲真正恐惧的是属灵层面。她认为女儿信奉基督教会导致灵界冲突，而最终会祸及她们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她只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和保护。珍珠很想告诉母亲，无论如何她是绝对不会嫁给一个非信徒，但她还是勒住了舌头，因为那样绝对是徒劳无功的。

1967年，珍珠开始在巴特礼基督教会参加崇拜。她对早年在教会的经历有着美好的回忆：“60年代末，那是我接触巴特礼教会的开始，记得那时我就坐在椰子树下和一群来自Kwangaland的男孩们一同赞美主。”珍珠甚至还开始了一个事工，参与的女学生来自青年团契和青年会（Young People's Meeting）。

那时候，巴特礼基督教会的所在地是惹兰林都。过后，教会迁移了几个地点。“我们从惹兰林都的店屋搬到惹兰本查拉，之后

才搬到巴特礼路九弄。然后我们又转到两个借来的教堂场地，分别是位于苏菲雅路的马来亚基督教会和毗邻宝发路的诸圣堂。”现在教会已有属于自己的建筑，地点是巴特礼路一带的禾山通道。

教会重视平信徒的参与和委身，这里为任何愿意服事的人提供充足的机会，这让珍珠感到兴奋。“我在这里有许多服事神的机会，青年团契领袖、主日学老师、青年团契委员会、女执事、妇女团契、小组组长，还有许多其他特设的委员会等。”在教会各个领域服事帮助她在灵性上成长和发展。“当我参与教会崇拜和营会时，我的属灵生命也得到成长。神耐心的通过教会教导我基督信仰的功课。”关于教会所做的一切，最让她钦佩的就是教会特别强调海外宣教的使命。教会把履行大使命当成首要任务，这也是她能够认同的异象。珍珠坚信，“神内心关注的是宣教使命，若我们的心与祂同行，祂必会感到喜悦。”

伟大的神即将教导她这门功课。目前，她关注的还是其他棘手的事情。

8

到非洲的呼召

珍珠双手紧握着成绩单，大大的松了口气。她终于完成了初中会考，获得了普通教育证书。现在摆在前面的有三个选择，第一，报读高中，这将能开启上大学之门；第二，进入社会工作帮补家用；第三，报读教师培训学院（现名国立教育学院）的兼职培训，获取当一名小学老师的资格。

珍珠原本想报读教师培训学院。这所学院自成立以来，开放给获得普通教育证书的学生报读兼职课程，顺利完成此课程就会被分配到小学教书。珍珠一直以来都想当一名小学教师，而学院设立的兼职课程也符合她的个人计划。但正当她想报读的时候，开放给初中毕业生的兼职课程却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全天制课程，而且学员必须支付全额学费。珍珠犹豫不决，她担心父母是否负担得起。学院对于考获高级水准的高中毕业生则依然提供兼职课程。因此，珍珠觉得神有可能指引她选择修读高中，考取高级水准文凭。无论如何，这也是较实惠的选择，因为大部分学费将会由政府津贴。因此，当享有盛誉的丹绒加东女校新成立高中部时，珍珠就申请入校并且被录取了。

1968年，珍珠完成了高级水准会考。她怀着热烈的期待可以报读教师培训学院为考获高级水准的毕业生所设的兼职课程，但

无奈这项课程也被终止了！入学之门再次在她面前关上了。虽然她仍然可以报读全天制课程，但务实的她不愿这么做，因为父母还在支撑她三个年幼弟妹的学费。她也认为多出来的钱应该留给弟弟以后读大学，因为大学学位能确保找到高薪的工作，而且男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1969年8月，珍珠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被分配到财政部的总会计办公室上班。她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学习有关政府财政和问责制，以及国家机关运作的相关知识。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她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将会在日后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派上用场。

珍珠的工作占据了她的时间，但她依然每周积极参与服事。她不但在主日学任教，周末的查经班也由她带领。对她来说，属灵的义务比属世的工作更为重要。即便如此，神的灵仍在她心中激荡着一种她尚且无法理解的不安情绪。

1969年是珍珠人生的转折点。她参与了导航会门徒训练大会 (Navigators' Discipleship Conference) 的闭幕式。她的小组协调员陈宝莲博士 (Dr Florence Tan) 鼓励所有参与者从问卷调查中评估自己的属灵温度。

当她默默而诚实地思考每一个问题时，其中一个问题吸引了她的注意：“你是否愿意去非洲？”她被这个直率的问题吓了一跳。出于对神的爱，迫使她说“是”，但对于自身的不足使她退

缩。简单的“是”或“否”，从未像这次这么难回答。珍珠试着将问题理性化，也许神正在考验她有多顺服，所以问她是否愿意降服于祂，这就像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所以，事实上神并不是叫她去非洲。她还年轻，而且严重缺乏训练，神不过在考验她是否爱祂。但，越是将问题理性化，她就越觉得不安。若是被引导对非洲说“是”，又令她担心后果。在她脑海中，“非洲”二字总是挥之不去。最后，珍珠带着完全降服于神的心意祷告：“神啊，我不清楚是不是祢正在呼召我去非洲或者只是在试验我。我要顺从祢的旨意，我要把这件事完全交托在祢手上。”珍珠的焦虑反映出她降服于神旨意的挣扎。在她的计划里，从未联想过非洲这块遥远的大陆。

大会后的星期天早晨，珍珠花时间祷告和读经，与神独处。她被领到希伯来书13章20至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神的回复！神会装备她来执行祂的旨意，她只需要信靠和顺服。

早晨的灵修后，珍珠的心奇妙地火热起来。那天晚些时候，她便动身去教会。非洲再次被人提及，并引起了她的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神似乎快速连续地推动她去非洲！

第一位让她注意到非洲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三年级的杰出青年黄景青，他的事业前景一片大好。他们在青年事工上曾碰过面，但关系一般。令珍珠感到意外的是，景青递给她两份SIM的刊物《今日非洲（Africa Now）》。

盯着这两份刊物，珍珠惊叹：“哇，非洲！”神要告诉她什么呢？她将刊物放在教会的靠背长椅上并预备崇拜。当天的客座讲员是中华传道会（CNEC）的会长艾伦·芬利牧师（Rev Allen Finley）。这个宣教机构曾发起巴特礼基督教会建堂的。刚从非洲禾场到来新加坡的艾伦·芬利牧师向会众发出邀请，让他们考虑到非洲大陆服事。他说：“庄稼熟了，但可悲的是工人不够，非洲需要你！”当天的这个信息至少打动了两个年轻人的心。

第一位已经明确知道被呼召去非洲，而另一位还在探索中，但在不久之后将定意往非洲去，像是来自马其顿的呼声一样，非洲正呼唤她。

景青已经听见并开始预备；珍珠会不会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呢？

灵魂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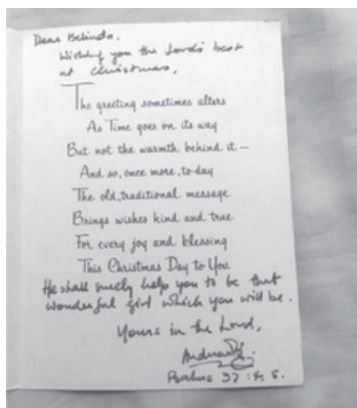


9

两颗心的相遇

景青比珍珠大两岁。他22岁那年已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三年级学生。他体型中等，少言寡语，表情严肃。但每当说话时，透过他鼻梁上的眼镜，总能见到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珍珠是新加坡财政部的行政人员，外表整洁利落，披肩的长发有点卷曲，眼镜后面是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但吸引人的地方却是她的笑容和开朗的个性。景青正期待着进一步认识她。

圣诞节给了景青一个机会。1969年11月30日，他递给珍珠两份由澳洲SIM出版的刊物《今日非洲 (Africa Now) 》和一张圣诞卡。贺卡上景青写着：“祂必会帮助你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位美妙的女孩”，另外还写了“诗篇37篇4至5节”，下方还有他的签名。珍珠心想：“这是多么奇特的贺词啊！”景青也引述了雅歌2章4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珍珠心想：“在圣诞节有人提醒关于神的爱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她矜持并谨慎地没有将此事过分解读。她也抛开所有愚蠢的浪漫幻想，决定只把



1969年11月，景青送给珍珠的圣诞卡。

景青当作一般的主内弟兄看待。但，似乎有什么东西或人想要把他们拉在一起。

教会正主办为期数周到大成区挨家挨户派发福音单张的外展活动。因着对失丧灵魂的热忱，珍珠和景青也参与其中。参加的会友被分配不同小组到社区内派发单张，珍珠和景青就那么“凑巧”被安排到同一个小组。这是让他们离开其他人，认识彼此的第一个机会。

其中一个晚上，珍珠没有出席活动，这给景青提供了打电话给她的借口。唯一的问题是，景青并没有她的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向珍珠的弟弟林天成要电话。景青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令他惊喜的是天成很乐意把姐姐的电话号码给他。

那晚，景青第一次打电话给珍珠。开始时只是简单的问候，但在挂电话之前，景青特别征求是否可以每天给她打电话聊天。珍珠回想说：“我傻傻的同意了，而且每夜都切切实实等他的电话！”珍珠认为愚蠢的事竟然演变成一桩美好的事。这点燃他们之间的爱情火苗，直到他们终身的承诺，使他们在灵里和神面前合而为一。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圣诞节前夕的下午，地点是植物园。开始时，他们只是随便闲聊，分享各自的故事。不久，景青就把话题转移到他去非洲的呼召。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明智的举动，除非是要把初次约会的女孩吓跑。试问有哪一个女孩想听见一个有着大好前程的准医生，抛弃他的前途而去一个被许多新加坡人认为是“黑暗土地”的地方服事呢？但，对景青来说，把

丑话说在前头是重要的。非洲并不适合胆怯的人，并且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他不能欺骗一个他正在追求的女孩，将甜言蜜语挂在嘴边不是他的作风。景青坦诚地说了该说的话，若珍珠想要结束这段关系，这也算给了她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个将成为景青终身伴侣的女孩，必须认可景青对非洲的异象。

令景青惊讶的是，珍珠分享了她的经历，神也跟她提起过非洲。景青的话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决心。珍珠透露：“当我遇见景青之前，神已经把非洲摆在我面前。当我们相遇时，我已经预备好了（去非洲）。”第一次约会，景青就对她产生好感，而珍珠也愿意投入到这段感情里。自那天起，他们之间的感情因着共同的异象而加深。看来神正在装备他们，让他们彼此造就，还有为着祂在非洲的事工做预备。

然而，对于这段关系，魏约翰牧师担心珍珠会让景青分心。珍珠说：“他提出了他的顾虑，担心我是否和景青有共同的异象，但这一切都是神配合的，因为我遇见景青之前，神已经呼召我了，我也把愿意前往非洲的心意告诉主。魏约翰牧师事后才知道这事。”景青心里相信他们的关系是神安排的，他说：“祂那双无形的手正在引领、安排机会让我们相遇。祂带领我与珍珠成为朋友。”

珍珠补充说：“神以奇妙的方式撮合我们。祂一直以恩典在我内心动工，直到我降服于祂的旨意。我是在顺从神之后才认识景青的。”认识珍珠的人都可以为她的品德作证。吴国安博士说：“当景青还是一名实习医生时，他并没有预备自己将来的人生会在伊丽莎白医院或其他知名医院度过。基本上，如果你选择

他做伴侣，你就会知道他的人生会朝哪一个方向前进。这也说明了珍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何等掷地有声的赞许啊！当魏约翰牧师观察这对情侣时，他彻底信服了神在他们两人生命中的带领。不久后，他也表达了对他们的祝福。最终，没有人质疑神就是他们的媒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天作之合！他们将成为彼此的良友、帮手和生命伴侣。

10 迈步前进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呼应着全体医学院毕业生的心情。伴随着强烈的解脱和希望，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毕业生们头上都顶着四方帽，那是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无数个通宵达旦的日子总算是值得的，他们都做到了！医学院的毕业生们脸上都绽放着笑容。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个个都胸有成竹能在新加坡大放异彩。这是197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班。

景青终于获得了医学学士，他跟朋友一样感到兴奋不已。但有别于他们的是，景青的目光是望向非洲的。在1970年6月13日，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他给澳洲SIM主任尼尔写了一封信（这离1971年2月的期末考试大约还有8个月），询问了他与珍珠申请加入SIM的程序：“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在与SIM配搭下服事。”景青始终对他的呼召义无反顾，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还有一个先要履行的义务。

新加坡自1967年开始实行国民服役政策，也就是所有男性国民都需要服兵役。他们都要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新加坡警察部队或新加坡民防部队，完成为期两年的强制性国民服役。景青接受基本军训后，擢升为上尉，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当军医。他的宣教

计划被推迟了，事后看来，此次延迟是神为装备景青而设的，让他能够应付将来在宣教中出现的挑战。景青说：“事实证明，延误是神的带领，让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接受战备军训的时候，完成外科手术训练。对于我后来在非洲尼日尔高尔美医院的服事来说，这个装备相当重要。”神正在为他预备特殊的任务。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稍安勿躁。

此外，景青也必须履行为期一年的强制性医护实习以及其他义务。他因为拿着政府颁发的助学金上大学，因此他必须履行合约在政府部门工作六年。1972年，他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录取，并获得了外科手术硕士学位。庆幸的是，这回无须履行新的合约，他只需对政府履行现有的义务。培训期于1973年1月1日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外科实习生期间，每一周工作超过100小时。尽管时间很长，他珍惜着在手术室和教学经验，他明白将来在事工上，这是派得上用场的培训。总的来说，从1972年至1977年，他都在外科手术部门服务。

与此同时，一部分基于属灵需要，一部分基于为禾场的准备工作，景青和珍珠报读了晚间的神学课程。这是由青年使命团的门徒训练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开办的，艾得理牧师博士（Dr David Adeney）领导。他们选修的神学课程得到墨尔本神学院（Melbourne College of Divinity）的认证。对于能够在霍华德·佩斯克特牧师（Rev Howard Peskett）和庞荣博士（Dr Bong Ro）的指导下学习，景青和珍珠倍感荣幸。他们完成并通过了十二门科目中的六门，相当于在圣经学院的一年课程。

经过三年的爱情长跑，同时景青也完成了国民服役和外科手术训练，他和珍珠于1972年8月8日订婚。隔年3月31日，他们在巴特礼基督教会举办婚礼。那一年，珍珠24岁，景青26岁。婚礼由新加坡圣经学院的包贺生博士（Dr E N Poulson）主持。双方家人、亲戚和朋友不但见证了这对新人宣读婚姻誓约，包贺生博士也主持了他们的非洲差派礼。许多来宾感动落泪。



1973年，包贺生博士为景青和珍珠主持婚礼。

在1996年10月25日写给宣教士朋友帕菲尔（Phil）和朱莉（Julie）的一封电邮中，景青说：“在我们婚礼当天，我们愿将生命摆上到非洲去事奉祂。”自此以后，他们就会以黄景青医生伉俪的名分一起服事神。

那是一场绚丽的结婚典礼，唯一的遗憾是景青的母亲因病重而缺席了。他的母亲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出于这对新人一贯的作风，他们要求把结婚蛋糕派送给医护人员，以答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婚后，珍珠搬进景青父母的家。不久前，他们得知景青的嫂嫂也被诊断患上癌症。对全家人来说，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们目睹两位亲人身体日渐消瘦。1973年6月，景青的母亲安息主怀，景青的嫂嫂不久后也离世，而她才八个月大的女儿静琬，便由景青夫妇和其他家庭成员照顾。

不久之后，景青收到消息，他在国立大学攻读的医学硕士课程有一门科目不及格。失败是意料中的事，因为考试在他度蜜月不久后进行的，他没有足够时间准备考试。但值得欣慰的是，景青通过了澳洲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初级考试。1973年7月30日，他给澳洲SIM总主任尼尔写信提到：“我医学硕士的初级考试不及格，主却帮助我通过澳洲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初级考试，所以，我可以到爱丁堡、英格兰、格拉斯哥、爱尔兰或澳洲修读最后部分的课程。”景青宣布他的成绩如同气象报告那样，旁人很难看出他有否被人生中的第一个“挫折”影响。他积极正面的表情似乎表达他能从容应对。另外，他在澳洲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初级考试中名列前茅，因此得了金牌奖。

1974年，景青夫妇搬到加冷巴鲁，也就是他单身的哥哥景腾的家。他们的新家变成了用作基督教事工的场所。他们把家开放，每周都有查经以及团契活动，并欢迎新的信徒，让后者体验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家庭。他们也接待途经新加坡的SIM宣教士，景青夫妇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关于非洲以及宣教生活的信息。这些宣教士为回应神的呼召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成为他们夫妇的好榜样。

1975年4月12日，景青给尼尔主任写信，询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加入SIM在埃塞俄比亚的事工。他表明：“对于宣教的兴趣已逐

渐缩小转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景青深受宣教士巴理·希克斯医生 (Dr Barry Hicks) 的影响，他在前往埃塞俄比亚途中曾与景青夫妇会面。

景青还通知尼尔主任他将在年底前完成外科研究生学习。事情发生得比想象还快。1975年的第三个季度，景青已经考取医学硕士（外科）学位，以及达到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标准。现在，他已是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了。1975年12月4日，随着珍珠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焦点转到了家庭事务上。他们的孩子叫黄光正 (Nathaniel)，家人和朋友亲切地称他为“Nat”。景青夫妇自豪地宣布了他的出世：“主恩慈赐给我们一个儿子，体重 3.3 公斤！”光正的来到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先前来得更加忙碌了。夫妇俩达成共识，珍珠辞掉她在财政部的工作来照顾小光正。

1976年5月18日，光正出生的五个半月后，尼尔主任写信给景青，告诉他埃塞俄比亚的局势：

“就宣教医院而言，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并不乐观。由于政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很多问题。不久后，我们将要把医院的所有权交给他们。虽然仍需要医护人员，但政府要推广的是公共保健计划而不是治疗方案。不过，西部地区却有强大的需求，特别是法语区。”

这个消息虽是个打击，却不足以动摇他们。景青夫妇于1976年6月7日正式申请加入SIM：

“关于我们加入SIM的申请，我们已呈上表格，这离我们出发的日期更近了。我和政府的合约将于1977年年初结束。对于埃塞俄比亚关上大门，我们也感到难过，但对于神将带领我们到非洲别处，我们依然决定顺服祂。我们祷告神会以祂的方式使用我们。”

对景青夫妇来说，只要是神的带领，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在等待申请之际，不幸的事却发生了。光正出生后头两个月一直由外婆照顾，她突然中风了，病情始终不见好转，最终在1976年6月28日逝世。刚满七个月的光正失去了外婆。外婆逝世后，珍珠的兄弟姐妹在她有需要的时候抽空照顾光正，使珍珠十分感激。光正还算容易照顾，他跌跌撞撞的学步过程常为家人和朋友带来欢乐。

1976年11月26日，这对夫妇收到了来自澳洲SIM的电报，正式接受他们成为SIM会员：“我们很高兴通知您，即日起我们接受您和林珍珠为我们的会员（宣教士）。”

1976年12月9日，从景青第一次联系SIM的十年后，他终于收到了尼尔主任的来函，确认他们的会员资格，此时的尼尔已是澳洲SIM的总主任：

“兹证明住在新加坡加冷巴鲁第五十四座的黄景青医生和妻子林珍珠已被录取为苏丹内地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的医疗宣教士，事工地点于西非。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一切安排妥当后，尽快将他和她家人送往非洲。我们期待日期不迟于1977年5月或6月。”

非洲之行终于启动。1977年2月2日，景青正式辞去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外科讲师的职务，6月12日生效。但在2月11日，他通过书面申请将他的辞呈提早到6月1日。离开工作岗位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他现在有了家庭和该承担的责任。当他向父母透露他的计划时，开始有些反对声音，因父母几经辛苦供他上学，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们担心他的决定显得“疯狂”，毕竟那是他年少时血气方刚的决定。但他们也很爱主，所以最后也同意了景青的计划。

令景青感到吃惊的是他社交和学术圈的朋友对此事的反应。非基督徒的朋友以为他疯了！有些人怀疑他去非洲是因为有人出“巨薪”吸引他。就连他的大学教授也认为他过于冲动，如果他改变主意，他们很乐意为他保留职位。

景青的基督徒朋友也一同“凑热闹”。有人建议他挪后宣教行，先等儿子完成在新加坡的基本教育。他周围的人都声嘶力竭的喊话，提出各种善意的建议。朋友们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他应该多等几年吗？先累积多点外科手术经验和妇产科经验吗？或者去短宣就好呢？又或者继续进修神学课程，并在进入禾场前尽可能学会更多技能呢？另外，他必须学习两种新语言，而且到非洲还有跨文化障碍，这都给他增添了不少焦虑。前面的道路从来没有显得如此艰辛和漫长。但神平和微小的声音在繁琐的吵杂声中异常清晰坚定，把景青的所有顾虑及焦虑给平息了。祂提醒景青给他学位的用意，“主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学位不是用来确保我这一生成功和安逸的通行证，那是属于祂以及为了荣耀祂。若我把它用在其他用途上，我就是把自己看得更重要。我只能顺服祂的呼召。”景青补充说：“神给了我平安。我

常常祈求神若我按着自己的智慧和意志行，请祂把门关上。”景青很感激妻子珍珠一路在背后支持他。

魏约翰牧师也像鹰一样盘旋，确保景青不会偏离平坦正直的道路。珍珠微笑说：“他很支持我们，即使在我们后来离开非洲回到新加坡办公室服事之后，他也常常督促景青每一年都要往外走一趟。”其实，魏约翰牧师是教会中最早承诺支持他们的人之一。在1976年12月，当他得知SIM已经接受景青和珍珠成为会员后的第一个月，就写信给尼尔主任，表达了教会的支持：

“对于我们巴特礼大家庭的这两位尽职的会友即将出发的消息，我们深感不舍，但我们也很兴奋有这份荣幸，在神为有需要的人而设的普世事工上，将两位来自本堂的会友摆上。我们的祷告、关注和支持会陪伴他们同去。我们已经将五月份宣教月的宣教大会定在13、14和15日，景青和珍珠将在这次的大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预备期间，按教会和个人的层面，请SIM建议我们如何做准备？不只是外在的预备，也包括我们和他们的心。”

魏约翰牧师的信几乎等同于一个承诺，教会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这一对夫妇。接着在1977年2月28日，他再次通过书信，激发教会对他们的支持：

“你有没有因即将要发生的事而感到难过或喜悦？作为牧师，这种情绪上的冲突和矛盾正在我里面波动。在巴特礼教会，我们将要失去两位忠心、尽职的会友和执事。但令人兴奋的是，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这份荣幸将他们献上，让他们服事一个急切需要帮助的地区。在他们准备出发之时，我希望你为景青夫妇祷告，同时也顾念他们经费上的需要。”

魏约翰牧师给予的支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他们离开的那几年，魏约翰牧师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内心常挂念着这对夫妇，因他明白他们为顺服神所做出的牺牲。毕竟，这些年来他也做出过类似的牺牲，他比其他人更能理解。

珍珠回想道：“有一次魏约翰牧师寄来一本中餐食谱，让身处异乡的我真的非常感激。连同他寄来的信，还有《新闻周刊》和《今日基督教》文章。他很细心，他所关注的每一个小细节，我们都谨记在心。”

魏约翰牧师热心的支持可以从1985年4月他来非洲探访景青夫妇得到证实。那是尼日尔一整年中最酷热的月份。景青夫妇从首都尼亚美开车去接他，并安排他探访SIM各个事工，好让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有概括的认识。为了保护魏约翰牧师免受酷热气候的影响，景青夫妇建议他留在室内，为医院和教会的新建筑作画。魏约翰牧师的画以红、黄、黑三种颜色呈现，每一幅画还加上豪萨语的福音信息，至今这些画还在那里。

景青的另一项宣教支持来自他本身的医学团契。1977年4月29日，基督徒医学团契（The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的财政陈医生（Dr Tan Kay Soon）写信表示他们会全力支持。景青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他们确认了景青的呼召也为此感到自豪。陈医生的信如下：

亲爱的景青：

新加坡基督徒医学团契对于我们其中一位成员领受了神的呼召，成为全时间的医疗宣教士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充分意识到

摆在您和您家人面前的艰巨任务，但我们相信主的能力和同在将成为您们的力量。作为神国度的一份子，本团契很高兴为您的初始宣教费用提供2250元的资助。我谨代表其他成员，希望您和家人在预备出发去服事的使命中，得到主的引导和丰盛的祝福。

主内家人，

陈医生 (Dr Tan Kay Soon, 新加坡基督徒医学团契财政)

出发前往非洲之前，景青几乎履行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但还有最后一件事他必须完成。作为新加坡男性公民，在完成两年国民服役之后的每一年必须以战备军人的身份回营受训一次，为期10年，直至年满40岁退役。

在此期间，如果要出国数月，必须得到批准。尽管国防部已经答应逐年给他发放出国准证，但这表示景青需要每年更新护照，势必妨碍他在禾场的工作和居留申请。于是，景青决定以宗教理由申请延期履行战备军人的服役。1977年4月26日，他给澳洲SIM总主任的助理布伦南 (A R Brennan) 写信要求书面证明，以便他向国防部提出申请：

“为此，我需要SIM在信上说明：（1）SIM是一个基督教信心机构；（2）我的报酬完全基于信心，取决于SIM收到的赠礼或奉献，即我没有固定工资；（3）我是被差派到非洲做全职宣教士；（4）我以终身宣教士的名义加入SIM。”

景青的信显示出他为完成神的使命所展现的承诺与决心。布伦南及时回应了景青，景青也顺利得到了延期服役的批准。他和珍珠现在已做好准备参与在澳洲举办的宣教士候选人出发前培训，

这一项训练会让他们体验到所有与宣教士有关的事务，譬如差会政策、宣教神学、行政管理、跨文化沟通、非洲的工作内容等，并且许多有禾场服事经验的宣教士也将现身说法。与此同时，景青和珍珠还有机会以 SIM 代表的身份，到不同地方宣传 SIM 差会和事工。

景青和珍珠正迈出履行神呼召的第一步。从这里开始，他们走的每一步将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数年过后，当景青被问起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异象竟然如此清晰时，景青谦卑地回答：“清晰的异象是来自主。若我们继续寻求祂的旨意，我相信祂不会允许我们的异象变得模糊。但如果我们暗中惧怕祂给我们生命的带领，那么我们本身的意愿就会模糊了我们的异象。”对于紧密与神同行的重要性，这是个庄严的提醒。

1977年6月6日，景青夫妇前往澳洲墨尔本，进入了为非洲宣教做准备的下一个阶段。

信心之旅的开始

景青一家在严寒的冬天抵达墨尔本机场，但却没有做足御寒准备。他们只能裹紧外套，好让身子暖和起来。珍珠紧抱儿子光正给他保暖的同时，正设法找车子前往墨尔本圣经学院（现为墨尔本神学院）。他们预备在澳洲逗留五个星期。

景青一家第一天抵达就面临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当房东给他们递上三明治和饮料时，基于华人的礼节，景青夫妇客气地婉拒了。他们并不知道华人的婉拒，在西方是完全拒绝的意思，因此他们就此错过了食物，下一次进餐必须等到晚餐时间了。尽管又饿又渴，他们也只能继续等待，结果被告知傍晚六点会供应“茶点”！让他们感到错愕不已。他们心想，茶点肯定满足不了他们的饥饿吧？但当他们来到餐桌前准备“用茶”时，却看见一桌丰富的晚餐！从此，他们便放弃了华人含蓄的礼节，每当房东在午餐时间供应三明治时，他们就欣然表达真实想法并欢喜接受了。他们也会把“茶点”当成“晚餐”。珍珠笑着说：“把我的经历说成是简单的错愕和混乱，绝对是轻描淡写了，我感受到的可是惊人的文化冲击！”

寒冷的第一夜，让景青一家犹如探险一般。屋里没有中央供暖设备，他们只借来一台移动式暖气机。但这却不足以为整间房供

暖。他们本以为躺下就会好些，却发现床和床单同样冰冷。原本心里想的温暖舒适的夜，竟然变成了寒冷沉闷的夜。这会是他们整个澳洲之旅的常态吗？尽管异常寒冷，精疲力竭的身子驱使他们陷入了沉睡。

景青和珍珠在澳洲的培训十分密集，他们被安排到悉尼、布里斯班、汤斯维尔、伊萨山和达尔文接受训练。他们在悉尼花了两个星期接受宣教士候选人的培训，以及进行了三十七场的分享演说。大部分的夜晚他们都睡在圣经学院或是朋友家，在达尔文期间甚至会睡在大篷车里。他们最舒适的一晚是在汤斯维尔，当时巴理·希克斯医生 (Dr Barry Hicks) 和他的妻子罗宾 (Robin) 把主人房让给他们。巴理·希克斯医生曾在埃塞尔比亚担任宣教医生，1973年因心脏病发迫使他返回澳洲。1977年他被委任为澳洲SIM理事会成员。

景青和珍珠的培训内容包括一整天的会议，这些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在这期间，景青腾出时间探望了以前在医学院结识的同学。他还联系了义父义母，也就是曾经在新加坡服事的卢牧师 (John Lu) 和卢师母 (Jessie Lu)，他们曾通过中华传道会创立了新加坡巴特礼基督教会。1970年，他们回到了澳洲。卢牧师夫妇还把当地的基督教华人群体介绍给景青夫妇，接着又让华人长老会教会与景青夫妇联系。景青一家由于他们的款待、友谊和支持深感鼓舞。事实证明，华人长老会教会成为长期支持他们宣教生涯的众教会之一，一直到2019年1月景青安息主怀为止。

1977年7月26日，景青和珍珠带着更深广的宣教理念回到新加坡。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学到身为神子民大家庭里的一份子，被这些“家人”支持和服事，代表着非凡的意义。他们现在正期待着自己在非洲的事工。

但，景青和珍珠想前往埃塞俄比亚服事的心愿被消灭了，因为当地SIM的医院被共产政府接管了。既然通往埃塞俄比亚的大门已被关闭，他们认为最终的目的地可能是尼日尔的高尔美，尽管他们承认最终的差派将会由SIM工场理事会或总主任决定。对于此事，澳洲SIM的副主任布伦南曾在1977年1月24日写信给理事会说：“虽然他们在申请表格上没有注明想去服事的地点，但现在他们的焦点落在了高尔美，因为那是在法语区中最合适他们的地方。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反对去本贝雷凯医院（位于贝宁）。”

尼尔曾劝告景青和珍珠不要把焦点放在高尔美，虽然他曾提到高尔美是最有可能的地点，但也提醒他们情况或许有变。无论是高尔美或是贝宁，最重要的是学习法语，因为两个都是法语地区。尼尔大约于1977年1月25日在他们前往澳洲之前写信给他们说：

“对于所有想到法语地区事奉的宣教士，重要是必须掌握基本的法语。因此，在你们离开新加坡之前，应尽可能的多学一点，这是有益的。不过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丰富知识的人，在去工场之前，也会先到法国或瑞士学习一段时间。SIM曾尝试以各种方式培训宣教士，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位于法国阿尔贝维尔城的萨瓦省是迄今为止最佳的培训处。”

在尼尔的建议下，景青夫妇决定启程到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城。通过澳洲SIM的协助，他们顺利获得了入学资格。培训是从1977年9月到1978年8月。澳洲SIM于1977年8月出版的《SIM澳洲消息 (Australia News)》，宣布他们即将启程前往阿尔贝维尔和非洲的消息：

“我们很兴奋在澳洲接待了来自新加坡的黄景青夫妇和他们一岁大的孩子光正。他们现在准备前往法国阿尔贝维尔学习法语，然后将于78年中旬出发到非洲的法语地区服事。”

1977年8月，他们从澳洲回国的一个月后，景青夫妇受巴特礼基督教会的差派做跨文化宣教。他们是教会差派到海外宣教的首两位会友，也是SIM首次差派到非洲服事的亚裔宣教士。这件事意义重大，在SIM引起轰动。澳洲SIM的比尔 (Bill) 和乔安妮·丹尼特 (Joanne Dennett) 称这为“新亚洲触点 (The New Asian Connection)”，并在1977年10月的备忘录写道：

“这几年来，澳洲SIM的领袖已经意识到亚洲基督徒所展现出对宣教的巨大潜力，我们期待与他们分享主耶稣在非洲的工作，还有相关的需要与机会。今年，一对优秀的年轻夫妇被SIM录取并选为在西非服事，他们是第一对来自新加坡的宣教士。景青和珍珠曾忠心祷告并为这一步预备了许久，这期间景青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主已经兴起了所需的支持团队和祷告伙伴，他们来自新加坡巴特礼基督教会，而景青是教会的创办人之一。”

与此同时，澳洲SIM认为是时候差派代表到新加坡拜访基督徒领袖，以便寻找愿意担任SIM理事会成员的人，因为当时SIM在

新加坡还没设立办公室。新成立的理事会将会支援景青夫妇的事工。丹尼特夫妇自愿扛起这个责任来到新加坡与景青夫妇会面。他们从1977年8月8日逗留两周直到8月22日。探访期间他们的日程紧凑，中间拜会了这里的主要基督徒领袖。他们会见了李成伟长老，他是巴特礼基督教会的先锋之一，也将成为SIM差会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SIM东亚区办事处在新加坡注册后，李长老就同时担任东亚区办事处和新加坡理事会的秘书长，从1982年直至1988年在此全时间服事。

返回澳洲后，丹尼特夫妇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们在新加坡的经历：

“景青和珍珠为我们牵线以及安排了很多会面，并且每天带我们拜访参与东南亚各个基督教事工的关键人物。每个人都殷勤接待我们并给我们宝贵的建议。在主的带领下，李成伟长老领导成立了一个由专业人士和商界组成的理事会。这将帮助我们在新加坡分享SIM的工作，以及SIM宣教士在非洲的祷告事项和个人需要。”

对于丹尼特夫妇探访新加坡的行程，澳洲SIM在1977年10月版的《SIM澳洲消息 (Australia News) 》中，同样做出了兴奋的报道：

“丹尼特夫妇对该地区招募宣教士的巨大潜力，怀着极大的热忱！有几位新加坡人已被邀请组成一个理事会，他们对有意成为SIM宣教士的申请者进行考核。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深受鼓舞，希望可以进行后续的拜访。”

事情还在快速发展中。景青夫妇还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为他们的宣教事工筹募支持费。当他们意识到学习法语的学费、住宿费 and 飞往法国及非洲的机票至少需要两万新币的时候，他们不禁紧皱眉头。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啊！景青说：“对我们来说，凭信心筹集两万元是个巨大的挑战！”他承认：“这是主的道路！”，但在短时间内筹集这笔款项真的可能吗？

当一名教会会友自愿成为他们的财务筹款人时，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曾接受专业会计训练的李成伟长老也参与其中，帮助他们筹募支持费。李成伟长老的帮助减轻了景青夫妇的压力，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给基督肢体带来过多的重担。然而，教会顺服地迎难而上。朋友们二话不说就参与了奉献，其他受过景青夫妇帮助的人也乐意奉献。有些人承诺长期资助他们，而没有能力给予金钱资助的则成为了代祷伙伴。与他们有着同样异象的人，也给了他们非常慷慨的帮助。景青和珍珠被大家的慷慨和支持所震撼。1977年5月28日，夫妇写信给布伦南，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们真的很喜乐！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提前三个月供应了所需的两万新元基本费用。迄今为止，我们得知每月的承诺资助款项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了！”

由于教会只有大约一百名会友，这般慷慨的支持更加令人赞叹！景青夫妇内心感慨万千：“我们在巴特礼基督教会的朋友都很热情支持我们，他们身为新兴教会的一分子有着非凡的奉献精神。”对于所承诺的款项，教会说到做到，而就号召会友去宣教以及支持宣教士而言，教会也表现得非常坚定。1977年10月19日，王弟兄 (Wong Weng Pun) 写给景青一家的信中，表达了教会对于景青夫妇的承诺，也透露了教会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们在这里渴望听见你们的音讯。我们晓得你们非常忙碌，但如果你们有个别的祷告事项需要我们代祷，请告诉我们……看着你们将自己献给神真是令人难以言表，你们的见证对许多人，尤其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当景青夫妇询问SIM在高尔美服事是否需要汽车时，教会会友对此事都表示支持。其中陈弟兄 (Daniel Tan Swee Hock) 在1978年5月2日给他们的信中写道：

“毫无疑问，尼日尔、法国和新加坡的生活节奏都相当快，我希望你能为忙碌的生活做好准备。我们为你的事工添购一辆车子如何？请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敢肯定教会是百分之百支持你们！”

但景青和珍珠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们知道巴特礼教会已经为他们牺牲奉献了很多。他们认为只有在第二个任期时，当景青的职务拓展到需要负责三个法语国家的医疗协调工作时，他们才需要车子。

随着景青夫妇稳健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宣教准备工作，他们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其中来自美国科罗拉多泉市的美籍退休宣教士保罗·巴特尔先 (Paul Bartel)，在1977年3月至4月版的《SIM今日非洲 (Africa Now)》杂志文章中，读到他们的相关消息后便即刻联络布伦南，请求他帮助联系景青夫妇。保罗·巴特尔曾在中国服事，对于即将从事宣教工作的华人宣教士表达了极大的关注。1977年6月3日，澳洲SIM的副主任布伦南回复保罗说：“澳洲SIM希望景青夫妇是来自东南亚众多新人中的第一

对。”当《SIM澳洲消息 (Australia News) 》报导景青夫妇即将前往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城，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期许：

“7月26日，景青、珍珠和光正从澳洲的达尔文短暂回到新加坡后，将于8月31日前往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城。他们会不会顺利成为SIM旗下服事非洲的首对新加坡籍宣教士呢？”

如果SIM能够以某种方式预见未来，他们将看见在几年后亚洲对非洲怀有强烈的关注，特别是在宣教层面上。景青夫妇为其他新加坡人开辟了道路，更多亚洲人将接过接力棒。当巴特礼基督教会庆祝宣教三十周年之际，教会宣告：“景青把‘手榴弹’扔给了SIM，这激发了许多亚洲人参与普世宣教！”

从1984年到1990年担任巴特礼基督教会牧师的欧光耀牧师和景青夫妇是密友，他如此称赞这对夫妇：“他们舍己的行为影响了巴特礼的下一代宣教士。长期以来，我们的宣教士都是扎根于本土，但随着他们树立的榜样，挑战改成了‘谁会是下一个景青？’和‘谁会是下一个珍珠？’，这让我们把目光放眼海外。他们是我们的先锋和榜样。”

1977年3月，景青和珍珠接获来自SIM消息。景青回想：“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决定是否到西非的法语区尼日尔或是贝宁宣教。若是的话就要我们立即向法国的法语学院申请入学。”8月31日，巴特礼基督教会中最为杰出的先锋之一的景青与妻子珍珠，以及一岁半的儿子光正正式向教会告别，他们要出发前往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城。他们的语言课程将于9月12日开始。

结束法国之行后，到底他们会前往尼日尔的高尔美医院，或是贝宁的本贝雷凯医院呢？他们自会在神预备的时间里找到答案。

12

沉浸在法语学习中

飞机缓缓降落在瑞士日内瓦机场的停机坪上。这一趟从新加坡开始的长途飞行，途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阿联酋的迪拜和瑞士的日内瓦，他们计划从日内瓦前往的目的地是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城。

欧洲法语区的SIM主任克劳德·布洛克维尔牧师 (Rev M Claude Brocqueville) 到机场迎接他们。车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景青和珍珠。他们留意到经过的城镇都出现一个标志写着“Sortie”，同一个字在不同地方出现真的很稀奇。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法文的“出口”。这个字拉开了他们学习法语的序幕。

景青一家的第一站是到克劳德牧师的公寓吃午饭。克劳德的妻子朱迪思 (Judith) 已经预备了丰盛的午餐，等候着他们到来。SIM的宣教士兰迪·西蒙 (Randy Seamon) 和约翰·杜德克 (John Dudeck) 也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享用午餐时，克劳德牧师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譬如到哪里为年幼的光正购买尿片！饭后，克劳德牧师载他们到洛桑的StadtMission招待所过夜休息。临走前，克劳德牧师告诉他们隔天会送他们到阿尔贝维尔城的宣教中心。

清晨前往宣教中心的旅程是一场视觉盛宴，克劳德牧师沿着日内瓦湖开车，那是一条景色宜人的道路。山脉和山谷如诗如画、绿意盎然的植物、古色古香的房屋，沿着海岸线排列真叫人如痴如醉。当城堡若隐若现时，他们屏住了呼吸，宏伟的建筑竟是如此震撼，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见证了造物主的奇妙！

六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景青一家终于来到了阿尔贝维尔。从新加坡出发直到此地，他们花了三十多个小时！宣教中心坐落在阿尔贝维尔的阿尔卑斯山脚下。景青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阿尔贝维尔在山谷中，我们周围环绕着三千至五千英尺高的美丽山脉，在没有雾的时候，这里的风景显得特别优美宜人。”

他们被分配到三楼的一个公寓。景青这样描述他的住处：“这里有两个房间，就像是新加坡的三房式组屋（即两个房间）。”这种像家的感觉真的令人欣慰。公寓楼下设有儿童托管中心，这让珍珠特别放心。目前已有一岁半的光正有了可以让他安全玩耍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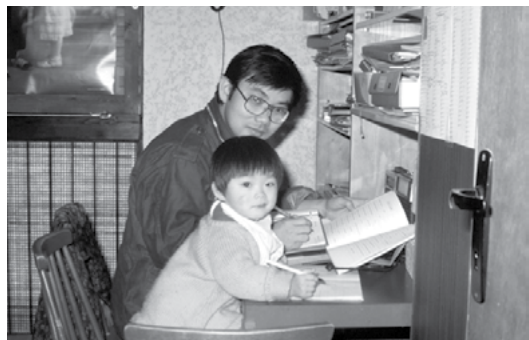
在迎新会上，景青夫妇与其他新宣教士学员打成一片，宛如一家人，非常兴奋与期待。但几分钟后当家长们被告知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免得孩子走近开放式的窗户时，屋内突然变得一片寂静。原来有个孩子从三楼高的开放式窗户失足掉落受了重伤！

那是来自加拿大SIM的宣教士夫妇桑迪（Sandi）和吉姆·斯内尔（Jim Snell）的女儿。他们原本打算在修读完法语后到贝宁宣教，但是当女儿因摔倒导致永久性半身不遂后，他们的计划就突然被打断了！听到此事后，珍珠的心十分沉痛。她在日记中

写道：“有谁能理解这样的悲剧？哪一个作父母的能挺过这样的煎熬？禾场需要工人，而这里就有一对预备好到禾场的夫妇，但他们被阻拦了…”。珍珠把这事记录下来。她和景青确定黑暗的权势正在打击神的子民。这促使他们前往禾场服事的心志越来越坚定！

景青和珍珠很早就起床了，迫不及待地迎接第一课。他们把光正带到儿童托管中心后就赶去上课。来自十八个宣教机构的五十五名学员齐聚一堂，他们被分配到初级班，讲师是玛德莫茜·夏尔 (Mademoiselle Chevallier)，她同时也是宣教中心的校长。她一开始就宣布所有课程将只用法语进行，这引起了不同的回应。有些人担心跟不上，有些人却对此表示欢迎。景青夫妇不知如何回应，但既然他们是来学习的，所以下定决心不惜付上任何代价要把法语学好。

学院的日常运作是：早上八点四十分开始灵修，九点之后进入法语对话和视听讲解环节。休息十五分钟后，他们就会到语言练习室进行口语练习以掌握当天的课程。谈起这门课，景青说：“我们通过法式教学法学习法语，而在课堂上或视听讲解时根本不能使用英语。”午餐过后，他们会学习法语语法、法语语音、正写法、法国文化和文明还有口语练习。下课时间是四点三十分。“课程非常密集，书写法文不在课上进行而是下课后的作业。我们还要绷紧神经因为每周都会有书写或口语测验！”



与光正在阿尔贝维尔城的宣教中心学习法语

学习一门新语言确实是困难的。珍珠说：“我发现念法语的‘r’相当有挑战性！这就好像在嘴里弄出一口痰，然后把它吐出来！”学员们不仅要在课室内使用法语交谈，在课室外也是如此。早晨八点三十分至下午四点三十分实施“外语宵禁”，除了法语，其他语言一概禁止使用。但父母与他们的孩子沟通时，仍可使用母语。但景青和珍珠并没有利用这个特权，即使再难熬他们还是决定熬到底，他们清楚最有效的学习法就是多接触多练习。他们给巴特礼基督教会写信，谈起了他们学习法语的经历：

“即使是刚毕业的学生也很难听懂快速讲出的法语。书面法文和口语法语是天壤之别，而且法语和英语之间很少有对等的单字。在沟通的时候，即使使用英法词典，依然洋相百出。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在下个月之前就能用法语对话。”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景青和珍珠都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相当于新加坡教育体系中的优等成绩。他们也学会看法文圣经，现在不但可以用法语对话，也能听懂法语的崇拜和讲道。

宣教中心的学生也会参与当地的福音活动。在法国的5300万人口中，只有少数听过福音，这让景青和珍珠感到惊讶。位于学院的教堂是当地唯一一所教会，参与崇拜的只有学院的职员和学生，及其他为数不多的当地人。这与主后177年，罗纳河谷到处林立着有主教主持的教堂时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今的福音派信徒只有区区10万人。因此，景青和珍珠决定用他们有限的法语，在这里努力分发福音单张。

谈到日常生活的时候，景青和珍珠向教会的朋友坦诚道：“我们正在学习如何简单生活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得到各方的帮助；但在这里，他们一切都要靠自己。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购买物品就像是一场噩梦。由于沟通出现障碍，他们有时会败兴而归。景青笑着说：“在法国的城镇，我们突然间成了文盲！”如此无助和无能为力，他们感到有点愚蠢。在阿尔贝维尔的生活，他们简略地说道：“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培训，提供了一个从繁忙的新加坡城市生活到之后的非洲乡村生活的过渡期。”其实他们现在只是稍稍地体验了接下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并从中获得了实用的生存技能。在宣教禾场上，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来得更糟。

收到家乡寄来的信是重大事件，围在信箱旁成了一种爱好。传统邮寄是最实惠的联络方式，因此这也成了当时最普遍的通讯方式。学生们每一天都会到他们的鸽子笼（专属信箱）取信，各人脸上或是兴奋或是无光，就可以猜到有没有收获了。谁会想到投入鸽子笼里的信件会有如此魅力？景青夫妇和别人一样期望收到教会或家人的来信。箴言25章25节美妙地总结了这种心情：“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难怪夫妇俩会迫不及待地读完所有信件。

1977年11月的一个严冬，他们就收到来自比尔（Bill）和乔安妮·丹尼特（Joanne Dennett）具有鼓励性的一封信，这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暖意：

“我们一直为你们三人祷告。难挨的冬天就快来了，学习语言想必也非常不容易，无论如何请坚持下去！亲爱的景青和珍珠，为你们三人致上主内的爱。我们很想过去探望你们，但现在只能靠书信往返。”

他们特别感激来自澳洲SIM的伙伴布鲁斯（Bruce）和西尔维娅（Sylvia），于1978年1月15日给他们带来尼日尔高尔美的消息。信里透露了关于当地的生活情况：

“之前你们问起在高尔美是否需要一辆车子，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在高尔美有三四辆车子供宣教士使用，大多数人会乘坐飞机来到尼亚美。目前的气候非常干燥，尘土漫天。这给不少人造成困扰，因为他们的孩子到了晚上就会不停咳嗽。电动加湿器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我现在提起是因为我曾在阿尔贝维尔见过其中一台价格最低廉的加湿器。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离开阿尔贝维尔前不妨去买一台。”

从SIM的同伴那里得到高尔美生活的点点滴滴使景青和珍珠特别感恩，他们可以拼凑出一幅更为清晰的画面。

只要收到家里的消息，无论是什么内容，他们都非常期待。景青的姐姐淑芳写道：“每一次回家，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你们的消息。非常想念你们，特别是小光正。他好吗？他会说法语吗？”而大哥景祺则写信告诉他：“父亲的脚已经好很多了，他现在不

需拐杖也能走路了！”大哥还写道：“我在亚细安贸易会展上给珍珠买了一瓶‘新加坡女郎’牌子的香水。”获知家里一切都安好，让景青和珍珠也可以放下心来。

他们对教会也是思念满溢。1977年12月13日，教会会友林弟兄（Lim Kim Twee）给景青和珍珠写信表示充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知道巴特礼一直在你们心中，也明白你们正面地回应了教会的领导层……你们想念我们，我们也想念你们……。”这种感情绝对是相互呼应的。

1977年10月9日，另一个会友王翠兰姐妹（Ong Chui Lan）的信中流露出的情感，或许在每一个参与新加坡加冷巴鲁周二晚上查经聚会的成员间，最能引起共鸣：

“我真的很想念你们三人，尤其是小光正，请代我亲他一下，告诉他这是翠兰阿姨给他的！你知道吗？我把他跟无尾熊的合照收藏在文件夹里，并把照片带进课室。每当讲课变得沉闷时，我都会拿出照片看一看。我要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属灵成长的帮助与鼓励。景青，你曾多次向我展现什么是温柔和真正的谦卑。至于你珍珠，谢谢你让我看见神会如何使用一个为祂摆上的姐妹，神可以通过她做出何等美丽的事。当然还有小光正，他给我带来满心的喜悦与快乐！”

魏约翰牧师给景青夫妇送去一系列的新闻剪报，让他们知道教会最近的发展。

1978年3月8日，洪博士（Dr Anthony Ang）在信中提到：“很高兴知道魏约翰牧师给你们寄去这里的新闻剪报。”他也高兴宣布：“我们都在为你们祷告。我们收到的宣教奉献越来越多！”教会完全委身在大使命上，从林弟兄于1977年10月的来信告诉他们有关教会的宣教活动，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事：

“我们的宣教委员会取得了新的进展，现在更能发挥所长了。我们成立了两个小组委员会帮助我们推广宣教活动。这两个小组是年度宣教大会委员会（Annual Missions Conference Committee）和宣教代祷委员会（Missions Newsletter Committee）。年度宣教大会定在1978年6月2日至4日，请与我们一起祷告，求主感动更多会友参与委员会的服事，并且求主提供举办会议的场所。宣教代祷信每三个月发行一次，第一期的代祷信在11月初发行。我们希望借着代祷信能分享宣教士的消息、事工进展和教会可参与的祷告项目。这样一来，我相信教会将全力支持我们在前线的宣教士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工。”

洪博士在信尾鼓励道：“希望你们定期给宣教委员会写信，因为我们很在乎也很想知道你们是否一切安好。当教会会友读到我们的宣教代祷信时，就会知道你们的情况并且为你们祷告。”景青夫妇根据要求照办了。在1977年12月12日，林弟兄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宣教代祷信在11月初出版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近况了。”

教会正在记录着景青夫妇的发展。教会给予的支持与肯定让他们看见自己并非孤军作战。迄今为止，在魏约翰牧师的发动下，教会会友给这一对跨文化的宣教士送上了一封最令他们深刻印象的信，充分展现了巴特礼对他们的支持。

在每一次的宣教主日中，魏约翰牧师都会放几张白纸在教会，邀请会友给他们一家写上个人祝福。接着，他会把所有的祝福黏在一起拼成一张长卷轴，然后自付邮费寄给远在法国的景青夫妇。想象一下，当他们收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样的惊喜？景青夫妇在读完之后，立即就把卷轴挂在三楼公寓的窗外，展开的卷轴足足有两层楼高！据说，魏约翰牧师制作了好几次温馨的长卷轴。珍珠回忆道：“当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至少收过两次。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感谢他们的用心。”魏约翰牧师的巧思妙想肯定在学院和高尔美引起其他宣教士的羡慕。

虽然来自家乡的信件使他们忘却思乡之苦，但使他们留下难忘经历的却是在学院与朋友的团契和情谊。他们特别受到一对美国夫妇大卫（David）和贝琪·麦克米兰（Becky McMillan）的鼓舞。

大卫的父亲赫克托·麦克米兰（Hector McMillan）在1964年刚果的辛巴叛乱中殉道。叛军处决了两百名外国人和数千名刚果人。尽管父亲不幸去世，身为八个儿子之一的大卫仍然决志将生命投入在神的事工上。大卫和贝琪后来为景青夫妇安排在里昂小住并会见一个宣教士家庭，以便他们可以向资深的前辈讨教。景青夫妇在阿尔贝维尔建立的友谊中，大部分都持续了一生之久。神向他们保证，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缺乏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和属灵上的支持。

当他们在阿尔贝维尔的日子接近尾声时，他们收到了将被派往非洲某个地方的消息。1978年3月，景青给家里写信：“我们刚收到尼亚美SIM的消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被派往尼日尔的高尔美，一个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地方。”不过最终决定还要等

SIM的讲法语工场理事会 (Francophone Council) 开会后才能确定。景青一家在阿尔贝维尔逗留了九个月学习法语后，现在只有两个星期为尼日尔的行程做准备。

在他们飞往尼日尔之前，景青受邀在第六届国际基督教医师和医学生大会 (I.C.C.P.,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ristian Physicians and Medical Students)，向一群医学生发表演讲。大会的主席是邱恩德教授 (Prof Khoo Oon Teik)，他是景青在 大学时候的教授，他认为让医学生接触 SIM 和了解非洲宣教士的需要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大会于1978年7月15日至23日在达沃斯举行，那里的医学会议中心对肺结核的研究是赫赫有名的。景青谈到在这个大会演讲的经历时说：“在达沃斯的那场会议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崭新和获益匪浅的体验，有助于我们准备高尔美的事工。尽管时间排得很紧，我们还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位医生与医学生会面与分享。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于宣教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们也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

1978年7月26日，景青一家飞往伦敦，他们将在那里停留十日，探访有相同心志的宣教士朋友，并从一个叫 ECHO 的向海外慈善医院提供设备的机构，寻找相关的医学书籍和手术用品。他们也为光正接下来四年的教育选择适合的书籍。

1978年8月8日，景青一家从伦敦飞往尼日尔。尼日尔在接下来的十二年将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

在非洲

之事奉



13

终于抵达尼日尔

1978年8月8日下午3点30分，景青一家终于抵达尼亚美。尼亚美是尼日尔的首都，也是最大城市，总面积为250平方公里。尼亚美坐落于尼日尔河岸边，是行政、文化及经济中心。

当景青一家刚踏出机舱，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滚烫的热气，他们的皮肤像被灼伤一般。景青把这个体验形容为“行走在飞机发动机的后面”！排气管所喷出的热气正吹向他们。那天的气温是44℃。他们两岁半的孩子光正在烈日下把身体缩成一团，那双小手缠绕在母亲的腿上。这是尼日尔给他们的欢迎式，在哈麦丹风季节（Harmattan season）白天的气温可达45℃，晚上则可骤降至10℃。

尼日尔在1970年脱离法国独立，但至今官方语言仍然是法语。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豪萨语、杰尔马语、富尔富尔德语、卡努里语、塔马吉克语和图布语。豪萨语是商业语言，在西非被广泛使用。超过90%的尼日尔人是回教徒，8%信奉泛灵论，只有1%信奉基督教，其中绝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尼日尔人口中大部分是回教徒，但其宪法允许宗教自由。

尼日尔是西非最大的内陆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十二大国家。虽然水域只有300平方公里，但总面积却达126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这个国家等于1752个新加坡，或是等于七分之一的中国国土。它的东北部与利比亚接壤，东边是乍得，南边有尼日利亚和贝宁，西边则与布基纳法索和马里接壤，西北部是阿尔及利亚。尽管尼日尔的土地面积看似庞大，但80%的土地都被撒哈拉沙漠覆盖。尼日尔位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其中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简单地说，萨赫勒地区是尼日尔南部苏丹稀树草原和撒哈拉沙漠之间的半沙漠过渡地带。除了散布在陆地上的一些带刺的灌木之外，几乎不见任何树木。法律也禁止砍伐树木。



欢迎来到西非尼日尔

五月是一年里最酷热的月份，下午的气温在42℃至45℃之间。在一月份，下午的气温在30℃左右，到了夜晚在沙漠地带气温可骤降至冰点。这里雨水稀少，但每当下雨时总是暴雨天。撒哈拉沙漠一半的面积的每年降雨量不到25毫米，而另一半的降雨量最多也只有100毫米。湿度可降至10%以下。干旱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因为他们多数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需要雨水灌溉庄稼。许多家庭都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食物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尼日尔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排名几乎垫底，2015年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187位。大约6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贫困现象是巨大的，人民的需要是难以想象的。第一次到这片土地的游客，亲眼目睹这般贫困后，在情感上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尼日尔由三十个不同部落组成，分布在大约一万个村庄中，各部落和平共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每一个村庄只有数百名居民。在沙漠地带几乎没有村庄的踪迹，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镇。农村人口包括以种植小米、高粱、玉米、谷物和花生为生的定居农民和游牧民族。所饲养的牲畜包括牛、山羊、绵羊和骆驼。这些部落居住在由稻草或硬化泥土建成的屋子，这类泥土看起来很像水泥，如同在太阳底下烘烤过的材料一样。当地人称这建筑材料为Bango。泥屋高约2.5至2.8米，很受当地人欢迎，因为它们比用锌盖做屋顶的房屋更便宜也更凉爽，可防白蚁的木屋价值昂贵且非常罕见。另外，也有一些像垫子覆盖的屋子，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些草屋。用水泥盖的屋顶几乎都是平坦的，每逢遇到暴雨时，这类屋顶大多都会坍塌，并造成严重伤亡。

这片拥有多元民族和极度贫困的土地，就是神呼召景青和珍珠前来的地方。当这对夫妇的目光扫过广阔干旱的土地时，他们突然明白为什么是尼日尔。他们一起为这片土地和人民默默祈祷。

SIM安排了两位澳洲人布鲁斯·迪普（Bruce Dipple）和布赖恩·沃尔（Brian Wall）到尼亚美机场迎接他们。布鲁斯是尼亚美法语圣经学校的校长，而布赖恩是法语区的财政。两人开车送他

们到位于圣经学校大院内的招待所。他们在那里住了六天，学习如何适应非洲的生活。景青、珍珠和光正是当时在那里唯一的亚裔脸孔。每当非洲的孩子见到景青一家时，就会喊着“Chinois”或“Japonais”（法语，意思是中国人、日本人），亚裔脸孔在这个地区是十分罕见的。

景青的两个孩子光正和（在尼日尔出生的）光荣，在尼日尔成长期间常常引来异样的眼光。多年后，光荣承认：“我们显然很不同，当中有语言和文化障碍，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一直被人盯着看。但成年后，我确实注意这样的事情是真的！”

1976年8月14日，景青一家终于搭乘SIM航空分公司旗下第一批以尼日尔为基地的SIM AIR飞机飞往高尔美。SIM AIR刚在尼日尔服务两年，所以景青一家可说是SIM AIR的早期乘客之一。机师是来自尼日尔SIM的宣教士，飞机很小，只能容纳四到六名乘客。SIM AIR 定期往返高尔美，除了载送宣教士、访客和工作人员到偏远目的地外，它还负责空运医疗物资和设备，从而确保高尔美医院的物资得到补充。景青给SIM AIR这样的赞许：“试想在荒野中营运医院所涉及的物流问题，需要常常补足物资和载送人员，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迹！”

从尼亚美到高尔美，景青一家花了两个小时。如果开车的话，大约需要八个小时。他们乘坐SIM AIR航班，机舱有六个座位，但因为已经到了最大重量，没有多余空间运送大件行李，因此夫妇两人只好另作安排将他们的行李送来这里。

14

高尔美，我们来了！

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着指定的降落地点。接近高尔美时，飞行员弗恩·贝尔（Vern Bell）低空飞行，让景青一家可以近距离、无障碍地捕捉到这一片土地的全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干燥、尘土飘扬的土地，棕色荒芜的地面一望无际。半沙漠



俯瞰高尔美

的地带可以见到一个又一个孤立的村庄。这就是高尔美。景青一家留意到龟裂的土地上有数个房屋围成一团，偶尔也能见到几棵零星的树木和灌木。树木和灌木是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唯一的绿色慰藉。每一个房屋群被布满沙尘的小道和小渠来回缠绕。他们的肉眼看到了起伏的岩石和沙地，而他们的心也经历了类似的起伏。伴随而来的是狂热的兴奋和一丝丝的恐惧。

弗恩·贝尔指向一条他会降落的跑道。当他滑翔快要到地面时，景青一家才发现跑道不是封闭式的。弗恩让飞机俯冲而下，藉以警戒地面的路人和走兽离开跑道。然后，他会再度爬上空中盘旋并预备正式降落。景青夫妇绝不会忘记这次的飞行经历。

当景青一家步出飞机时，他们受到了始料未及的热烈欢迎。景青开玩笑地说：“当我们抵达的时候，似乎医院的全体人员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于‘高尔美国际机场’热烈欢迎我们！开放式的入境接待处其实只有一张供三人坐的木凳！”大约二十名医院人员在那里接待他们。他们终于来到了高尔美，一个在神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地方。他们带着强烈的期许要眼看、耳闻，及呼吸村庄的气息。

当景青一家来到高尔美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这个村落只有三千人，大多数是当地的豪萨人。而塔马吉克人和富拉尼人是游牧民族并且经常迁移，因此他们可能不会在特定地点停留太久。大部分的塔马吉克人住在帐篷里，而富拉尼人则住在可折叠的小屋，那是由垫子组合而成的，迁移时方便携带。高尔美位于尼日尔南部，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偏远的豪萨地区。虽然位于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上，但高尔美基本上是一个“丛林”小镇，那里只有两条电话线可联系附近的城镇。

高尔美一年有三个季度。两个酷热的季节分别是三至六月和十至十一月，气温介于32℃至43℃。凉爽的季节则从十二月持续到隔年的二月，白天的气温介于12℃至35℃。六至九月为雨季，湿度中等，气温介于32℃至43℃之间。高尔美的年均降雨量约为500多毫米，一般上七八月的雨量最大。

景青夫妇的高尔美宣教之旅从最初抵步算起大约有十年之久。这趟旅程的第一天，当他们大步穿过机场的跑道时，发现距离他们将居住的院子只有几步之遥。谁能想到一个简陋的机场会成为他们新家的后院！高尔美的宣教士就住在从政府租借99年的开放式住宅区内。

福音站经理吉姆·卢卡斯 (Jim Lucas) 和他的妻子爱丽丝 (Alice) 也在那里迎接他们。吉姆和爱丽丝早在景青夫妇出生前就已经在这里服事了，他们对于这地的风土民情相当熟悉。吉姆说：“让我们带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新住所”，接着他又转向珍珠说：“但我们现在需要景青到医院去，有个病人等着要动手术。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吗？”景青还来不及喘口气安顿下来，就被领到医院去了。风尘仆仆来到高尔美的景青，现在正准备进行他在这里的第一个手术。

当景青和珍珠终于见到他们的住所后，就被它的空间震撼了！按新加坡的标准，这屋子是非常非常大！屋顶是用锌片盖的，泥砖墙上涂了洋灰，屋子里有三间卧房，他们把其中一间改成办公室；屋子还另外有独立的空间供他们生活和用餐。厨房有内置橱柜，让珍珠兴奋的是屋里有自来水水管，家庭用水来自一口约1200英尺深的自流井，但由于水管里的水直接来自这个水源，味道非常苦涩，因此需要过滤。



景青一家
在高尔美
的住所

房子里唯一的浴室有抽水马桶和一个用来收集排泄物的化粪池，有工人定期清空化粪池。每户家庭都有责任处理各自的垃圾，他们会在地里挖一个坑然后烧掉。尽管这十分费力，但景青夫妇却很认同这个差事所能达到的双重功能。首先，这能预防流行病传播，其次，这可为他们的菜园提供堆肥。

每户家庭有一片小菜园供他们使用，而吉姆则负责那一片院子的果树。酷热的温度和贫瘠的土壤一般不利于园艺，自从景青夫妇安顿下来后，他们会从河谷挖出表层土壤，并使用动物的粪便施肥。于是，他们成功种出豆子和瓜果，甚至实验性种植红萝卜和番茄。后来，一位瑞士宣教士给了他们草莓苗子，令他们惊讶的是，尽管旱季酷热，却成功结出果实！但是由于草莓吸引蜥蜴、鸟类和昆虫，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种植草莓。

他们每周会到高尔美市集买菜，在星期六偶尔也会到38公里以外的马达瓦市。当他们需要特殊物资时，就要拜托位于尼亚美和马拉迪的宣教士帮他们订购。尼亚美距离高尔美大约563公里，而马拉迪的距离则有200公里。无论距离有多远，SIM的宣教士之间都会发挥互助精神，协助对方购买物品。景青夫妇这样描绘他们的团队：“我们在这里的友谊真的是来自神的礼物。尽管我们当中有七个不同的民族，但我们始终保持着灵里的合一。”事实上，这个多元化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偶尔会出现矛盾，但总的来说他们学会了一起生活并彼此守望。景青一家很快便适应高尔美，也证明了尼日尔SIM是一个充满关怀的宣教士团队。

每周景青负责买菜，而珍珠负责做饭。买肉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体验。景青一只手拎着一个镀锌铁桶当做菜篮子，另一只手则提着一个弹簧秤。因为卖肉的摊贩大多只会凭着直觉开价，于是

景青自带的那个简单称重器就减低了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烦恼！

那么，如何把肉煮熟也是一项紧张刺激的挑战！对于当地的肉质有多硬，珍珠并没有概念，所以第一顿饭让他们的下巴受了不少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肉吃的干干净净。经过那一顿饭，珍珠尝试了高温压力的烹饪法，或把肉剁得细碎。不久后，她就煮出几道美味的肉类料理了。他们这家人吃“硬肉”的苦日子也终于结束了。



在高尔美享用的家庭圣诞晚餐

为了提醒自己来到高尔美的原因，景青夫妇觉得有必要学习当地语言。景青观察到：“在这里仅仅两个星期，我们就看到对村民说豪萨语比药物来得更为重要！”村民以及护士助手和助理主要讲的是豪萨语，因此若要跟他们有深层的接触，学习豪萨语是必要的。如果无法与助手进行不间断的沟通，就无法进行手术。豪萨语也是服事病人和与他们一起祈祷的必要语言。

景青一家的语文导师就是能说一口流利豪萨语的吉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吉姆给景青一家安排了每日四小时的豪萨语基本课程。虽然法语也很重要，但只有与官方或者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沟通时，法语才派得上用场。珍珠解释说：“学习法语后，没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就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看似不明智，但

豪萨语对于事工是真的很重要。”不久后，他们就能说几句了，譬如“bouda baki”是张开口的意思，“gaisuwa mai yawa”则是问候的意思。就连光正也能用豪萨语向珍珠稟报莎希亚（Sahiya）的行踪：“Ta tahi makaranta!”，意思就是她上学去了！莎希亚是一个非洲女孩，她在学校放假期间曾在景青家帮忙。

当景青一家与村民们熟络后，村民的慷慨和好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村民生活拮据，但对于社区里寻求帮助的人，就算是钱财上的请求，他们仍然义不容辞。家庭尤其重要，他们会竭尽所能，甚至自掏腰包来给予协助。

当地人也非常好客。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访。如果客人打算呆上一整天，主人家就得预备食物。若他们需要住宿，主人家也必须接待。没有客人会被拒之门外。主人家甚至会把客人介绍给每一位家庭成员和邻里亲戚。对于外来的访客，他们总是显得格外殷勤，这对他们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了。

为了进一步融入当地社区，景青一家参与了医院附近的当地教会。教会有一面用小石块砌成的墙，这所豪萨语教会有有一个讲台和十六张用实心水泥块制成的长凳。每张长凳高37厘米，长2米7。牧师是非洲裔，他曾受训于SIM的圣经学院，所牧养的会众有约三十个非洲人。

当地文化规定男女分开坐，这使景青夫妇很难识别会众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慢慢地他们还是有了头绪。景青夫妇注意到



1980年在高尔美教会崇拜后合影

这个教会还很年轻，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代祷，他们发现这是他们可以参与的部分。他们的事工正在逐渐成形，神正在逐步带领他们。

在高尔美的生活，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夜间的不速之客 - 虫子！种类真是多不胜数！景青说：“种类之多绝对能让昆虫学家兴奋不已！”由于灯光吸引它们，景青一家只能躲在蚊帐里，趟在床上，开着手电筒工作。尽管如此，蚊虫还是有法子钻进去。

十月份如海啸般的蠓虻才是景青一家最大的噩梦！蠓虻会在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出现，它们会依附在衣服、床、鞋子、水龙头、高压锅阀门、水壶喷口和几乎任何东西上。一位宣教士在参与会议的当儿，就有十二只蠓虻依附在她的衣服上；另一位则在饮料中发现一只，还有一位在刷牙的时候发现一只蠓虻藏在牙刷刷毛中！有一位特别害怕这些害虫的宣教士发现四只蠓虻趴在她的

圣经上，那页的经文是：“凡事谢恩！”于是，她便立即停止了抱怨。蠓虻军团也入侵了医院，无论是手术服、手套、无菌手术室、仪器和天花板上都可找到它们的踪影。景青从容地将之挪开并冷静地继续进行着手术，还将伤口完美地愈合了！

沙漠跳鼠会在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出现。它们显然喜欢炎热的气候，以及浑身是汗的人类！由于没有像蠓虻那么明目张胆，景青一家对沙漠跳鼠就特别网开一面、冷静待之。真正使他们难以忍受的是那酷热的天气，温度高达46°C！喝冰水和频繁地洗个冷水澡是解决之法。为了降温，他们的一些朋友还直接给他们的房子“洗澡！”他们会在屋顶、墙壁和地板喷水，到了晚上甚至会喷水在床上。临睡前，用湿毛巾做床单有助于入眠。

有时因湿度降至10%，空气变得特别干燥。景青坦言，在这样的干燥气候，只要使面包接触空气就能进行烘烤。他们忍受着嘴唇破裂、手臂破皮和被静电“电击”，这里的静电在黑暗中甚至都可以见到“火光”！他们的儿子对于静电产生的现象非常兴奋，例如只要把气球放在头上，马上就会“怒发冲冠”！

在哈马丹风的季节里，随风而来的是大量的沙尘。哈马丹风是一股从西撒哈拉沙漠的东北部或东部吹来的酷热和干旱的风。哈马丹风可以持续几天、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将一切都笼罩在沙尘中。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细小沙尘，通常有一两



哈马丹风季节的沙尘暴

千米高，掩盖了视线范围内的一切，这使景青一家有时甚至无法辨认出邻居房屋的形状！俏皮的光正说：“哈马丹太阳想必是又累又饿，它想吃了就去睡！”

尽管光正尝试以幽默化解危机，但仍然无法阻挡沙尘入侵所带来的噩梦。灰尘渗入每一个裂缝和缝隙，这使除尘、洗涤和清洁工作变得徒劳。洗了几轮的衣服不到几分钟又再沾满沙尘。屋子被沙尘覆盖，也不知要花上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清理。“永远做不完的家务！”这句话显然有了新的含义。在他们的愿望清单上，让家里变得“一尘不染”始终是难以实现的心愿。

然而，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被沙尘暴袭击的经历。景青的的确确曾经有这样的遭遇。有一天，一场交通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当景青为他们急救后已是凌晨三点，在回家的途中遇上沙尘暴。他闭着眼睛摸黑走路回家，偶尔透过眼皮上下之间的空隙，确保走向正确的方向。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头发和肺部都充满了沙尘，就连嘴巴也不能幸免。尽管如此，景青一家苦中作乐的打趣说：“厚厚的沙尘‘统治了’全地！”

但不是每一个经历都可以让他们苦中作乐。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巨大灾害，直接敲碎了他们的心。他们亲眼目睹暴雨如何严重侵蚀土壤，甚至造成河谷水位猛涨。在某些沙漠地带，山洪暴发将车辆冲离道路。1988年，当许多地区的降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位时，国家级威胁警报响起。另外，人民也会收到为“蝗灾”做好防备的通知。昆虫，尤其是蝗虫，是成倍增加的。通常一场大约50亿只蝗虫的瘟疫，一夜之间可轻易吞噬掉一万公吨的农作物。由于害怕这种情况出现，全国约有五万人被动员起来组成灭虫队伍。国外支援的飞机经常借用高尔美机场的跑道降落，飞往医院

途中的飞机在全国各地的上空喷洒农药，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蝗虫的蔓延。

其次就是饥荒。1984年，景青一家就经历了一场饥荒，据年长的宣教士说，这比1974年的那一场饥荒严重得多。农作物歉收的情况影响广泛，致使谷物价格飙涨，而牲畜的价格滑落到几乎一文不值。针对这种情况，高尔美展开了水力农业计划，但没能起多大的作用。到处都能见到大声呼救的人，游牧民族富拉尼人首当其冲，而定栖的豪萨人则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情况比起饥饿要好多了。发放公共援助的责任落在政府身上，70% 以上受到收成短缺的地区已经得到粮食的分配。同时政府也呼吁国际社会帮忙解决35万吨粮食短缺的问题。

SIM也做出了回应，派出几辆集装箱卡车载着谷物和粮食到受灾地区，宣教士们也动员教会施予救助。景青一家祈祷他们的“五饼二鱼”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更多人渡过饥荒。小儿子光荣深思熟虑地说：“他们每日的胜利都关乎着那些我们有时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 生胜过死，健康胜过疾病，丰收胜过饥饿。”

尼日尔生活的极大挑战深受天气和严酷沙漠的摆布，暴雨和干旱对生计造成的严重破坏，摧毁生命的疾病，生与死只能被动接受。在高尔美服事的一对宣教夫妇卡罗尔（Carol）和斯蒂芬·蒙哥马利（Stephen Montgomery）这样说：“这里的生活很艰难，孩子们从小就被训练去忍受任何形式的苦难，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从小培养起的。”

对于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那些试图通过努力工作并竭尽全力为自己创造更美好未来的人最终都放弃了，因

为成效缓慢，而眼前日常的需要让他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唯有神通过SIM差派来的使者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平和与盼望。

15 医疗事工

高尔美福音站经理吉姆也是一名医生，景青正加快脚步随着高个子的他急步走向高尔美医院。医院距离他们的住所只有274米。不到十分钟，他们就来到医院入口处。当景青和吉姆快步走向手术室时，他注意到有许多病人和他们的亲属正在周围徘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有一位宣教医生将其比作“热甲醛和腐烂体液的掺混”。

当景青一家刚刚抵达高尔美，吉姆就拉着景青到医院并介绍给正在准备进行剖腹产手术的内森·巴洛医生（Dr Nathan Barlow）。巴洛医生和即将结束一年任期的安德鲁·波特医生（Dr Andrew Potter）都在这所医院服事。巴洛医生是一名SIM的资深医生，暂时被借调到高尔美。现在景青已经来到高尔美了，所以他计划下周离开，前往中非从事先驱性的医疗工作。

景青带着歉意告诉巴洛医生说：“我从未做过剖腹产手术。我可以观摩一下吗？”巴洛医生回答：“当然可以。我很高兴由你来做我的副手。”景青很快就发现在这里只要观摩过一次，就得在下一个手术中实际操刀了！这就是高尔美宣教医院的“常态”！景青幽默地形容他的医疗经验是：“看一次，做一次，教一

次！”这里没有时间进行冗长及反复的教导和学习。每位医生都必须在紧急情况中，快速地反应并为手术做好准备，因为医院总是缺乏医生和护士。

高尔美医院是村里著名的地标。医院被二十五个知名的村落围绕，是名副其实的“丛林医院”。它也位于东西和南北路线的策略性位置，服务的对象包括了大部分的尼日尔人，此外，邻国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贝宁和布基纳法索的病患也纷纷来到此处求医。尽管这里偏远，却是许多求医者因慕名而不惜长途跋涉来到的医院。高尔美医院是一家由SIM所拥有和管理的非营利宣教医院，为病患提供慈善的医药治疗，以及转化生命的属灵关怀。医院秉持的信念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听闻福音的机会。



尼日尔高尔美医院的
入口处

这家医院由一对美国夫妇伯特·朗医生 (Dr Burt Long) 和他的妻子路德 (Ruth) 于1950年创立。原来的建筑包括一栋供这对夫妇居住的房子和一个T形的医院病房。今日，医院建筑已发展成E形，连同医院大院和飞机跑道坐落在一片梯形的土地上。由于医疗设备匮乏，医院刚成立的最初几年，面临了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问题是缺水和缺电。

前二十年，医院都靠着村里的男孩用驴车载着水桶来供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医院采用了钻井设备，这样一来便可抽取地下水，为医院和SIM的其他房子供水。当时，总共建造了两个水箱，一个用于高尔美医院，另一个则用于社区，为居民提供干净、安全的饮用水。因此，与周围环境相比，医院院子呈现的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象，这要归功于当地居民的努力。事实上，在高尔美地图上，这是唯一的绿色地带。

为了确保每一个需要医药护理的尼日尔人都能得到帮助，医院在上世纪七零至八零年代都努力不懈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景青在他任职期间和之后定期回访高尔美时，他都目睹、参与并发起了一些新的发展项目。如今，医院也提供牙科服务，还有一个每月可处理多达150次剖腹产的妇产科中心，以及每天为多达五百人提供的门诊。医院的病床数量高达154张。每日进行的大型手术介于五至十宗。鉴于医院位于偏远地区的事实，以上服务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壮举了。

随着村里的清真寺清晨五点唤醒村民晨祷的钟声响起，这就开启了高尔美典型的一天。对宣教士来说，他们会在六点三十分聚集祷告，然后就快速吃完早餐。宣教医生会在七点三十分到病房巡视。一般上，手术会在上午八点至八点十五分开始。优先进行的是有预约安排的手术，若有紧急的需要，也会即刻处理。剖腹产及妇产科紧急手术会排在夜间或午夜过后。外科门诊和复诊通常都会排在上午，如果医院只剩下一名外科医生，则会移到下午。

尼日尔护士、工作人员，及医生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工作，特别是因为医生数量与居民人口的比例是一对三万！医生们时常要保持警觉，有时在完成一场手术后，马上又要进行下一场，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住在医院附近也意味着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特别是当景青是唯一一位在职的外科医生。除了医疗服事外，当地的福音布道者和非医疗宣教士会确保医院里的病人、亲戚和朋友都能听到福音信息。



与高尔美医院尼日尔籍
麻醉师同事

来到高尔美医院之前，景青肯定反复在脑海中想象过在高尔美当一名宣教医生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然而，他每天面对的令人心碎的现实，却是之前无法做好准备的。他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痛楚，也从未目睹过如此大量的死亡。生与死在同一天发生，高尔美的日常生活就像是一系列的胜利与失败，高峰和低谷；而且时间匆匆，根本没有时间哀悼。因着紧急的需要，不得不继续前进。令人难过与无奈的是，如果患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帮助，大部分的悲剧原本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

景青悲叹道：“大多数的农村人生活拮据，几乎没有闲钱来满足其他的需要。” 政府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由尼日尔卫生部管

辖，但大约 89% 的个人医疗费用是由患者自己承担。大多数尼日尔人，尤其是对居住在首都尼亚美以外的人来说，医疗保健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因此，到医院求医并不是他们的首要及紧要的选择。

对于妇女来说，情况显得更加复杂，因为她们必须先征得丈夫同意才能求医。有时侯，由于妇女们本身的宿命观也耽误了治疗。一位母亲的两岁孩子经历了整整一周的腹泻和呕吐，现在生命垂危，这位母亲说：“阿拉（阿拉伯语中对神的称呼）在今天之前没有引领我到这里。”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延误的理由，因为她就住在医院附近！讽刺的是，正是她们的宿命论助长了她们沉默接受和冷漠应对频繁发生的死亡和疾病。

由于医院人手短缺和资源有限，每天可以接收的病人有限。看到诊所的候诊室挤满了抱着希望的病人是很常见的。看到一大早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时要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才能得到治疗，这确实叫人心疼。当中好些人甚至还要长途跋涉才能来到医院。“丛林出租车”是其中一个选择，但价格非常昂贵；有些人则会骑着驴车来寻求治疗。求医者带着各样的病症而来，从麻风病到艾滋病都有。肺结核、脊柱问题、肠道疾病、淋巴腺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晚期产科疾病和肠梗阻尤为普遍。

1978年9月12日，抵达高尔美两个月后，景青给澳洲SIM经理布伦南写信：“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经常会绕过其他医院来到高尔美，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以患上急性阑尾炎的哈鲁纳为例，他在一个现代化的沿海大城市工作，但却没有到市区的医院求医，反而千里迢迢来到两千多公里外的高尔美接受治疗。他乘坐丛林出租车，以一辆接驳另一辆的方式

在水泄不通的道路上，日以继夜地赶了四天的路。抵达医院的时候，肚子已经非常肿胀并且阑尾穿孔了！还好他在手术后保住了性命。这就是高尔美医院的“品质保证”，深受居民的信赖。



高尔美医院病房

这些等待求诊的人不是躺在医院走廊的担架上，就是坐在地上。每天有两百至三百个门诊病人，尤其是在繁忙的斋戒月季节。通常病房都会住满病人，一间病房可以容纳大约三十名病人。医院无法提供蚊帐，但会提供一套干净的床单。每位住院病人可以由一名家庭成员或亲戚陪同，为他们做饭和洗衣，然后在病人床边的地板休息过夜。

虽然景青的工作量大得不胜负荷，但他很庆幸自己能填补高尔美医院严重缺乏的人力。在1979年1月23日，他给布伦南的信说：“不管工作有多忙碌，为主工作总让人心满意足。”迄今为止，最令他筋疲力尽的经历是曾长达五个月的时间由他一人孤军奋战。基本上，在那段期间他承担了两名外科医生的工作量。在1980年11月的一封信中，李成伟长老证实了这一点：“据我们所知，景青目前正在承担两名外科医生的工作量。SIM 正紧急寻找短期医生和曾经在 SIM 服事过的医生前来缓解人手短缺的问题！”



手术室里的景青与外科医生

1980年11月，SIM发出了一条紧急电报，指出了这个问题：“尼日尔的高尔美医院严重缺乏医生！”结果，有三位医生响应了高尔美的呼声，包括英国的安德鲁·波特医生（Dr Andrew Potter），他可支援一个月；加拿大的唐·芒宁斯医生（Dr Don Munnings），可支援八个月，以及前家庭医生克里斯·曼宁医生（Dr Chris Manning）也可给予几个月的协助。神忠心的仆人对此等呼声总是义不容辞！

此外还有一位让人感动的是吉姆·塞顿医生（Dr Jim Ceton），他在1979年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高尔美全职服事。

随着他们的到来，光正便多了三个儿童玩伴，而景青更结识了“一位要好的朋友、宣教士同伴、外科医生同事和私人的理发师。”谈起塞顿医生的理发技能，景青坦言，离开新加坡以来，那是他剪得最好看的发型。景青说：“我们一起组成了一支很棒的外科团队，我们一起讨论所有复杂的病例，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经常当起了对方的副手，尽管工作量大，却是一种难能



景青与塞顿医生 - 两个一起服事并相互扶持的家庭

可贵的体验。当本地的工作人员休班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清理手术室。”这种伙伴关系给景青带来了许多乐趣与安慰。他们就像一支天上组成的团队，为高尔美属世的工作而聚集。

宣教士医生在高尔美医院工作时面临着多项挑战。首先，他们不得不忍受狭窄的走廊、昏暗的灯光、污浊的空气，以及炎热干燥的气候所带来难以忍受的酷热。此外，包括手术室专用洗手池的“水盆”，也非常老旧和生锈了。冷气设备也很脏，你可以看到苍蝇、蜥蜴和其他昆虫侵入冷气机里，并在医院地板上四处乱窜。

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在手术过程中突然断电！这个状况令外科医生倍感压力，也危及了病人的生命。景青说：“最糟糕的事情要算是在进行大手术时突然停电！用手电筒照明是很麻烦的，而在电池电量耗尽之前与时间赛跑，更是棘手！”

不幸的是，有一天在景青完成紧急剖腹产手术后，在最不合时的时刻停电了！子宫大量流血必须分秒必争急救，医护人员在黑暗中慌张的寻找应急照明设备，但结果却是无法操作。他们又再摸黑寻找手电筒，浪费了几分钟。当他们庆幸终于找到一支手电筒时，却发现电池快用完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抽吸泵在没电的情况下无法操作，因此伤口充满了血液。于是，景青只能与时间赛跑，在近乎黑暗的情况下尽可能处理好伤口。感谢主！他成功了！每个人都为母亲和初生宝宝松了口气。景青回想起那时的情况说：“有时我们会看到经营一家医院的种种问题，但神给我们力量胜过眼前的问题。”



在资源有限和设备陈旧的高尔美医院进行手术

另外，医院也面临其他挑战，譬如资源有限、设备损坏或过于陈旧。景青和他的同事经常会寻找代替方案和决定优先次序。按优先次序为病患治疗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理想情况下，任何需要医疗护理的人都应该得到救治，但无奈这里的医疗资源有限，所以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景青需要决定哪些病患应

该得到紧急的优先关注。换句话说，他必须进行分类来决定谁应该先得到治疗。他将此比作“位于战争地带的一间小型医院，这里有数百名需要医疗救助的受伤士兵！”当中最有需要和最有希望复原的人将首先得到照顾。这样残忍的决定撕裂了景青的心，但他必须务实处理。他说：“这在和平年代也很难做到，有时甚至会令人心碎。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做，如果在医疗保健的某一方面做得过头，就会剥夺了其他方面的资源，而那里可能有更大的需要。”

当他看到病人满怀期待地来见他，希望得到治疗，但由于还有其他更紧急的病人而无法给前者救助时，这种痛苦尤其令人难以忍受。例如“膀胱阴道瘘”，一种妇科手术中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生于全子宫切除手术后导致的膀胱损伤而不断漏尿，病患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患有这种疾病的妇女会被社会边缘化，被迫住在通风不良的泥屋里，因为她们散发出刺鼻的氨味，这种气味会弥漫在空气中，影响人们的正常呼吸。而且，这种气味非常重，即使她们离开医院后，气味仍然久久不散。景青需要决定是否立即为她们动手术或将她们与其他病人隔开，因为他需要考量这气味造成的困扰。他解释说：“如果你为她们动手术，就要为她们预备两周到一个月的病床。如果你接收太多这类手术，后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床位留给其他依赖药物治疗的病患。所以我们总是要在手术和药物治疗之间权衡轻重。由于我们经营的是综合医院，所以我们无法保留所有床位给接受‘膀胱阴道瘘’手术的妇女。尽管要让这些妇女等待三到六个月才为她们进行手术是艰难的决定，但我们仍然必须这样做。所以当你为病患进行区分时，你真的必须非常务实和现实。”景青在处理长时间分娩和膀胱阴道瘘方面的手术非常熟练，因此许多人慕名而来。曾去过高尔美好几次的新加坡医生黄春美滔滔不绝地说：“景青在膀胱阴道瘘

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因此在他照顾下的许多人都痊愈了，并可以重新融入社会。他像是给了她们新生命。”

此外，还有一个令景青左右为难的困境是如何处理那些因为处于疾病末期而无法治愈的患者。他回忆起一些病人是晚期溃疡性乳腺癌患者，动手术并不能起到任何疗效，只有神迹才能逆转病情。景青仍然相信可以做什么，让她们带着尊严面对死亡或减轻痛苦。但他会纠结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譬如是否应该为末期患者做一个全乳切除手术，目的只是为了消除恶臭？还是放手让病患死去？如果动用有限的资源，得到的只是让时日无多的病患减轻疼痛，他们是否可以将此决定合理化？景青说：“当一个贫困的、受苦的病人在你面前恳求你施予救援和怜悯时，要作出一个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脑和内心的拉锯战是极其痛苦的。患者不应被剥夺最佳的医疗服务，但在资源匮乏的医院里，别无选择。

另外还有其他可怕的疾病，使得这项宣教工作在情感上变得格外难以承受。试想：一个贫血的年轻母亲因为没能及时输血而死去、一个男人因为缺乏医疗设备而死去、一个少女的子宫表面长满了又多又厚的肉瘤痛苦不已、一个小男孩患上破伤风，病菌毒素使肌肉强烈抽筋，剧痛难忍、一名妇女因为子宫破裂导致胎死腹中、一名妇女患有疝气，腹壁肌肉缺损形成了一个洞，内脏向外突出，腹部出现了巨大的肿块凸了出来、另一名妇女患有大颈泡，颈项肿大到竟可做下巴的垫子、一个小男孩因为骨折，骨头穿透皮肤，伤口感染了细菌……无论男人、女人、儿童、婴孩，全都饱受病痛折磨。所以尼日尔人脸上总是挂着痛苦的表情，这里的孩子们在疾病肆虐的环境里长大。无论大人小孩，对他们来说，疾病和死亡是生活的一部份，早就习以为常。

检查完成
绞勒性疝气手术后
的小病患



由于疾病种类繁多，景青相信宣教医生应该拥有全面的外科专业知识才能帮助更多人，这激发了他向其他外科医生学习的热忱，包括骨科、泌尿科、儿科和妇科。当景青看到尼日尔缺乏合格的眼科外科医生时，这促使他也愿意花时间在尼日利亚卡诺的 ECWA (Evangelical Church of West Africa) 眼科医院，向同为宣教士的泰特斯·佩恩博士 (Dr Titus Payne) 学习眼科手术。由此可见，景青的确身兼数职。黄春美医生笑着说：“景青的确是个有很有才干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景青身为外科医生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甚至赢得 Likita Maza Maza 的绰号，意思是“快手医生”！他的外科助理阿卜杜勒·阿布 (Abdul Abou) 对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钦佩，他说：“黄医生的动作很快！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完成工作。他也非常有效率，我们看到他照顾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照料。”

令人惊讶的是，景青能够在破记录的时间内以严格的标准进行手术！众人赞美他说：“医院的所有员工都喜欢与黄医生一起



巡视病房

工作，因为他和蔼可亲，是工作人员的朋友！他也是一位所有病人都爱戴的医生，所以当我们说将有一名华裔医生为您动手术时，他们都很安心，很喜悦！”黄春美医生也同意了以上所述：“景青深受病人的尊重与爱戴。那些由他带领而信主的员工，最后也成了护理人员，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忠诚服事而被感动。”

由于景青忠于自己的使命，他成为了身边工作人员的榜样。吴国安博士也向他致敬：“黄医生忠于上帝的呼召。他无须任何特异或华丽的事物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景青会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做错的人，他知道自己有所不足，有时候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废寝忘食。

16

珍珠的服事与光荣的出世

对于他们身处的环境，珍珠说：“非常不同！这里的人也很陌生，文化上的差异更是巨大。我在高尔美的第一个星期真的很难适应。在我们走进高尔美之前，已经有人告诉我们这会是‘艰苦之地’。”但是，景青和珍珠并不知道实际情况会有多糟，直到他们踏足此地。

肝炎、脑膜炎和疟疾皆是这个国家的流行病。事实上，景青一家已经定期食用预防疟疾的药物，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就不会感染疟疾。有一位宣教士的小孩染上了黑水热，这是一种最为严重的疟疾。他昏迷了六周，最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但另一位宣教士的孩子患上脑膜炎却无法战胜病魔而离世。由于医生经常会接触到各种传染病患者，因此他们可说是高危群体，而且其中至少30%至50%的病人都是艾滋病患者。作为妻子和小孩的母亲，珍珠自然很担心。当她回忆起在高尔美的最初几周时，她确实怀着矛盾的情绪。

在新加坡的时候，身边有家人和朋友相伴，珍珠一直感到安全自在。但是来到高尔美，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因此珍珠感到茫然，甚至缺少安全感。当她独自与年幼的孩子光正共处的第一个夜晚，无论什么动静和噪音都能引起她的注意。这就像是在危

险中训练她的感官能力一样。一天晚上，当她听到房子上面传来刮擦声时，她以为有人想从屋顶闯入！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光正，他自在地四处走动，根本没有意识到母亲的不安。不久后，珍珠渐渐学会不加理会屋内的各种声响。

当她开始适应高尔美的生活时，神在各方面使用她，所以她的服事并不亚于景青的工作。珍珠说：“景青主要的工作是宣教医生，而我就在他身边与他一起服事。虽然刚开始我会在医院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务，但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做家务。”珍珠一直都与景青同工，两个孩子的学前教育都是通过居家学习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慢慢地，神带领她从事园艺事工，还有为妇女和孩子们设立的事工。后来，珍珠也参与了扫盲计划。

园艺事工的兴起是最出人意外的。栽种植物是一门昂贵和高风险的行业，因为这取决于天气条件。珍珠认为分享收成是明智和有必要的。单身的宣教士常常面临食物供应的问题，于是，她把院子里的收成与其他宣教士分享，这举动让大家都能尝到她栽种的玉米、四季豆、长豆、茄子、青椒，甚至羊角豆。其他人也分享了他们的收成。宣教士们进行了均等的物物交换，这慢慢形成了食品合作社的想法。因此，高尔美合作社就应运而生了，专门向那些食物供应不足的人提供帮助。珍珠被选为高尔美合作社的“总经理”。景青打趣说：“她管理的合作社营业额高达数百万！不过是用当地的货币单位来计算！”

珍珠还与当地的妇女建立了美好的友谊，包括豪萨人、半游牧的塔马吉克人和游牧民族富拉尼人。珍珠认为在当地妇女中推广扫盲计划是有必要的。由于92%的尼日尔妇女都不识字，珍珠看见了接触她们的机会。她通过医院联系她们，因为医疗事工与福

音外展相结合，于是她开始了为富拉尼妇女开设识字班，教她们阅读和背诵圣经经文。珍珠也把家庭开放给这些妇女的孩子。景青说：“医院的事工在这些未得之民中延伸出了一个小事工。珍珠参与的项目就是教导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当地妇女的圈子里取得了信任。有一次她与一位富拉尼妇女分享福音后，这名妇女就把学到的信息与其他人分享，这让珍珠兴奋不已！



**珍珠与富拉尼
妇女和儿童**

珍珠的事工在这些妇女中间得到了关注，她们开始将她视为朋友。珍珠说：“在宣教活动中建立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能到当地妇女的家中探访她们，让我更多认识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凭借家访来建立关系成为了她事工的一部分。所以她常常陪伴景青到游牧的塔马吉克人那里探访病患。

在当地文化中，女性不被允许在社交聚会中与男性坐在一起。珍珠会坐在妇女们当中给她们讲圣经故事和分享实际的小常识。黄春美医生说：“珍珠很受村民欢迎。她甚至教导一名妇女如何做鸡蛋面，这样她就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珍珠与村民建立

**珍珠与塔马吉克
妇女和儿童**



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以至于如果她没有陪同景青去探访，村民就会提醒景青下次一定要带珍珠一起来！珍珠不仅走进了村民的家，也走进了他们的心。

此外，珍珠也参与得蒙复兴的“无愧的青年计划（Awana）”接触尼日尔的青年。这是一个经证实且可行的计划，以福音来接触青年群体。有一次，共有七名女孩回应了福音，这一结果不容小觑，因为在女孩被贬低且其他信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接受福音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尼日尔，身为基督徒是很不容易的，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考验；参与主日学或“无愧的青年计划”的女孩也会被嘲讽。有人见过村里的男孩向这些参与活动后返家的女孩丢石头。

在珍珠忙碌的事工之间，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比如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因此考虑在哪里生孩子成了一道难题。他们最终决定的地点是高尔美医院，因为这里比较方便而且景青也走不开。

珍珠停止服用预防疟疾的药物，因为这对未出世的婴儿带有风险。她决定仰赖神把伊蚊驱走！

1979年4月18日，经过十四个小时的阵痛，珍珠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黄光荣（Joel）。高尔美医院帮她接生的是一支跨国团队，包括一名美国外科医生、一名加拿大护士、一名尼日尔助产士和一名英国助产士玛格丽特·海斯（Margaret Hayes）。玛格丽特·海斯为着能为第一个华裔宝宝的母亲顺利生产感动不已。在1964年辛巴叛乱期间，玛格丽特·海斯在刚果担任护士，人们还以为她在叛乱中牺牲了，但随后，她被女王封为女爵士。

在等待光荣出生之际，景青尝试把等候室的温度降低，他把大量的水洒在墙壁、地板和床上，以便极度劳累的他能小睡片刻。当日的天气十分酷热，气温高达40℃以上。当光荣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发出响亮的哭声，宣布他的到来时，才让景青松了口气。景青笑说：“他真没耐性，身体还未出来，只冒出头的时候就用最大的力气来哭喊了！”

光荣的体重三公斤多，并通过了其他的健康检查。珍珠顺利分娩，仅六个小时就和光荣一起出院了。景青得意地说：“你在别处肯定不会找到这么‘快捷’的服务！”光正现在已经升级做大哥了，他比光荣年长三年四个月。

光荣一直把自己看作是ABC（非洲出生的华裔）并以此为荣。1987年，一位在澳洲汤斯维尔的朋友梅维斯·沃尔什（Mavis Walsh）对这两个男孩做出了精辟的观察。他说：“光正本质上是个新加坡人，而光荣却是在非洲土生土长的男孩。”所以当光荣长大后，在东非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参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难民

法务项目时，结识了一位非洲女子贝尔纳黛特（Bernadette）。
果不其然，后来两人就结婚了。

17

扩大的医疗事工

过去几周，景青一家一直酝酿着一股兴奋的氛围。随着日子越来越逼近，兴奋的心情转为期待以及激动。还有一个月，他们就述职结束要回去高尔美了！1982年10月18日，景青和珍珠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我们频频梦见高尔美！我们真的很兴奋能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他们还说：“光正和光荣也为着回去高尔美而感到兴奋，但却是出于好玩的理由，因为那里有一个沙坑，也因为那里有泥巴！兄弟俩几乎每天都在倒数还剩下几天。”是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高尔美已经成了他们的家。

景青一家在高尔美工作了四年多，1981年11月开始一年的返乡述职。景青夫妇回到新加坡后，忙着到各教会探访和分享，鼓励会友参与宣教活动。景青夫妇也会见了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医生和牙医，走访了基督徒牙科和医疗团契，并参加在澳大利亚和亚洲举行的代表团会议。景青于6月17日至30日随SIM国际副总主任富勒博士（Dr Harold Fuller）拜访香港和首尔。他也在7月9日至13日与新任SIM东亚区执行秘书兼代表李成伟长老一同到马来西亚探访。这些地区越来越关注宣教工作，所以SIM位于新加坡的东亚区办事处迅速扩张，李成伟长老被委任为SIM的全职东亚区代表。

就个人来说，景青夫妇觉得这次述职的时间来得最为合适。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6月，他们一家得知景青的父亲患上食道癌，而且无法进行手术。他们原以为无法见他最后一面，然而，景青的父亲却撑过来了，甚至还到机场迎接他们回国。接下来六个月左右，他们一直与他一起，直到1982年7月16日，父亲黄永昌老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他离世的那一刻，家中每一个成员都守候在旁，包括从美国紧急赶回来的小儿子。

1982年11月21日，景青一家在述职结束后返回高尔美。他们一家抵达高尔美停机坪时，受到非洲友人热烈的欢迎。最初几天里，络绎不绝的客人持续打断了他们整理行李的计划。但他们很高兴能回来，并渴望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但每当他们想起接下来四年的任期时，就变得严肃起来。景青说：“随着我们回到非洲，在第二个四年任期开始的当儿，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代祷，要承担的责任也可能更多。”

果然，他们回来的第六天，景青就接到关于他新工作的简要汇报。除了尼日尔，他还将负责另外两个讲法语区国家贝宁和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意为“诚实人的家园”）的医务事工和机构。他被委任为法语区医疗协调员，这表示他会花更多时间外出和参加会议。1984年5月，景青夫妇在写给朋友要求代祷的信中写道：“尽管我们渴望多给你们写信，但工作的压力和不断变化的行程阻碍了我们的计划。”

景青认真履行法语区医疗协调员的职责。他花时间学习、理解和识别这三个法语区国家各别的问题和需求。在1984年5月写给教会的一封祷告信中，他写道：“求神赐智慧，得以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医疗救护站、国家教会和政治趋势。”他正在为这些国家

长期的保健设施制定计划。“最近，我一直在为所有医务工作拟定未来的方向……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将属灵事工全面地融入我们所有的医疗站。”景青提出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人的身体的治愈与否，乃取决于人与造物主的关系。没有灵里的治疗，身体上的治疗就等同于局部或不完全的治疗。

景青曾在1986年向美国伊利诺斯州惠顿学院葛培理中心的霍华德·塞尔博士 (Dr Howard G.Searle) 重申了这一观点。霍华德博士写信给景青，询问他对自己正在做关于基础保健和宣教士医疗的研究的看法。他想知道景青身为法语区医疗协调员，如何确保医疗事工与属灵事工紧密相连起来。

景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仅靠有效的身体治疗，是无法治愈全人健康时，医疗事工与属灵事工才有可能连结在一起。一个只得到身体的健康，却忽略道德和灵命的事工是没有意义的！当一个人与上帝疏远时，他就不会有整全的医治。因此，在照顾他们身体的同时也照顾他们的灵命，就等于采取了预防措施。”

如果只着眼于医治肉体的病痛，这是个重大的错误，因为这只能短暂解决世界的问题。如果要防止道德堕落，并且防止健康情况每况愈下，那么属灵的健康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灵命却衰残，这对他有什么益处呢？景青的信念为所有医疗救护站的整体医疗提供了新的动力。

景青早前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时他在SIM社区发展咨询大会 (SIM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sultation meeting) 用了五天时间，重点讨论他形容为“发展神学的第一步 (The

mud waters of development theology) ” 的项目。会议的目的是为宣教使命的发展得出平衡一致的意见，以一种全面的方法进行外展。但是，一位神学家在会议上说，福音派对发展神学的共识可能要到2000年才能达成！会议参与者都被此言论吓坏了。景青回答说：“就刻不容缓的使命而言，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会议的与会者要求迅速解决问题，以便能够着手为现有的社区发展项目，包括社区卫生发展等，制定一套政策和策略指导方针，这些项目对他们的整体做法至关重要。

景青说：“这是我们对基督之爱的表达，并不是传福音的诱饵。尽管如此，由于人的全部潜力无法在神的旨意之外实现，真正的整全发展必须包括身、心和灵的医治。同样，在神的旨意之外，也没有真正的身、心、灵的整全医治。”景青的论文为他在高尔美和其他地方的医疗工作奠定了核心基础。

其中一个困扰着这项使命的早期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高尔美人的职业提升、培训和认证。1983年7月，在景青夫妇结束述职回来几个月后，景青与尼日尔马拉迪镇的SIM主任约翰·奥克尔斯（John Ockers）就当地人的培训和认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争取当地政府对高尔美医院的医疗职业培训、提升和认证人员方面的工作，高尔美事工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做得不够好。

景青驳斥了这个说法，他说：“到这里来接受在职培训的高尔美人几乎都没有在医院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培训”。他提醒约翰·奥克尔斯关于他本人曾对高尔美员工有很高的评价：“按你（之前）的说法，他们受过训练，而且做得很好。”景青明确指出，他们没有忽视员工方面的培训，或做得不够。“即使在高尔美只

有短短的四年，但就我所知，我们已经培训了几十名当地护士助理和助产士医护人员、麻醉师助手、乡村卫生工作者，甚至还有一名放射技师。他们都因此获得提升。”他们受培训的质量和技能的认可度，在公众眼里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上，景青想要停止高尔美培训证书不被官方认可的争论。“事实上，这些当地人在离开医院后，已经在尼亚美、阿里特、科尼等地找到了同样的工作，凭的就是高尔美的离职证明书。他们都是由我们训练的，我们的培训确实有效，人们都接受我们的离职证明书。一名护士助理甚至因为曾到我们这里工作过而成为了外国公司的护士，虽然我们的培训得不到政府的认证。”

至于政府会否承认高尔美事工的培训而允许他们进一步的训练，景青坦诚的表示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多年来一直尝试请求政府允许我们提供自己的奖学金，把我们的人送到尼亚美和津德的培训学校。但由于竞争激烈而名额有限，政府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景青认为，即使提供了更高等的培训，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因此关于高尔美事工好像做得不够好、不受政府承认的争论，景青提醒说：“尼亚美、津德尔和马拉迪的人们应该试着理解，把一所医院建在‘丛林’里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使是训练有素且有能力的当地人都不想来偏僻的高尔美医院工作，而是选择城市里更舒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丛林医院”缺乏作为首选职业的魅力。那么，到底要如何吸引和维持长期雇佣和承诺呢？景青哀叹道：“高尔美的问题在于怎么找到更多合格的当地人愿意到这里工作。我确信这个国家有不少获得认证的基督徒。但，他们还没有申请到高尔美来工作。”他补充说：“‘丛林’需要训练有素的人，而目前全国都

缺乏这样的人。他们不来，我们也找不到有献身精神的当地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困境，我希望你能理解。”

最终，高尔美医院在2013年获得政府的认证，成为泛非洲基督教外科医生学会会员（Pan-African Academy of Christian Surgeons）。

景青身为法语区医疗协调员，每六个月必须参加为期四天的工场理事会大会，以审查正在进行的工作，并制定未来计划和关键决定。所有重大的问题，无论是医疗问题或是其他问题都会在会议上讨论和审查。法语区理事会由三个国家教会的主席和秘书、三个法语国家宣教主任及其助理，以及宣教事工的四个部门主任组成，景青是其中一位部门主任。

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理事会开始为具体需要来制订医疗计划。这项计划旨在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特别是满足农村地区人民切身的需要。当时总共有10个医疗项目正在进行，高尔美医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那么法语区的医疗部门工作人员全部集合后，将有包括100多名的SIM宣教士参与其中。

在一份获批准的法语区人力需求清单上，列出了急需137名新宣教士的要求！于是三个法语区国家的宣教领袖几乎得“打起来”，才能让他们的新人力申请获得批准。景青打趣道：“这个

国家可能有很多人失业，但这里肯定没有。想要找工作吗？你只要过来询问一下就会被录用了！”

理事会大会不得不承认，寻找宣教士候选人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训练一名能讲三种语言的跨文化宣教士，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这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1983年2月28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景青说：“我没有如所罗门一般的智慧，可以将宣教士一分为二，分配到两个有需要的地方。”除了宣教士外，所有医院的助产士、护士和其他人员也面临严重的短缺。人员配置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不过，当中也有一个好消息。法语国家独立后，受过教育的国民越来越多，他们最有潜力推动该地区的增长。于是，为了确保不会错失人才，理事会决定在这些人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理事会承认牙科护理也是农村地区的一项重要需求。当前需要的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取代原来设在高尔美医院内，但已关闭的牙科诊所，作为将来牙科工作兼植堂的事工。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高尔美还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设立牙科诊所的地点呢？

高尔美的外科手术部门已让超过200万人获益，但由于它提供的是24小时的医疗服务，所以也正背负着巨大的重担。高尔美如果还要增设牙科服务，是否会不堪重负呢？高尔美的服务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了，况且“把所有的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除非有绝对的必要。1997年，这个问题获得解答，来自新加坡的周巽道医生和妻子吕毓蔚（药剂师）回应了要到高尔美牙科部服事的呼召。

此外，尼日尔马拉迪南部地区的麻风病院也值得关注。对景青来说，这里是彰显基督怜悯之心的地方。麻风病患者常常失去盼望，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隔绝，孤零零地等待死亡，过着被人鄙视的悲惨生活。基督教机构出于对社区中被排斥者的怜悯，即使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希望这个事工继续运作下去。多年来，景青一直负责这项工作，直到成功招募了一名医生。

还有一个问题深深触动了景青的心。为了实现长期目标，需要永久的改变，尽管他认识到要实现大规模的改变，需要冷静的决定、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方向。“单靠利他主义，很难长期维持和激励当地人。”他看到这些问题根深蒂固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地理、社会和政治限制之中。一个又一个项目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景开始，但要想长期维持下去，他觉得人们必须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并且愿意去激励其他人一起去做。

景青总结说：“基础卫生保健的终极问题不在于缺乏概念，不在于这些概念的可接受性，也不在于缺乏项目，其关键在于动力的持续性。大多数事工项目都带着热情，而且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但几年后，无论这些项目在开始时有多美好，终究慢慢地还是让人感到沉闷和无力。不仅是这里的人，就连海外宣教士也会发现很难继续下去。”

景青基本上是在为真正的领导力树立一个榜样。他说，一个领导者必须参与而不是超脱，必须现实而不是靠理想主义，必须激励人心而不是发布指令。“为了不成为一个‘象牙塔’一般的领导者，我觉得有必要也在‘基层’工作，与面对日常工作和现实的同事保持联系。”景青就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一个仆

人般的领导者。最后，景青的信仰支撑了他所有的医疗和行政决策，并帮助他勾勒出属灵领袖的概念。

建立与扩展神的教会

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12:3）”。这是景青一家牢记在心的一段经文，他们立志把福音带到各村庄并帮助信徒们成长。从一些工作的进展表明他们和其他 SIM 差派的宣教医生所付出的努力，正结出美好的果实。

1983年的一次进展特别令人鼓舞！经过景青多年的努力，村庄里有些父亲终于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信主了，所以村民们向SIM递交了请愿书，希望SIM能在他们的村庄开展福音工作。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景青一家见证了当地团契的开始。他们说：“是的，就如一名瘸腿的大麻疯病人带了另一个人来信主。这些事让我们坚持着盼望和期待。”

景青和珍珠也很高兴得知当地的尼日尔福音教会（E.E.R.N.）差派了一名布道家到附近的孔尼镇，并与SIM合作进行外展工作。一个青年营会的首日就吸引了约1,800人参加，大多数出席者都是受朋友邀请而来。最令人鼓舞的是，当地的酋长还特别抽空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其中两名参加活动的医院工作人员则形容 E.E.R.N. 教会的年轻人“充满活力”，让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景青一家曾参与E.E.R.N.教会的建造。豪萨族牧师纳吉迪多(Nagidido)肯定地说：“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E.E.R.N.教会是景青和珍珠协助建立的。”他第一次和景青及珍珠见面是在1982年，当时上帝召他到高尔美的教会当牧师。这所教会五年来一直在寻找牧师，而上帝通过纳吉迪多牧师的来到回应了他们的祈祷。

事实上，景青和珍珠全情投入在教会的实体建设和属灵项目。纳吉迪多牧师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们夫妇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参与建立U.E.E.P.N.教会的工作。他们还帮助建造了沙纳瓦(Tsarnawa)的教会，并在这所村庄教会附近为牧师盖了一栋房子。他们也帮助教会的年轻人和圣经学校的学生。我还知道他们也有帮助E.E.R.N.和U.E.E.P.N.这两所教会的事工，因此取得良好的进展。”总之，景青和珍珠一直不遗余力地服事神的子民。

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教会也在增长中，并且是西非法语区增长最快的区域。尽管布基纳法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但宣教的大门却是敞开的。SIM在医疗和宣教的工作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或许有助于教会的植堂工作，并解释为何皮俄拉镇(Piela)和马哈达加村(Mahadaga)的医疗工作结出了属灵的果实。

SIM在布基纳法索的吉博市(Djibo)为富拉尼人开展的事工同样发展迅速，而医疗工作是主要的事工之一。两年后，景青在1987年报告了吉博市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富拉尼教会的开端。在这个游牧部落中，我们的宣教队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一突破既让人流泪，也让人欢呼！



高尔美教会（背景是魏约翰牧师的画作）

等待了两年之后，高尔美的教会终于取得了一块土地，并计划在村子深处建一座更大的教堂。在1985至1986年之间，建造高尔美教会的工程开始了，而当地的村民和宣教士都参与了建造的工作。景青在新加坡的教会则为锌片屋顶提供资金。光正回忆说：“为了建造高尔美第一所教会，我们都自愿动手帮忙。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曾帮忙挖掘教会的地基。”

1986年9月，崭新的高尔美教会第一次敞开大门。在新堂会的第一个主日里座无虚席，十九张全新的长椅和七张旧的长椅全被坐满。来自其他城镇的教会领袖也前来参与，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时刻，因为他们见证了经过16年的努力后，终于建立村里的第一座教会。

景青一家就是这样，只要看到有需要，就会继续事奉。纳吉蒂多牧师回忆说：“他们在各方面帮助教会，在饥荒时期提供食物，而他们帮忙建立的粮食银行直到今天还在帮助教会的孤

儿和寡妇。他们在孔尼省帮忙我们改善农耕管理、牲畜和水井的问题，也帮助人们建造房屋等等。”景青和珍珠确实是教会的祝福。

景青和珍珠看见信徒的灵命增长，心里也感觉温暖。在为期三个月的学校假期中，来自偏远城镇的学生都返回高尔美。前来参加圣诞礼拜的人都挤进村里的教会，包括儿童在内有近500人。他们也注意到富拉尼信徒也参与其中。这个游牧民族一般上非常抗拒基督教的信息，但景青和珍珠见到他们灵魂得救，心中洋溢着暖意。珍珠曾参与教导一群完全不识字的富拉尼妇女的事工，妇女们现在满心喜乐地告诉珍珠，她们的丈夫都接受耶稣了，她们和丈夫“同心”了！此外，在高尔美举行的基督教妇女年度大会吸引了来自尼日尔各地大约250名妇女出席。这也是第一次由姐妹证道，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简直不可思议！

但更让人高兴的是频频听见有人信主的好消息。一名年轻人一直为如何告诉父亲自己信主而挣扎，而他最终鼓起勇气见证了自己的信仰。另有一位哈芝（Alhaji，指到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找到了信仰，还影响村里的一些人认真思考基督的真道。还有一个名叫苏鲁鲁的老人家，因肺结核致残，在高尔美接受了基督后，开始无所畏惧地公开分享他的信仰。

一个名叫M.Y.的15岁男孩也经历了神迹。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已经超过10年了，臀部、膝盖和左脚踝都出现了挛缩，只能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行。他动了十次手术和矫正治疗后，终于能够走路了。他将自己得医治归功于上帝，并继续与他人分享上帝的爱。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30岁的阿布杜，多年来只能蹲着走路，因为他的双膝弯曲，无法伸直和站立。他在高尔美接受了几次手术之后又能走路了。他一开始是抵制福音的，但手术后，尽管面临反对，却仍然接受了福音。

景青和珍珠见证了上帝之手所作的工说：“在这个国家，我们遇到了许多所谓的‘被上帝遗忘’的村庄。但神没有忘记他们，祂通过在高尔美的工作，让许多人得到牧养，并且第一次在生命中认识神的爱和宽恕。世上绝对没有任何被上帝遗忘的村庄或人。”的确，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随己意完全爱我们的上帝。基督徒领受祝福后成为别人的祝福，乃是处处可见的事实。

19 孩子的教育

珍珠提醒景青：“光正已经过了居家学习的年龄，我们必须决定他接下来的就学方向。”虽然景青和珍珠完全投入在各自的事工上，但他们并没有忽略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宣教士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李成伟长老观察到，许多来自亚洲的宣教士的孩子最终回国后，都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和学校体系。“他们对回国后的生活感觉陌生，重新融入本地文化和教育体系都遇上困难。许多人因此感觉挫败，有些在学校的表现很差。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何无法适应，感觉自己与一切都彻底脱节。”这一点景青和珍珠都留意到了。

珍珠使用了一套美国学校的学前函授课程，为光正进行居家教育。现在他长大了，景青和珍珠决定把他送到尼日尔南部的尼日利亚，入读位于米安戈的肯特学校（Kent Academy）。这是一所寄宿学校，许多宣教士的孩子都选择在那里上学。光正赶上了二年级第二学期的上课时间。景青和珍珠本想把他留在身边，但为了他的学业不得不这么做。珍珠则继续让小儿子光荣居家学习，直到年龄符合跟哥哥一起上学为止。

对于把两个孩子送到在遥远的另一个国家的肯特学校，景青和珍珠必须作各种考量。特别是出入境问题，让他们倍感压力。例



景青一家于米安戈的短期休假

如1984年，他们在米安戈度假后，因为一场政变而被困在尼日利亚两个月。由于边境关闭，他们的汽车在7个月后才被归还，还必须得到不同部门的官方许可。又由于通讯被切断，那两个月的一切都让人忧心和紧张。即使是在现在的和平时期，父母亲在逐年申请探望孩子的入境签证时，确实也是一项挑战。由于肯特学校在900公里之外，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依照SIM航空的航班时间表作安排。另外因为边境检查缓慢和恶劣的道路条件，开车的话则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到上了六年级的第一学期，光正以及后来光荣都可以独立地往返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之间。景青和珍珠则每年至少一次开车去探望他们。

两兄弟第一次飞往肯特学校的经历，让光正毕生难忘。那时候恰逢恶劣的哈马丹风季节。由于能见度低，飞行员几乎迷路了。飞机剧烈摇晃，导致光正和光荣呕吐不已，连飞行员也承认这是

他第一次晕机！如果不是因为每个人的脸色发青，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经验很有趣。但，飞行员晕机确实是件可怕的大事！

由于邮政服务不稳定，使得父母和孩子们的分离变得特别难熬。他们只能依赖朋友或尼日尔的邮递员来派送信件。所以，送别光正几天后，很快就收到他的来信，让景青和珍珠特别感恩。他们说：“当光正描述在寄宿学校吃第一顿饭的情形时，我们就知道他适应了寄宿学校。他是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吃完所有食物，甚至在家里平时不会碰的红萝卜都吃得干干净净！”景青和珍珠都喜极而泣。他们怀疑光正之所以适应得这么快，全因为肯特学校有好玩的石头和操场！然而，他们也注意到光正一直吸吮着拇指，这是之前从未发生的。他们推测这是光正为适应新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光正已习惯了不在家的生活，但是景青和珍珠却从未放下光正不在家的这一事实。

只要有人提起光正或问起他，珍珠就会湿红了眼睛。他们难过地说：“几天后，我们发现离别对我们来说比孩子更艰难。”后来在2019年9月举行的SIM宣教士候选人培训课程中，当珍珠谈到那段分离的日子时不禁流下眼泪时，这个反应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

当光荣满六岁准备到哥哥光正的寄宿学校时，景青和珍珠心里百般不舍。但光荣却对自己加入大男孩的行列感到兴奋不已！由于两个儿子都不住在家里，景青和珍珠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沉静和空荡。他们白天忙忙碌碌地过着，心思全都集中在事奉上，但每当夜幕低垂时，面对空荡荡的房子让他们难过不已。他们十分想念以前儿子们在晚间家庭灵修时喋喋不休的谈话。如果不是因



光正和光荣正准备飞往尼日利亚的寄宿学校

为有他们的澳洲朋友基思（Keith）和玛乔丽·米纳斯（Marjorie Minus）夫妇，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景青和珍珠两人可能会夜夜难眠。

这一对来自澳洲的夫妇在尼日利亚的乔斯市服事，每当肯特学校举办“乔斯周末”活动时，他们总会向两名孩子敞开家门。光正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说：“我们每隔两个星期都有‘乔斯周末’，可以在基思叔叔家过夜。基思叔叔每次都开着一辆福士伟根‘金龟车’来接我。我记得车程大约四十五分钟。”不过，没有什么比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更好了。为了以行动表达对孩子们的爱，景青和珍珠会计划每年在米安戈度假，与孩子们在一起，在漫长的学期中去探望他们一次。如果用一句话带过，这一段时光对家中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景青和珍珠只能希望他们对儿子的爱，能支撑他们度过漫长的求学岁月。

多年以后，当被问及在尼日尔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时，光荣说：“作为一名宣教士孩子的成长是有趣和精彩的，就像一场历险记，不过也不全称心如意。在就读寄宿学校时需要与父母分离，朋友来来去去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还有我们需要去适应宣教学校的国际化环境。”光正和光荣都在学校里结交了好朋友，而同他们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尼日利亚人。他们是否曾有过被遗忘或失去文化之根呢？

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发生了！在肯特学院 1986 至 87 年的新学年里，住在尼日尔的宣教士父母都无法入境尼日利亚到学校探望孩子们。于是，SIM 被迫直接在尼日尔开设一所新的学校供宣教士孩子上学。那年，工场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办萨赫勒学校，而光正和光荣成为了学校的首批学生。虽然萨赫勒学校只配备了非常基本的教育设备，但孩子们现在离家更近了，这让景青和珍珠松了一口气。

起初，他们担心光荣可能无法适应，因为他之前太喜欢肯特学校了。然而，他爽朗的回答让他们吃惊：“尼亚美的萨赫勒学校虽然没有肯特学校那么好，但我还是度过了一段相对不错的时光。”景青和珍珠为两个儿子的适应能力感到高兴。“单单能与他们住在同一个国家就让我松了一口气。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宿舍生活，尽管设施有限，他们还是看到了萨赫勒学校的好处。”他们还调皮地补充说：“孩子们对这所新学校、高温天气和尼亚美的昆虫都适应得很好！”光正从七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在那里就读，一直到九年级第一学期。

1989年，当全家移居回新加坡时，光正和光荣在新加坡继续他们的教育。尽管两兄弟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但他们的表现一

直都非常优异。光正后来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而且被录取了，他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并获得了副校长嘉许名单奖。在短暂的工作后，他开始在新加坡的 A*Star 奖学金项目下攻读材料科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课程。光荣则被英国诺里奇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录取，进行第三世界发展的研究。他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非洲加纳的莱贡大学就读。之后，他到乌干达马克雷雷大学的难民法项目中，当了一年多的义工。在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他曾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了几年，之后获得全额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东亚区

及更远的地方



20

重返家乡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必回新加坡，那该多好！”正当全家把剩下的东西塞进行李箱时，光荣突然爆出这句话。此话确实引起了大家的认同。珍珠在日记中也记录下相似的心情：“离开尼日尔对我来说是痛苦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希望我们不必回家。我们已经在非洲这片土地扎下了深根，并准备长居此地。对于回国我们感到担心，也不愿面对，这就是宣教士矛盾的心情。在宣教禾场待得越久，对宣教国和当地文化的适应程度越高，重返故乡的难度就越大。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珍珠坚决地补充：“然而无需付出代价的事工就不会有实质的成果！”

1987年11月24日，景青一家在第二次述职后回到尼日尔，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悦。“我们再次来到尼日尔了，内心充满着说不出的喜乐！我们喜欢这里的事工和人们。两个孩子就好像回到水中的鱼！”当他们全家从首都尼亚美开车回到高尔美时，光荣带着激情宣布了他的愿望：“我要步行走完最后一段‘神圣’的路程，而不是坐在车上！”这次回程是他们在尼日尔宣教工作的最后一个任期了。他们只剩下两年的时间，之后为了儿子要履行国民服役而永久地回到新加坡。

他们仍像之前一样在各自的事工里忙碌事奉，但这一次有种紧迫感，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需求还很大，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潜意识里常觉得即将永远告别尼日尔，所以他们的服事也带着些许悲伤。这是他们对尼日尔和尼日尔人的深切情怀！

从1977年开始到1989年，景青一家在尼日尔度过了12年。他们现在要回新加坡了，即将离开他们所珍爱的朋友，而要与（家乡）已经变成陌生人的老朋友重逢。唯一能稍微驱散他们忧愁的就是很快可以与家人团聚，特别是珍珠的姐妹们，她们为景青一家慷慨忠诚的支持可说是无微不至。

珍珠的姐姐美英和妹妹珍兰在1987年到高尔美探望她，并一起到阿加德兹一游，看看珍珠所说的“真正的”沙漠。另外，她们一心想见证景青进行紧急剖腹产手术而慌忙穿上手术袍的模样，确实带来了欢笑声。她们之前听说过景青动手术速度奇快，所以不得不快速穿好手术袍！是的，无论如何，景青和珍珠都期待着再次见到家人。



美英和
珍兰于
1987年
探访景青
一家

景青一家在1989年12月回到新加坡，他们必须克服高度的焦虑情绪，也强忍住想要预订回尼日尔的航班的冲动。他们是否能应付不断变化的新加坡呢？在过去的12年里，新加坡的风土民情都发生了巨变，所以本质上，他们似乎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文化。

回国第一个月的时间是最难熬的，景青一家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在现代化的新加坡“穿衣穿鞋”！出门要穿上正确的鞋袜，而不是像在撒哈拉以南的沙地上那样赤脚或穿着凉鞋行走。另外，他们也要重新适应的是在城市里跟人说话的内容和声量。他们必须重新斟酌，在新加坡什么是可以做和可以说的，毕竟新加坡有别于尼日尔。这对他们一家来说是十分吃力的，毕竟景青和珍珠也改变了。

来自四方八面的许多关心他们的朋友和亲戚，对待景青一家的方式，就犹如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其实似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12年的距离。“生活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我们不可能从之前的原点继续。我们自己也变了，变得成熟了。”处理人们对他们的期望有时会让它们疲惫不堪。在一个本应有家的感觉的地方，他们却更像陌生人。

就连买家庭用品如此简单的事，也成了一场噩梦！林林总总的品牌使珍珠眼花缭乱，她现在竟然有了“选择”！新加坡的城市生活肯定比尼日尔更复杂。吃饭时间也是压力重重的，“对我其中一个儿子来说，每顿饭都是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他看不上餐桌上的任何一道菜。”儿子的哭闹让珍珠深受影响，她祷告能够更懂得如何预备食物。最后，她决定烹煮融合非洲特色的中式菜肴，结果，围绕着餐桌的笑声让她知道自己成功了。

珍珠总结他们的经历说：“当我们面对挣扎时，特别想念非洲，想念我们在高尔美的宣教大家庭。我们想念他们的支持和友谊，想念那里简单的生活方式，想念家庭时光，想念以人为本的群体。事工的结束、与朋友的离别、生活方式的转变都让我们觉得悲伤难过。面对必须接受要结束海外宣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挣扎。我们发现自己很脆弱，不知不觉中就会流下眼泪。”珍珠将他们的经历称为“反向文化的冲击”。

“尼日尔”三个字经常盘旋在他们的脑海中。光正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说：“我们在高尔美宣教士院子很自由，我们经常一天走几公里路。我们小时候都很独立，我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跌伤了膝盖，流血了，但是我很镇定地回家把伤口洗干净，然后等妈妈回来给我贴上胶布。这不算什么成就，这是很正常的！”光荣特别喜欢宽阔的大空地，“爸爸给我们买了火箭玩具，我们可以在空旷的地方发射，火箭可以飞得很高。它到了某个高度，降落伞会突然打开，火箭就会慢慢落到地面。”孩子们都可以在高尔美郊区自由步行或骑脚车，也可以和当地的孩子和其他宣教士的孩子一起开心玩耍。这些简单的快乐都是两个孩子怀念的，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立即返回尼日尔的机会！

几个月后，景青一家顺利地恢复如常的生活。“上帝是信实的，因为我们依靠祂的恩典，平稳的挨过了过渡期。就重返新加坡的经历而言，未来的日子看起来更加光明。”他们将自己快速的适应归功于家人和朋友：“他们以切实的方式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他们接纳我们进入他们的活动圈子，让我们感到被接纳。他们的友情使我们精神振奋，灵里获得修复。”他们的朋友也学会了如何重新适应与景青一家的相处之道。见到朋友乐于听他们分享尼日尔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珍珠说：“教会

内外的一些团体为我们提供了分享工作和经验的平台，这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因为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神在宣教禾场所做的并持续在做的大事，以及祂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

景青和珍珠现在已经为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做好了准备。上帝在一旁等候，祂在景青家所行的大事还没有结束。

从差会基地到国际领导

景青最初在1976年加入SIM时，由于东亚区办事处尚未成形，所以一切申请手续都要通过澳洲办公室办理。在成功被录取成为SIM宣教士大约两年半后，来自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申请询问也逐渐增多，因此东亚地区迫切需要注册一间非营利公司来亲自处理这些申请。1980年，SIM东亚区办事处就此诞生。当景青一家在1989年回到新加坡时，东亚区的SIM办事处已有约30名来自东亚区各国的宣教士，其中来自北部例如韩国的宣教士最多，占了六成，而来自南部的宣教士人数相对就少一些。

1990年1月1日，景青被委任为SIM东亚区总主任，珍珠则被委任为宣教士候选人培训协调员和媒体部协调员。景青夫妇回忆起这项新任务时说：“从高尔美医院和农村生活，到新加坡的办事处和城市生活，确实需要一些调整。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乐意接受挑战，成为SIM亚洲宣教士的仆人。”

景青和珍珠亲身体验过的跨文化宣教经历是一个很好的装备，这使他们能够给预备出发到禾场的宣教士一些实质的帮助，并建立差派地的支援队伍，为在前线的同工增援。景青说：“在基督再来之前，宣教的服事停不下来，所以我现在的愿望是把热情、

异象和鼓励传递给下一代。”作为从亚洲派往海外的宣教士先锋，景青和珍珠足以胜任为东亚区的下一代宣教士提供帮助。

景青和珍珠的工作包括管理SIM在东亚区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差会基地，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和新加坡。当中有八位名誉代表、三个地方理事会（委员会）和四个伙伴代表团。除了这九个国家和地区外，他们为了处理SIM宣教事务也与其他35个国家保持定期沟通。景青认为：“我们需要不断培育这九个东亚区差会基地在宣教上的工作和发展。”他开玩笑地补充说：“这简直就像经营一家跨国公司，只不过我们是在做上帝的工！”

1990年，景青在SIM东亚区工作的第一年，把重心放在资源整合以及规划和展望未来的方向，而珍珠则负责培训宣教士候选人的工作，并建立和管理SIM东亚区的资源库。她也协助规划亚洲跨文化培训学院的课程，如宣教士家庭生活并亲自教导这个课程。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办事处得以顺利运作，包括为新加入的宣教士开办宣教士职前培训课程，鼓励教会扩大宣教观，并让他们参与强化宣教禾场教会的项目。

为了熟悉各区域办公室事工的近况，景青经常出差，他特别去了香港和日本参加当地理事会的首届会议，到韩国参加合作伙伴宣教的协商和亚洲宣教大会，也到澳洲参加全国理事会会议和代表会议。景青深信：“宣教不仅仅是差派宣教士到禾场...”。所以他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差会基地，也就是各区域的SIM办公室，这是通过提升对宣教的成熟度、深度和理解度才能达成的。

SIM东亚区办事处已经有能力自行负担运作开销，所以经济方面不是主要的限制。他当前的目标是在1993年之前，差派80到90名亚洲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以满足各禾场的巨大需求。这期间恰逢SIM成立100周年，当时，他们已经在装备15名宣教士候选人。与此同时，他们正组建一个独立于SIM澳洲的东亚区事工。他们也盼望将菲律宾棉兰老岛禾场的工作纳入SIM东亚区的管辖范围。景青描述1990年为一次“巨大的学习经历”。

1991年1月中旬，珍珠的职务扩大了，她成为宣教士候选人秘书。她的新任务包括进行面试，并与宣教士候选人、准宣教士，以及有志于宣教的询问者保持联系。另外，东亚区办事处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9月21日，景青和珍珠见证了SIM马来西亚理事会的成立。在主席郑宗平先生的领导下，共有七名成员（六男一女）组成了首届理事会。10月1日，SIM菲律宾的差派事工正式编入SIM东亚区，东亚区办事处计划差派更多宣教士到菲律宾，以加强当时由七名美国宣教士组成的团队。另外，韩国的事工虽然因人手短缺而经历一些转变，但因着SIM美国最后几年的帮助而稳定下来。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见证了SIM差会在东亚区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展。尽管人手不足，他们也代表SIM进入了蒙古地区。1992年10月1日，蒙古基督徒服务联合会（简称蒙联会）在英国成立，由九个宣教机构组成，尔后在短短半年内，蒙联会就在蒙古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办事处，并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景青是协助管理蒙联会的七名理事会成员之一。由于当时蒙古只签发工作签证给外籍人士，于是蒙联会就改以社区援助的项目来进入社区和接触当地人，这是一种在创启地区（受限制地区）的环境中创意性宣教模式。蒙古西部有两个重点项目：戈壁

阿尔泰开发项目和乌里雅苏台木材项目。当更多的宣教机构开始加入后，蒙联会更名为国际蒙联会。到了1995年，国际蒙联会与十二个机构合作，这些机构都有个共同的异象，就是团结所有蒙古福音派教会，并与各方合作来强化这些教会。国际蒙联会的异象宣言如下：

“国际蒙联会是由基督教伙伴机构组成，旨在与蒙古人民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并与他们紧密合作以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恩赐，鼓励本土教会的植堂、成长、发展与合一。”

SIM东马来西亚理事会在1993年成立。东亚区办事处当时共有67名亚洲宣教士，另有10名新宣教士正在接受培训。然而，虽然过去的10年里，SIM东亚区的亚洲宣教士人数增加了八倍，工作量也增加了四倍，但是驻本国宣教士（办公室同工）的人数却没有增加。尽管如此，一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1995年对景青和珍珠来说是特别忙碌的一年。SIM东亚区计划在1997年之前正式注册成立SIM香港办公室并招聘一名秘书长。他们为着这项任务能在期限内完成而感到欣慰。景青和珍珠还邀请了新加坡人叶立忠博士担任东亚区总主任助理，帮助东亚区进一步发展，让景青和珍珠能专注于支援教会，及牧养有潜力的宣教士候选人和支持者。

1999年，景青在第三任服事期再次获选为SIM东亚区总主任。在第三任任期内，东亚区的各项事工都得到拓展。叶立忠博士大力鼓励和协助成立织帐篷公司，帮助SIM进入新的禾场和事工。这一年在蒙古也有新的发展，例如为过去七年来一直租用的联合



1990年代的SIM新加坡理事会成员：（左起）主席骆和平、景青与珍珠夫妇、林美英、叶立忠与妙慈夫妇、林厚彰及王序牧。

圣经培训中心购买了土地和建筑。此中心的成立是数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当中包括蒙古基督教联合会。当时正接受培训的有大约100名来自蒙古的牧师、领袖和同工，他们都在迅速发展的教会中服事。当时信徒约6000多人，分布到18个省。

2000年，SIM的英文全名从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国际事工协会）改为 Serving In Mission（国际事工差会），以便更贴切地反映实际的工作，“SIM的宗旨是在向未得之民传扬福音，为人们的需要提供服务，并在培训及装备门徒完成主的大使命之时，通过建立、强化和与世界各地的教会合作来荣耀神。”SIM目前的宣教事工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年10月2日，SIM在韩国首尔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共有50多名宣教士。景青称韩国为“亚洲基督教的巨人”，成为SIM的第九个差派办事处。其他办事处分布在澳洲、新西兰、南非、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及位于新加坡的东亚区办事处。更重要的是，通过支持者的慷慨奉献，SIM东亚区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再也不需为租金问题烦恼。

尼日尔，我们回来了！

在新加坡忙碌了两年之后，在珍珠全力的支持下，景青计划再次造访尼日尔。珍珠坦诚说：“的确，两年过去了，景青是时候回去了。”她平静地补充道：“在尼日尔，人们说一旦被‘虫子’咬了一口，你就永远想‘回家’。”景青自己也承认：“当我们在1989年年底离开高尔美医院时，以为不可能再回去了。我做好心理准备就此放弃我热爱的外科专业。”但令他们惊讶的是上帝供应了经济上的支持，使景青能够每年继续回到那里的医院做手术，并到尼日尔的乡村学校和其他教会给予帮助。因着他对高尔美的熟悉和经验，受到极大的欢迎。

另外，景青还有一个回去尼日尔的原因：“那些不习惯高尔美这所郊外医院情况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他们也同时面对了法语和豪萨语的双重语言障碍。现有的当地同工也需要习惯新医生的工作习惯。对于那些没有禾场工作经验的医生来说，可能需要用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高效率的工作。”

1992年1月，景青第一次重回尼日尔。这将是接下来每年都回去的起点，而每次逗留大约一个月。他们夫妻俩紧密的合作关系让他能够在不忽略SIM东亚区办事处的工作而回到尼日尔。景青

每一次出国时，珍珠都会在SIM国际的支持下坚守岗位。他们会通过传真、电话和互联网传递所有紧急事务。在准备第一次重回尼日尔时，景青难掩心中激动的情绪说：“能够回到尼日尔，真是太兴奋了！”

景青回到尼日尔，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例如在他第一次回尼日尔时，探访了在西非工作的亚洲人，以及尼日利亚境内比利里、乔斯和阿巴的宣教士，并探索差派宣教士的可能性。他还探访了自己担任医疗协调员的其他法语系国家。不止这些，他跟进了一些以前服事的豪萨族、富拉尼族和塔马吉克族认识的朋友。这就是他以后行程的常态：探访在非洲的亚洲宣教士、在高尔美医院进行外科手术，以及跟进他以前在尼日尔人中担任的职务。偶尔会有其他医生和朋友一起参与他的宣教异象之旅。



景青到村里探访及牧养主内的弟兄姐妹

有一次他拜访了周巽道医生和他的妻子吕毓蔚后，带来了极大的喜讯。1997年，他高兴地报告这对夫妇愿意委身于牙科事工。20多年来，高尔美人不得不依靠医院里的普通外科医生来拔牙和处理各种牙科急症。这一对来自新加坡的夫妇是多年来祈祷的结果。周医生是口腔外科医生，而妻子是一名药剂师。这对夫妇刚刚完婚，就勇敢地在尼日尔最热的季节动身出发到高尔美，于是他们在高尔美医院度过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婚蜜月。几年后他们决定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高尔美。由于资源有限，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并为着每一件新设备献上感恩。

因此，当周医生带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在2000年3月21日给景青发邮件时说：“牙科椅子终于送来了！”这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遗憾的是牙科椅子到达时，已是“四分五裂”的状态，许多部件需要重新修复和修补。每一位宣教士医生其实都学会为了每一件损坏的设备感恩。周医生继续兴奋地分享：“上帝派来了一位82岁的英国人，他来自撒玛利亚慈善会，素有‘修复达人’的称号，他比牙科椅子早来几天。他将在高尔美呆上一年，而过去几天一直埋头在这把椅子上，一件一件地清理、修理。”总之，牙科保健现在是高尔美医院整个医疗保健计划重要的一环。

景青在2002年的探访中见证了另一个令人雀跃的进展。在尼日尔独立41年后，高尔美的第一所中学终于建成了。虽然学校只有三间泥墙教室，而且位于村子的屠宰场附近，没有合适的屋顶、厕所或供水，但却是由老师们亲自建造的，因此值得表扬。这所中学最终招收了500多名学生，使高尔美村的扫盲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3年后，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并建造了一座新的



高尔美村学校课室

建筑物。可惜的是，这个新建筑是仓促完工的，在没有稳固的基础下，结果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了。

2013年，尼日尔第一位外科医生亚库布·萨努西医生（Dr Yakoubou Sanoussi）被委任为高尔美外科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一项重大进展。他非常称职，会说三种语言，也是当地教会的重要领袖。SIM西非差派办事处接受他为第一位来自尼日尔的SIM宣教士。这确实值得庆贺，因为SIM一直想让由尼日尔当地人长期管理高尔美医院SIM设定的两个目标，即在宣教工作中做门徒训练和指导信徒，正在慢慢地实现。

迄今最令人满意的进展是，2013年高尔美医院被认可为泛非基督教外科学院的培训中心。高尔美医院现在的工作人员包括实

习外科医生，每个人都兴奋地期待他们的第一位非洲外科医生在 COSECSA（东非、中非及非洲南部外科学院）通过考试，然后回到祖国布隆迪服务。

高尔美医院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前宣教士的孩子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主导了医院一座全新楼层侧翼的建筑工程。这是为了使医院的“西翼”与主楼层连接。景青形容这里有尼日尔中部地区丛林医院中最豪华的厕所！建筑团队还建造了一座新的妇产科楼和一座新的三层楼房，供三名参加高尔美培训计划的外科住院医师使用。高尔美医院的外观正慢慢焕发出新的光彩，更多的建筑正在建设中。

2017年1月，景青所属教会的宣教主任林家良传道（Dr Jeffrey Lum）与他一同前往尼日尔进行宣教异象之旅。景青和珍珠盼望他回新加坡后能够激励教会支持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带的宣教事工。可惜，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停留时，由于暴风雪而耽搁了五天，错过了尼日尔唯一一个当地教会的献心礼。然而，他们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约有350人参加了第一位曼加籍牧师的按牧仪式。那座老教堂曾在2015年的暴乱中被烧毁，当时尼日尔大约70座教堂被烧毁。他们相信首都几乎所有教堂都被烧了，这就加强了宣教的紧迫性和所有教会同心合作的必要性。

尽管遭受了袭击，非洲教堂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当珍珠与新加坡巴特利基督教会分享她的反思时，珍珠说：“在开普敦的世界福音联盟宣教大会，我们讨论了全球宣教的课题。令人鼓舞的是，非洲教会的宣教活动正在兴起。”

23

永远是上帝的仆人

截至2005年，景青和珍珠已经在宣教的岗位上服事了近30年，而景青在SIM东亚区担任总主任长达16年。巴特礼基督教会认为是时候让他们放安息假了。

2005年10月1日，林厚彰博士获委任为SIM东亚区代总主任，他曾担任SIM东亚区理事会主席。2006年4月1日，他被确定并当选为总主任，任期五年。景青和珍珠在8月参加了林博士的就任仪式。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林博士于2011年4月1日和2016年4月1日两次再度当选。

安息假之后，景青被委任为SIM国际副总主任，负责SIM亚太地区的事工。为履行这项职务，景青必须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米尔堡SIM国际总办事处上班，用几年的时间协调相关的工作，以建立国际领导团队。他在亚太区的工作范围很广，从北蒙古到新西兰，从日本一直往西南到巴基斯坦西部。这项工作涵盖的范围包括与差派主任及禾场主任合作。景青和珍珠在SIM总办事处工作了三年，回到新加坡后就与位于劳明达街的SIM东亚区办事处共用办公设施。珍珠继续作景青的特别助理与他一起服事，并且是国际办事处人事工作团队的一员，负责关怀宣教士。

从2006到2011年，景青的任期为五年四个月。他非常关注领导层的更替，随后在65岁就卸下国际办事处的职务。2012年，由马狄安博士（Dr Diane Marshall）接任SIM国际副总主任，负责亚太地区的事务。由于认识到景青在事工方面的能力和经验，SIM国际总主任麦贵高（Malcolm McGregor）为他在东亚区办事处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提倡亚洲新兴宣教计划和宣教顾问。作为宣教顾问，景青为SIM探索新的宣教事工，并成为新一代宣教士和宣教士候选人的导师。珍珠继续在SIM国际办事处人事部担任关怀宣教士和宣教士孩子教育的顾问（亚洲区），主要关注的是亚洲籍宣教士。除了督导、辅导和关怀SIM的宣教士及子女，珍珠也代表SIM在亚洲教育资源联盟（Asia Education Resource Consortium, AERC）担任董事，直至今日。

关于他们的新角色，景青反思说：“我越来越确信，珍珠和我的角色是通过鼓励、预备、指导，与下一代宣教士及当地领袖同行。没有接班人，就不算‘成功’。跨文化宣教士仍然短缺，而下一代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比我们所经历的容易。我们所肩负的宣教挑战是‘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可惜的是，即使40年过去了，这个情况仍然丝毫没有改善。”

事实上，景青和珍珠未曾从宣教中退休。他们呼吁基督徒响应宣教禾场的需要，把福音带到地球每一个角落，这一呼召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强烈和响亮。景青宣告：“我心之所向未得之民、少闻福音之民，以及难以被福音触及之民！”

景青和珍珠也挑战在新加坡东亚区办事处的驻本国宣教士，给予海外宣教士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宣教工作是神子民团队的事工，而不是一个人的事奉。”景青回忆说，当他和珍珠为去

非洲做准备时，得到很多人的帮忙才促成了这件事。他谦卑地补充：“虽然最初呼召我们的是神，但你们当中有许多人知道这事后也来同我们分享这呼召，与我们并肩同行。因此，我们都有份参与主的工作，在宣教工作中一起同工。其实珍珠和我就是代表你们被差派出去。”

对于驻本国宣教士，景青告诉他们：“如果宣教士被称为主的仆人，那么我们这些驻守办事处的宣教士就是‘仆人的仆人’。确实，我们差会的异象之一就是为服事我们的宣教士。这是一个很卑微的想法，也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愿意像仆人一样被使用。当然，我们都想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招募在办事处服事的宣教士是如此困难。”

的确，需要拥有某种特质的人才能够捕捉到神的异象，身为宣教士就意味着无私地服事主并忍受清苦的生活。景青和珍珠多年前就抓住了这个异象，看到了在没有医生的地方开展整全宣教工作，这可说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他们的主张是，如果上帝的儿女愿意回应大使命，就会有更多事情要做，也有更多事情可以做。景青鼓励基督徒医生拿起接力棒，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勇敢地参加比赛。

2015年，景青接受SIM东亚区英文刊物《SIMNow》的采访时说：“我始终相信如果上帝呼召的话，那么医疗宣教士应该是第一个志愿到偏远地区工作的人。伴随着优秀和专业的医疗照顾而来的神圣的、无条件的爱，是这个世界很罕见的。在大城市之外的许多小镇和乡村，都缺乏良好的医疗照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免费的医疗照顾，即便是富裕国家也不可能，那些贫穷的和

被边缘化的人，只能一个又一个的倒在前往医疗中心的路上。医疗宣教士的到来则大大的填补了这个缺口。”

景青和珍珠已经为宣教事工奉献了40年。在《SIMNow》采访中被问及作为一名宣教士医生，他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景青严肃地回答：“比起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真的不是‘牺牲’！可以让人们与神和好是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事。一个灵魂得救远胜于拥有整个世界！”

这是景青和珍珠在过去也仍然是现在服事的动机。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遇到什么人，心中最关心的就是永恒。景青和珍珠寻找每一个机会鼓励信徒在他们的信仰中，温柔和敏感地把人指向神所赐的盼望。他们孜孜不倦地服事人，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坚定的。

没有人比高尔美教会的纳吉迪多牧师更完美地诠释了他们的服事：“景青和珍珠是那些上帝会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人！”

后记

2017年6月27日，世界各地的SIM办事处接到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敬爱的一位领袖病情危急！”景青被诊断患上预后不良也无法动手术的胰腺癌。一位在伊莉莎白医院工作的朋友林医生（Dr K P Lim），为景青安排了紧急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显示有胰腺肿块。磁共振成像和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扫描也证实了先前的诊断和肿瘤的范围。就在当天下午，医生为他做了紧急胆道支架手术，以绕过他的阻塞性黄疸。

所有认识景青的人，包括曾与他密切合作过，以及他所帮助过的人，收到消息时都很震惊，纷纷献上慰问以及祷告。景青在尼日尔的朋友兼前病患阿尔听到他的病情后，亲自打电话安慰景青：“正如你以前为我祈祷使我的病得医治，现在我也会为你祷告。”阿尔能够充满自信地说这一番话，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神迹，他曾经得癌症，情况不适合进行手术，然而他仍然活了下来，且活了29年。他这一通越洋电话立刻激励了景青。让景青特别感动的是阿尔的努力，因为他年老体弱，在这之后不过半年，他就因年老离世了。景青的侄子光忠听说了叔叔的病情后，把基督徒作家约翰·派博（Rev John Piper）关于“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的信息传给他。派博说如果你认为战胜癌症意味着活下去而不是珍惜基督，那你就是枉费了你的癌症。景青思考了派博传达的信息后做了个决定：“上帝为我设计了这个癌症。事实上，至少我有时间好好走完人生路，把一切都交代我的妻子，帮助她知道该如何独自生活，也试着帮助我的孙子们记住，当我到天上的时候会为他们作更多的祈祷。”

直到最后，景青在主里一直保持着愉快的心情。珍珠说：“在过去的71年，神就是景青的所有，他在主里得安息，包括过去这一年患病的期间。他感谢上帝和你们每一个与我们同行的人。”接下来的一年多景青接受了化疗和放射治疗，虽然癌症已经扩散到肝脏，但感恩副作用不太严重。

一位常开车送他们去医院的朋友欧光耀牧师（Aow Kong Yow）说：“景青实在太棒了！虽然生病了，却仍在追求知识，一直在阅读量子物理方面的书籍，他对自己的状况保持着绝对的镇定。他没有坐在那里悲叹，而是充分地利用时间。他的头脑还是那么敏锐。”事实上，景青继续用现代科技来服事神，传播爱、盼望和鼓励的信息。他说：“我仍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WhatsApp、Skype 和其他电子通讯平台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服事神。我很高兴看到许多人继续从事宣教工作。”

我们当中很少人能如此冷静、镇定、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对景青来说，死亡的毒钩未能辖制他。“这只是我生命的开始，我要回家见我的天父。我准备好了，我要去见我的主。”在2017年10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景青以他一贯朴实的方式，列举了多年来上帝赐予的祝福：“在70年的生命中，有55年的岁月跟着很棒的母会巴特利基督教会从建堂开始一起成长，也看着这所教会连续41年对宣教的支持和关爱，还有与妻子度过美好的44年时光，没有她我就不可能完成宣教旅程。还有与孙子们共处的7年中，他们教导了我何谓单纯的欢乐。”

上帝赐予景青最珍贵的祝福，就是一位与他共同分享异象，不知疲倦、一起同工，把福音带到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的伴侣。在谈到妻子珍珠时，景青深情地说：“我感谢上帝，在我们一生的宣教旅程中有如此亲密的伴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夫妇俩谈到未来。景青表示，他希望将自己一半的骨灰埋在高尔美。

2019年1月7日下午12点35分，景青蒙召回归天家，安息主怀。同年7月，由SIM的新加坡籍宣教士，也是在高尔美服事的周巽道医生和妻子吕毓蔚，带着景青的骨灰回到高尔美。他们与高尔美的所有朋友在8月份的一场追悼会上，将他的骨灰埋葬在这个一直在他心尖上的地方。

珍珠的姐姐美英在他临终前问过他：“到了天堂，你最想见到谁呢？”景青毫不犹豫地回答：“主耶稣！我要感谢祂如此爱我！”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景青和珍珠遇见上帝无限的慈爱和怜悯，他们亲自看到、尝到也感受到了。所以他们非常肯定无论什么部落和语言，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刻在上帝的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抛弃，也没有一寸土地会被遗忘！



**高尔美社区为景青举行追思会，
纪念他一生无私的奉献。**



参考文献

Chua Choon Lan, Tan Lai Yong (eds). *Carry the Spices: Singaporean Doctors in Medical Missions & Pastoral Ministry*, Singapore: Medical Missions Foundation, 2007

Boardman, John; Gray, Basil; Oates, David; Canby, Courtlandt. *The Making of the Past: The Kingdoms of Africa*, Oxford: Phaidon Press Ltd, 1978.

Leong, Geraldine. *An American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Life and Legacy of Pastor John Willis*, Singapore: Singapore Christian Foundation, 2013.

Phillips, David J. *Peoples on the Move*, UK: Piquant, 2001.

Sng, Bobby. *In His Good Time: The 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ngapore*, Singapore: Bible Society of Singapore, 2003.



黄景青医生普世宣教纪念基金

此基金的创立乃是为了纪念及继承已故黄景青医生和妻子林珍珠献身非洲的异象与榜样。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第一批被差派到非洲大陆的新加坡籍宣教士，黄医生放弃了在新加坡前途无量的外科医生事业，来到尼日尔荒漠上的高尔美医院服事。黄医生一生遵循着3P原则而活，即是Pray（祷告）、Preach（传道）和Participate（参与），加上他出色的外科专业和谦卑的品行，让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许多人得到了极大的祝福。

12年后，他们被召回新加坡，在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区）继续积极地参与全球普世宣教工作。2019年1月7日，黄医生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在追思礼拜上，从众人对他的悼念和分享中，见证了他丰盛及忠诚为神、为人而舍己的一生。

「黄景青医生普世宣教纪念基金」的目的

黄景青医生一生都在跟随主的旨意，并积极探索尚未听过福音的禾场。此基金的目的就是用基金投资的回馈来提供经费，支持在少闻福音的群体中工作的宣教项目，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福音工作。

此基金计划筹募500万新币，并以投资的回馈来支持SIM开展的福音工作，主要用于：

- 建立教会和发展社区，特别是在新开创的地区
- 培训和发展宣教士及当地同工
- 支持宣教士的商宣事工
- 提供宣教士所需的技术和工具，以便更有效地开拓外展工作

新加坡巴特礼基督教会（黄医生为创会会友之一）和SIM差会（黄医生担任了40多年的宣教士）分别奉献了25万美元启动此基金。

此基金由其董事会管理，成员包括巴特礼基督教会和SIM差会的代表，以及有金融和投资经验的基督徒。

其他有关此基金的信息和奉献方式，请浏览网页：www.bccmissions.com/dangmf（英文）或扫描二维码（中英文）：



不被遗忘

两个人，两个不同境遇，
却拥有同一个呼召、同一个异象。

景青11岁那年，在一个主日崇拜听见神向他发出到非洲去的呼召；珍珠则在20岁时参加1969年导航会门徒训练大会，第一次听见非洲的呼声。他们持守了这个异象并顺服了神的旨意。神不但为他们牵线做媒，同时也建立、预备他们前往非洲宣教。他们凭着信心展开了宣教之旅，从新加坡到非洲、东亚区及更远处。

景青在高尔美医院担任宣教医生，珍珠则服事村落里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在非洲服事12年后回返新加坡，然后继续在宣教岗位上事奉直到2019年1月景青蒙主恩召。珍珠迄今依然活跃于宣教服事。《不被遗忘》诉说着两位忠仆的故事，因着信靠、顺服，到一个许多人认为是被神遗忘的地方服事。他们平凡的生命从此变得不再平凡。在神的心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被祂遗忘。

关于作者

罗月媚姐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科学士），也获得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以及伦敦大学颁发的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TESOL）罗姐妹完成了国立教育学院的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后，考取了圣保罗神学院的神学证书。罗姐妹于新加坡长老会奇恩堂聚会，参与外展事工，也担任教会报刊编辑数年。目前是一名商业通讯培训指导员。她的先生王振耀是她的属灵伙伴和写作启发者。

